

LU CHENG SHI ZHI

2022 春夏卷(总第17期)

内部资料 免费赠阅

鹿城史志

资料来源“鹿城在线地方志网”

温州市鹿城区档案馆
温州市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 主办
温州市鹿城区地方志研究室

白鹿光影

摄影：陈立



沿江路



CBD



沿江路



沿江三桥

资料来源“鹿城档案地方志网”

资料来源“鹿城档案地方志网”

鹿城史志

LU CHENG SHI ZHI

2022 | 春夏卷 (总第 17 期)

内部资料 免费赠阅

资料来源“鹿城档案地方志网”

温州市鹿城区档案馆

温州市鹿城区委党史研究室 主办

温州市鹿城区地方志研究室

资料来源“鹿城档案地方志网”

《鹿城史志》

2022 | 春夏卷（总第17期）

主 任 朱如明

副 主 任 王剑峰

委 员 李洪湖 谢一方 戴爱华 褚宏健

主 编 王剑峰

副 主 编 朱凌云 蔡 榆（特邀）

编 辑 蔡 榆 孙任翔 王剑峰 朱凌云

地 址：温州市鹿城区宽带路18号5楼

邮 编：325000

电 话：0577-55888182

邮 箱：857900031@qq.com

特 稿	立足“瓯江诗路文化带”建设，构建“鹿城中心诗群”的历史地位与社会认同感	王剑峰 沈洪保 孙任翔	01
东瓯鹿鸣	南宋杰出的思想家叶适思想简述 ——纪念叶适诞辰 872 周年	李文照	15
	红十三军先后有三任军长	刘定卿	19
	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 ——闲谈“青岙即今之青山”	金上进	30
	游老鼠山想到的	郑锦春	45
	江山亦要文人捧	陈颜玉	48
峥嵘岁月	当年温州，那一场“茶花梦”	天 霖	52
	忆温二中二三事	黄兴龙	54
	余霞散成绮——巽园钩沉	夏新天 杨瑞津	64
古城寻珍	温州钱氏子城遗址探考	叶芷甄	76
	我与寺前桥的故事	适 凡	92

	寻访《叮叮当》中的古迹	张 晓	97
	跟着唐朝学霸游鹿城	郑小良	109
百里人家	蝉园甘露润心田 转眼云烟四十年 ——忆方介堪先生	陈 言	121
	回忆蔡心谷先生二三事	沈洪保	124
	从李叔同到弘一的书体质变	孤 岛	127
	孟庆江的人生三品	褚 坚	132
	瓯菜老厨师郑志钦	朱凌云	139
华盖漫笔	这两口六角古井	徐贤林	146
	石坦巷里的大学时光	苏德来	149
	渐行渐远的山前街	施菲菲	152
	唯书寿永 ——我的家乡与我用心创作的“三部曲”	诸向东	161

资料来源“瓯城档案地方志网”

资料来源“鹿城档案地方志网”

立足“瓯江诗路文化带”建设， 构建“鹿城中心诗群”的历史地位与社会认同感

王剑峰 沈洪保 孙任翔

【摘要】鹿城城区区域，自东晋建郡(323)至于唐宋元明清和民国以来，一直是当时永嘉县、温州府的政治和文化中心。1984年鹿城建区以来，一直传承和弘扬温州文风诗风。本文立足“瓯江诗路文化带”建设，勾勒并阐述谢灵运、孟浩然、张又新，杨蟠、叶适和“永嘉四灵”，以及白鹿诗群、瓯社（慎社）与南社的诗人们留给鹿城的大量精美和颇具地方特色代表性诗词作品。由此，梳理、总结和构建中国山水田园诗歌系统赋予鹿城区域“中心诗群”的文学地理历史地位，以不断推动、促进和建设“鹿城中心诗群”的社会认同感、学术特征和诗韵文旅产业的时代使命。

【关键词】瓯江诗路；温州，鹿城中心诗群；历史地位与社会认同感

2017年，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作出了重大战略部署，启动建设大湾区大花园大通道大都市区，并将其作为现代化浙江建设的主战场和大平台。2018年6月，浙江省委省政府印发《浙江省大花园建设行动计划》，提出“以水系（古道）为纽带，建设大运河诗路、钱塘江诗路、浙东唐诗之路和瓯江山水诗路‘四条诗路’文化带，打造全省大花园建设的标志性工程。”2019年10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印发《浙江省诗路文化带发展规划》，对“四条诗路”的战略定位、空间形态、主要任务等进行了详细的规划。“四

条诗路”是在全面梳理浙江历史文化地理脉络基础上提出的，覆盖 11 个地市，以期形成全省美美与共的生命体，是全面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浙江行动。温州、鹿城作为诗路带建设和共同富裕建设示范样板区，不仅具有地理区域的优势，而且具备正当其时的社会认同和时代使命。2019 年 5 月，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牵头制定的《瓯江山水诗路文化和旅游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提出“把瓯江山水诗路打造成为中国山水诗词研学圣地、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黄金旅游目的地、国际秀山丽水生态养生福地”。2019 年 10 月，温州市发改委牵头制定《温州山水诗路文化带发展规划》，提出“打响‘诗画山水、温润之州’主题品牌，中国山水诗词研学圣地、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黄金旅游目的地、国际秀山丽水生态养生福地”，诗路要展现诗人行迹图、水系交通图、遗产风物图、名城古镇图、瓯越学脉图“五幅地图”，山水诗路既是文化之路，也是产业之路。而鹿城辖境作为历史上永嘉郡和温州府的政治文化中心和商贸核心区域，也应当是中国山水田园诗的核心起源地和中心诗群集聚地，无疑具有其无可争辩的集散功能和代表性辐射意义。

一、立足全域，认识瓯江山水诗路文化带建设的文学地理含义及诗韵内涵

温州（鹿城）建设瓯江山水诗路文化带具备良好自然和历史文化条件。温州的瓯江，为浙江省第二大河，历史上曾名永宁江、永嘉江、温江，干流长 388km，流域面积 17958km²。瓯江干流自源头至入海口分为三段，下游基本在温州市、鹿城区境内。公元 422 年，谢灵运出任永嘉郡太守，在任期间遍游温州全境，所著《游名山志》中，记录温州名山水 12 处。在他留存至今的山水诗中，写于温州的有 20 多首，占总量一半以上。谢灵运的温州山水诗篇，开创了中国山水诗的先河，“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等是千古吟诵的名句，引领唐宋诗人

们的无比向往。自唐五代以来，循着谢灵运的诗踪，温州山水的入诗，逐渐形成了由从外来诗人的参与，到本土诗人的崛起，再到群体性和平民化发展的诗歌历史脉络。据不完全统计，温州瓯江沿线自两晋至清朝的诗歌共计 6300 多首，分别是唐诗 46 首、宋诗 439 首、元曲 13 首、元明清诗 5800 多首以及唐代以前古诗 25 首（还不包括词作）。这些诗人以灵慧之眼、颖悟之心创造了一片风景和一片心境的诗词美学境界，缔造了瓯江山水诗路文化带独特的风采和神韵。无疑，鹿城是中国山水诗的最主要发祥地。瓯江山水诗路是自然和历史留给温州（鹿城）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是温州（鹿城）人民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动力之源。

1. 认清温州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就在如今的鹿城区域

温州地处东南沿海，面向大海，背靠大山，相对地说在历史上是个闭塞落后的地方，在秦汉、三国、西晋还没有建郡。直到东晋明帝太宁元年（公元 32 年），析临海郡温峤岭以南地置永嘉郡。这是永嘉建郡之始。永嘉两字的寓意是“水长而美”。当时辖有永宁、安固、横阳、松阳四个县。建郡城于瓯江南岸，有郭璞卜城、白鹿衔花传说。文学家孙绰、丘迟，大诗人谢灵运、颜延之，史学家裴松之等都担任过永嘉太守。此时的永嘉是“古代的大永嘉”，其地域包括现在的温州地区以及现在丽水的部分地区。人们说谢灵运爱好永嘉山水奇丽，恣意遨游，足迹遍及永嘉，这个永嘉就是指古代的大永嘉，即永嘉郡，不是指现在瓯北区域的永嘉县。建郡城于瓯江南岸，就是如今的鹿城区域，“古代的大永嘉”政治文化中心就是今天的鹿城区。谢灵运游过永嘉郡的鹿城、乐清、瑞安、平阳、玉环、青田以及今永嘉等地，都留有诗作，今学界确认谢灵运在当时永嘉郡地区留下 21 首诗作，其中的《登池上楼》《登江中孤屿》《晚出西谢堂》《登上戍石鼓山》等就是写鹿城境内山水及其风光的。至隋文帝开皇九年（公元五八九年），废永嘉、临海两郡，置处州（今丽水），州治在括苍（今丽水市），将永宁、安固、横阳、乐成合并，称永嘉县，永嘉作为县名开始于此。县城在原郡城（即今鹿城）。这个永嘉县相当于后来的“温州地区”。

隋炀帝大业三年（607）改括州为永嘉郡，郡治在括苍（丽水），辖永嘉、括苍、松阳、临海四个县。这个永嘉郡更是历史上的大永嘉，管辖几乎包括温州、丽水、台州三个地区了。历时不长，到了唐高宗上元二年（675），析处州，置温州，这是温州得名的开始。因其地处温峤岭以南，冬无严寒，夏无酷暑，气候温润，虽“隆冬恒燠”，所以称为温州。这时永嘉不是郡名，而是一个县名了。其地域大致是瓯江南的今鹿城区、瓯海区、龙湾区的大部分，以及今瓯北的永嘉县。其永嘉县府设在今鹿城。以后，历经宋元明清以及民国、新中国初期，永嘉县境基本不变。县治长期都设在鹿城城区，至今老城区还留下“县前头”“县后巷”“县城隍”等地名。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四月，温州为浙江省第三特区；民国二十四年八月又改称为浙江省永嘉行政督察区，简称永嘉区，辖永嘉、乐清、瑞安、平阳、泰顺、玉环等六县。其政治文化中心就是在今天的鹿城区。1984年鹿城建区，传承其作为温州地理以至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由于历史的习惯，长期以来，总有人还会把温州地区说成永嘉，把温州其他县的人说成永嘉人。如“永嘉学派”是南宋时期能够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成鼎足之势的重要学术思想流派，创始人是郑伯熊兄弟、薛季宣、陈傅良等，他们分别是温州，当然包括鹿城和瑞安人，稍后的思想家叶适也是瑞安人。而其实他们主要活动及其生活中心均在今鹿城城区。又如南宋“永嘉四灵”，徐照、徐玠、赵师秀是当时永嘉县治（今鹿城）人；只有翁卷是乐清人，但重要诗歌创作活动发生在鹿城区域。

2. 梳理鹿城作为“中心诗群”的诗词成果及诗人群体

因于自然人文地理的核心区域，成就了鹿城作为“瓯江诗路带”中心历史地位。温州（鹿城）打造瓯江山水诗路文化带要以瓯江沿线的秀美山水为核心区域，以诗词本体为灵魂，走深化、物化、转化和诗化之路，努力将优秀的山水资源与深厚的诗韵文化资源有机结合，充分彰显山水诗路的审美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由此，必须深化对鹿城诗歌地理概念和诗路涵义的全面认识和内涵的充分挖掘。现简单梳理一下，

其历史发展可分为五个主要时期：

（1）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涉及颜延之、陶弘景、丘迟、谢灵运等宦游诗人。尤其是谢灵运作为中国山水诗的开山鼻祖，以鹿城为中心地理区域，留下了精美和永恒的审美文化意蕴，其诗作及其美学与人文贡献影响深远，催发和启示了唐宋以来追寻山水诗踪的巨大价值。一句“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陶醉了多少唐宋以来的诗人，从而真正开启了温州作为山水诗发源地的历史地位。

（2）从唐五代至北宋时期：瓯江沿岸山水田园诗词，在鹿城区域形成一个持久系列，其主要人物包括旅居与吟唱诗人，以孟浩然、钱起、顾况、张又新、方干、杨蟠等为代表，与玄觉等诗僧相交映。其中孟浩然、杨蟠两人不仅来过或宦游鹿城，而且留下精美、传颂广远的诗作。如杨蟠的一首《咏永嘉》：

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
水如棋局分街陌，山似屏帷绕画楼。



沈耀进摄

是处有花迎我笑，何时无月逐人游。

西湖宴赏争标日，多少珠帘不下钩。

至今传颂，为温州、为鹿城争得了全国性的地域声誉。

(3)南宋期间：鹿城境内诗人及其诗作呈现重要的爆发和集聚期，涌现了“永嘉学派”学人诗群、“永嘉四灵”诗派群和宦游诗人群。其中主要指著名学者薛季宣、陈傅良、陈谦、叶适和诗人潘柽、徐照、许及之、薛师石、徐玑、翁卷、赵师秀、赵汝回，还有“温州八百年词祖”之誉的卢祖皋等，以及他们与周必大、陈亮、朱熹、杨万里、姜夔、楼钥和戴复古、刘克庄等人的交合关系，均是一笔丰厚的财富。比如叶适《西山》一诗，写尽了温州境内西山一带的风物清韵和民生悠闲之状，令人遐思：

对面吴桥港，西山第一家。有林皆橘树，无水不荷花。

竹下晴垂钓，松间雨试茶。更瞻东挂彩，空翠杂朝霞。

南宋卢祖皋为著名文化官宦楼钥之甥，学有渊源，亦与永嘉四灵等以诗歌相倡和，为鹿城写有《水龙吟·淮西重午》一词，其中写道：

会昌湖上扁舟，几年不醉西山路。

流光又是，宫衣初试，安榴半吐。

千里江山，满川烟草，薰风淮楚。

念离骚恨远，独醒人去，阑干外，谁怀古？

亦有鱼龙戏舞，艳晴川，绮罗歌鼓。

乡情节意，樽前同是，天涯羁旅。

涨绿池塘，翠阴庭院，归期无据。

问明年此夜，一眉新月，照人何处？

这阙词中，写鹿城会昌湖端午龙舟竞渡的风光，表达了他对故土乡居

岁月的怀念，也由此可以考量其作品艺术性，对于扩大鹿城及风物名胜的知名度，均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四灵”诗派作为主要产生在鹿城，并盛行在鹿城达二十余年，留给鹿城的作品更是一个巨大数目。据陈增杰点校《永嘉四灵诗集》（两浙作家文丛，浙江古籍出版社）收录诗作，计：徐照 259 首、徐玑 164 首、翁卷 138 首、赵师秀 141 首，共 702 首。他们“寻绎遗绪，日锻月炼，一字不苟下，由是唐体盛行。”并酝酿和开启了“江湖诗派”，其文学评价和历史地位绝不可低估，所留下的大量诗作，如《乡村四月》《南塘即事》《约客》《登富览亭》等，为历代颂扬，带给人们无穷的艺术魅力。

（4）明代中后期：以龙膺、王叔杲、何白、王光蕴等为代表的“白鹿诗社”诗人群，包括王叔果、王叔杲、姜准、柯荣、侯一元、侯一麟、方日升等一大批朝野人士，以及同当时文化中心的吴中著名士人王世贞、王穉登、屠隆等人，均是值得关注和深入研究的话题。其活动中心也大体在鹿城区域的东山书院、中山书院、华盖山、墨池坊玉介园、县治中心等，其人数、诗作和创作延续，更是庞大和持久。近年来出版的《王叔杲集》《何白集》《王季中集》《侯一元集》就是明证，很值得深入研究，来扩充鹿城诗文的历史内涵。

（5）晚清民国时期：主要以林鹗翔、冒广生、张宗祥为代表的永嘉词人祠堂丛刻活动群为主体，开展创办《瓯风》地方文献刊物，瓯社（慎社）、南社温州社员们，组织诗词雅集吟唱，形成了颇具影响的地方诗人群体，创作了大量具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特征的作品。其持续期间，可从晚清民国 20 世纪初延续至 20 世纪 80 年代。其作品数量和诗人群体的诗坛地位以及影响力也不可低估，涌现出王毓英、梅冷生、刘景晨、吕渭英、陈仲陶和夏承焘等重要诗人。如：1925 年重阳后两日，温州城内的华盖山上，诗人们在举办“永嘉诗人祠堂”秋祭。参加这次秋祭的人员有当时浙南地区最高行政长官、瓯海道尹张宗祥，文人雅士朱鼎新、刘项宣、王家驹等人，大家纷纷赋诗，兴致无穷。席间老者周仲明提议，南边的积谷山上石头非

常奇秀，可惜缺少梅花为伴，应该在山上种植梅花。大家欣然同意，纷纷捐资，共同筹划买花种花的事情。道尹张宗祥亲自督促带领衙役和仆人精心选择位置种好梅花。两个月左右时间过去，梅花逐渐开了，刘绍宽、符璋、陈仲陶等诗人兴致勃发，纷纷挥毫赋诗，长歌断句琳琅满目，争长斗胜，蔚为盛事。张宗祥也诗兴大发，写下长篇七古《东山种梅歌》（选一），详细记述了这次因秋祭种梅吟梅的经过：

今年秋祭正正筵，忽然一客起席前。
为言有石极奇秀，何不补梅向石边。
四座问言各微笑，客何为者语独妙。
争分鹤俸致客前，连聘梅妻貯冰峤。
客者周君字仲明，六十微髯疏且清。

诗人们因梅赋诗，因诗蔚为盛事，皆是难得的人文风采、白鹿诗韵。

3. 研究总结“鹿城中心诗群”的诗词主要创作风格和审美旨趣

可从五个不同时期诗人群诗作入手，分析研究各自风格和旨趣特征，突出其温州（鹿城）诗歌地理文学独有的山水田园诗作的隐逸、空茫、清寂和思古、旷远特性，并结合永嘉学派、南戏和书画创作等代表成果，总结“鹿城中心诗群”的艺术精神和人文价值。由之确立“鹿城中心诗群”的文学地理概念、类型形态和人文精神；同时，将之艺术精神和人文价值融入瓯江山水诗路重点建设项目，包括文化景观类、文化研究类、文



化活动类等项目，梳理千年古城、山水田园诗源、南戏风情、永嘉之学、百工百艺、红色浙南等六大文化主题，凝练彰显“千年东瓯国·诗画白鹿城”的文化内涵，打造区域文化高地，实现瓯江山水诗路串“珠”成链等新格局，突出诗韵，彰显诗格，体现意境，落实文旅效应。

二、立足鹿城，检视当前瓯江山水诗路文化带建设存在问题

为贯彻省委省政府的战略部署，融入温州市诗路文化带建设范围，近期鹿城区公布《鹿城区瓯江山水诗路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年）》，根据《计划》，鹿城将深入发掘瓯江山水诗路特性，依托温州“山水斗城”的历史文化底蕴，做好“名城”旅游大文章。将“山”（老城区郭公、海坛、华盖、积谷、松台五山，景山、吹台山、大罗山等）、“屿”（江心屿、七都岛）、“城”（华盖山城墙遗址、朔门城墙遗址、谯楼遗址）等、“街”（历史文化街区及历史建筑）、“井”（二十八宿井）、“馆”（名人纪念馆、专题博物馆等）、“食”（以瓯菜为主的特色美食）等资源加以串联整合，持续形成以集中展示鹿城历史文化为目的地的古城诗韵探索线和景观旅游线。但是，目前人们对瓯江山水诗路及其文化带理解，对瓯江下游沿线和温瑞塘河沿线，以及山、屿、塘、水等自然方位确定和城、街、坊、井等文化内涵的界定和梳理，无论从学术研究水平和实地调研深广度方面，都存在着若干亟待解决问题。

1. 瓯江诗路文化带及其鹿城本位的社会认知明显不足

总体上看，沿线大部分地方的干部群众对瓯江山水诗路的认知，停留在“知道有这么一件事”上，对当地如何参与山水诗路文化带建设茫然。尤其对鹿城作为主要的人文核心区域的认知、诗歌地理和方位的把握更是无所适从，往往将凡是涉及鹿城的诗词归入其中范围，并且对作为中心诗群的理解和建设更是无从下手，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知晓度和参与度极低，瓯江山水诗路这一名称的重要价值也被严重低估。对涉及的诗人、诗派的

具体个案研究，更是缺乏。

2. 诗路文化带及其鹿城诗群的学术研究有待深化

温州社科界和文艺界对温州山水诗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早在1997年，由戈悟觉主编的12卷本的《瓯越文化丛书》出版，其中第七卷《温州古诗选注》和《温州历代词百首》主要反映了温州古诗词的基本概况。改革开放以来，对谢灵运山水诗的研究也比较多；而宋代“永嘉四灵”、明代“白鹿诗社”和民国诗人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与浙东唐诗之路20多年不断积累丰富的研究成果相比，温州、鹿城山水诗的整理和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特别是关于温州（鹿城）山水诗的历史发展脉络、诗人行迹路线、诗路文化遗存分布等，缺乏系统性考证。鹿城作为诗路核心地区和中心地带所应有的文化内涵和保护建设价值研究更是薄弱，尤其是古南湖（会昌湖一带）巽山区域，戍浦江等瓯江支流和瓯江下游的西洲屿、七都涂等岛屿研究则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对积谷山、松台山、海坦山等和南塘等的诗韵文化内涵和延伸价值研究，还处于比较零散状态。即便是瓯江沿线极具知名度的江心屿，虽有“中国诗之岛”的美誉，但对其诗文的研究、挖掘以及有系统地开发利用也远远不够，缺乏诗韵价值的认同。

3. 诗路沿线固有文化遗产和诗韵品味破坏严重

由于缺乏前期的研究积累，在“大拆大整”的背景下，诗路沿线的一些地方历史文化遗产往往一夜拆改，荡然无存，这为诗路文化的深入挖掘和有效保护利用带来极大困难。由于对水乡文化的重要价值缺乏深刻认识，没有形成强大的保护格局，相关部门之间没有形成合力，河道被填埋、古桥被拆改、古埠头被拆除等现象时有发生，与水乡相关的不少民俗活动正在逐渐消亡。一些河流被填埋，旧城的空间格局被损害，城市与“山水田园”相联系的固有和谐尺度遭到破坏，原有的“群山如斗形，华盖气独壮，奋身地势高，目极天宇旷”的境况大体荡然无存。鹿城城中的九座小山在“混凝土森林”中几乎成了小土堆。随着温州市区沿江高层建筑的拔地而起，形成一道巨型的人工屏障，把鹿城城区与瓯江隔开，塘河重建也隔绝了旧有

风味，山水田园诗所指向的自然审美和文化艺术价值受到一定限制和影响。

4. 诗路文化项目传承与建设缺乏诗意情味

近年来从打造“瓯江山水诗路文化带”的角度来看，一些项目缺少形式多样、层次丰富的载体和核心内容支撑，角度不对接，重点不突出，亮点不耀眼，特色不鲜明，也往往缺乏具象化诗情画意的类型产品，文化价值实现形式比较单一，没有形成文化与生产、生活、生态相互促进和共同发展的格局。有的诗路文化项目是原有文化产业或旅游产业项目的临时拼凑，不仅缺乏诗意，还有对现有山水格局的破坏，甚至弄巧成拙。

三、立足诗韵，构建瓯江山水诗路文化带及“鹿城中心诗群”建议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诗歌里有美丽的乡愁与远方，让诗路串起乡愁与远方，既是历史的呼唤，更是当今时代的命题。诗路文化带建设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不可操之过急，更需要以敬畏心和使命感来做实、做美，这既是对古人青睐山水的回馈与致敬，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当前，鹿城区推进瓯江诗路带建设，要结合鹿城千百年诗韵历史积淀，立足鹿城真山水里的诗意画境，让人们体味在山水中享受如诗如画般浪漫生活和人生境界，可将瓯江“沿线的名山大川、知名景点串珠成链，变盆景为风景，使山水与城乡融为一体，自然与文化相得益彰”，让人民群众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让更多的诗词作品进入景区，丰富景区文化内涵，让游客有诗可观、有诗可赏。也可规划山水诗小镇、山水诗村的建设，重塑和再现具有诗意的场景与居所，真正体现人与自然的互动，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1. 突出鹿城核心文学地理优势特征

鹿城要利用中国山水诗发祥地的先天条件，在瓯江沿线的核心区域深度挖掘山水文化底蕴；要挖掘、研究和弘扬、开发谢灵运“山水诗起源地”与“唐诗之路的终结地”以及“永嘉四灵”“白鹿诗派”等的诗韵内涵和

文化精神，突出鹿城作为核心区域的文学地理优势。可以组织推动沿线各地从历史地理、文学文艺、宗教民俗诸角度展开“山水诗路”文化遗产家底排查，建立“山水诗路”档案库。温州老城区即“斗城”无疑也是重点之地，尤其是号称“诗之岛”的江心屿；谢灵运是瓯江山水诗路文化带上无可争辩的“最大IP”，他在温州留下的古迹及后人兴建的主要纪念性建筑物有池上楼、谢公池、谢公楼、康乐楼、谢公亭、谢公岭、谢灵运像、澄鲜阁、永嘉谢灵运诗碑廊等，均应充分发挥其名胜古迹作用。当然，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的温瑞塘河也应是山水诗路文化带建设的重点。要在这些重要节点精心建设若干个标志性文化项目，以文旅融合的手段将文化资源优势巧妙地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高质量地打造成一条串联秀美风光、让人魂牵梦绕、展示文化自信的诗路，使瓯江山水诗路成为“诗词鹿城”最好的一张金名片，成为中国名副其实的第一条古老山水诗路和山水诗路最佳旅游目的地。

2. 分步骤地深入开展诗路文化研究

当务之急便是对瓯江山水诗路的核心区域、重要节点和薄弱环节进行深入研究，梳理出诗路文化的诗人行迹图、水系交通图和诗词创作成果图。瓯江山水诗路涉及文学、文献学、地理学、人类学、宗教学、语言学等众多学科，要将诗路研究推向深入，必须抓紧组建研究团队和专家智库，从历史、地理、文艺、民俗等诸多角度对诗路文化开展系统性的研究，首要的研究工作就是利用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系统地梳理与山水诗鼻祖谢灵运和“永嘉四灵”和卢祖皋、“白鹿诗社”有关联的各种资料，创设中国山水诗研究基地，努力理清山水诗路产生与发展的史脉、文脉并高质量地编纂出版相关专著；同时，加强对山水诗路建设的基础性研究和应用性研究，开展与山水诗关系密切的温州戏剧、书法、绘画、音乐、民俗、陶瓷、园林等专门史的研究，形成系统的研究成果作为山水诗路建设的学术支撑。

3. 开展具象诗韵和文旅项目链接研究

物化情味诗韵，是传统文化实现产业项目化的可取途径，尤其于诗词

文化的落地推动，以文化项目将山水诗词具像化在实景里，更为讲究具象化实施的策略和方案。山水诗路不仅是兴盛在笔墨间，更要凸显在实景里，这就需要诗路具体“物化”。瓯江山水诗路虽然贯穿整个浙南地区，但重点应在区域文化鲜明、经济实力较强、人口空间聚集、辐射带动明显的鹿城区域，以文化项目形式将山水诗具像化在实景里，打造诗路文化高地。

4. 山水田园与城区乡村同构衔接

诗路文化带虽然以山水诗来命名，但完全可以延展到相关的山水文化，包括山水诗、山水赋、山水游记、山水志、山水画、山水园林等，还应该吸纳与山水诗紧密关联的田园诗等。从地域上，从城区三十六坊、九山、塘河等，继续向乡村的仰义、丰门街道、藤桥街道和山福镇等区域拓展延伸，挖掘诗词存量，提升地域文化含量，增加田园风情诗趣；并积极探索让文化艺术进入乡村，改变人们生活方式的实践。可以在山水诗路文化带中尽量吸引文化探索者、优秀艺术家，特别是学有成就的本籍文化学者、文学艺术家参与，通过引领，能使当代人“进入”古代，感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田园生活方式。

5. 保护诗路沿线文物古迹形态

在“三普”名录基础上，对诗路沿线的交通遗迹（古驿道、古桥、古道、古渡口、古堰坝等）、名士居所遗迹（古建筑、古书院、宗祠、家庙等）、佛宗道源遗迹（古寺、古观、古庙、古塔等），以及相关的可移动文物和非遗项目进行保护，对于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的文保单位，要进行及时抢救修缮，最大程度地保护诗路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延续性。而天然形成的以江心屿、积谷山、华盖山、松台山、南塘和藤桥、山福等为中心点的诗路带大圆圈，彰显着鹿城作为瓯越文化核心区域的包容开放的鲜明特征，值得重点关注建设。鼓励诗路沿线县（市、区）建设专题博物馆、非遗展示体验场馆等，支持各级博物馆设计和布置诗路文化主题展。

（本文系鹿城区档案馆社科课题成果）

参考文献：

- [1] 陈增杰点校：永嘉四灵诗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5
- [2] （清）曾唯 辑，张如元、吴作仁 校补：东瓯诗存，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12
- [3] 吴 晶：永嘉四灵徐照、徐玘、翁卷、赵师秀传，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11
- [4] 张一平、张胜南：温州诗歌史（先秦至两宋），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3
- [5] 徐志明：卢祖皋研究，沈阳师范大学（中国知网）硕士论文，2013.3
- [6] 陈中权：温州建设瓯江山水诗路文化带的问题及对策，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9.12
- [7] 潘猛补：明季温州白鹿诗社考，“雅韵诗文”公众号，2020.3
- [8] 陈 凯：瓯江山水诗路的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12
- [9] 沈洪保：话说三个“永嘉”，“瓯江文艺”公众号，2020.12
- [10] 鹿城区政协编印：江心屿诗选百首，2020.12

南宋杰出的思想家叶适思想简述

——纪念叶适诞辰 872 周年

李文照

【叶适生平】

叶适，字正则。宋高宗绍兴二十年（1150）五月初九，出生于温州瑞安城内。十三岁时随父定居永嘉县，中年以后才定居水心村（今属鹿城区水心街道）。

十岁时，因邻居聘请陈傅良为家学教师，于是他向陈氏问学三年。十四五岁时，迁永嘉楠溪，有隐者刘愈为师，受益非浅。十六岁时，因家境贫困，到乐清白石山学塾执教。同时求教温州学者郑伯熊、王楠等人。十八九岁后，到婺州一带游学。一边教学，一边求学，大大增长了知识。

淳熙四年（1177）秋天，叶适偶然机会认识了翰林学士周必大，开始走运。由于周氏保荐，漕试合格，成为举人。第二年，高中进士第二名，从此崭露头角。淳熙八年，任武昌军节度推官。第二年任两浙西路提刑司干办公事。淳熙十三年，到临安后，为军相王淮推荐，改宣教郎，任太学正。淳熙十四年，升任太学博士。

绍熙元年（1190），叶适转朝奉郎升任蕲州知州。绍熙五年，升任国子司业。庆元元年，因故免职。嘉定元年（1208），罢官回乡，时年 59 岁。从此定居水心，专心著述。

叶适是我国南宋时期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和政治家。在宋代学术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他一生著述颇丰，撰有《水心先生文集》29卷，《水心别集》16卷，《习学纪言序》50卷等。其思想广博，涉及经济、政治、哲学、伦理、史学、教育等多个领域。

今年是叶适诞辰872周年。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予以简述其思想，谨以缅怀这位温籍大家的学术贡献并致敬意！

一、叶适的经济思想

叶适生长于宋代的温州，正是经济发达的地区。当时的永嘉县城（今鹿城），海上交通便利，海外贸易繁盛。北宋时，永嘉县城的税收就高达25300多贯。是当时全国平均水平的九倍。所以，他对朝廷提出的“重本轻末”思想极力反对。叶适主张“以国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发展工商业生产”，然后才能达到“治化兴”。

叶适还提出“理财与聚敛异，今之言理财者，聚敛已矣”。意思就是说，今之理财实为向老百姓敛财。他提出不能过度聚敛和过重收税，否则会影响工商业的发展。他认为过于繁重的税收无异于“杀鸡取蛋”。这种思想对当时的经济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二、叶适的政治思想

叶适是从社会下层出身的士大夫，所以对当时的政治危机、人民疾苦更为关心和敏感。南宋时期国家的危机主要在外患。女真族灭亡北宋后，侵占中原，不断南下掳掠。主和派始终占据上风。但叶适是一贯坚持抗金和收复失地的抗战派。早在《廷对》中，叶适说：“复仇，天下之大义也；还故境土，天下之尊名也。”后又有一次轮对中，向孝宗皇帝慷慨陈词：“故疆之半未复，此一大事者，天下之公愤，臣子之深责也。”由于当时皇帝

受制于太上皇，又错用了主和派，导致符离之战的失败。

为了坚定皇帝收复失地的决心，叶适根据当时实际情况，提出了“守定而后战”的战略方针和具体措施。一是先在两淮等地巩固边防，做到能战能守；二是积极整顿军队，肃清贪腐；三是要求文武百官应该熟习战事，以免临时惊慌。由于当时的军队腐败、涣散，军官反目等等原因，又导致开禧北伐的失败。

叶适在外患的严重威胁下，其爱国之心促使他考虑改革内政，振兴南宋，恢复中原，统一祖国。所以，他对当时困扰南宋的“冗官、冗兵、冗费”三大问题进行了大胆的揭露，同时还提出了改进的意见。但最终难以如愿。

三、叶适的学术思想

永嘉学派虽盛于南宋时期，而实际上溯源于北宋中期。当时就有王开祖、丁昌期两人在永嘉从事学术活动。到了南宋，温州人才济济，文科士进士多达 1147 名，其中有传记载入《宋史·儒林传》的有 6 人：薛季宣、陈傅良、戴溪、叶适、蔡幼学、叶味道。

薛季宣是南宋时期永嘉事功学派的创始人。在谈及永嘉学派时，今人在《叶适的唯物主义及其对哲学的批判》中，认为“它真正获得独立的思想体系而自归门庭的，被当作一个异端的学派，可与理学、心学两派称鼎足的，实由薛季宣作为转变的中介”。

在永嘉学派的形成中，陈傅良是一个上承薛季宣、下启叶适、蔡幼学、曹叔远等人的桥梁，是永嘉学派中一位重要的学者。

叶适在薛、陈的事功学说的基础上，随着其政治实践的丰富，悉心研究经史，使永嘉学派有了很大的发展。永嘉学派提出“事功思想”，主张“经世致用，义利并举”，重视经史和政治制度的研究；主张通商惠工，减轻捐税等政见，都是代表进步思想的。学术思想本身就是以政治思想为基础的。叶适不愿依傍门户，勇于探索，使永嘉学派真正与理学派、心学派鼎

足而立。叶适的精神非常可贵，不愧为中国历史上称著的进步思想家。

四、叶适的教育思想

叶适本身就是一位教育家。纵观叶适的一生，从事教育工作的时间最长，约有 30 年。从 16 岁在乐清白石村塾开执教至 29 岁中进士之前，都在白石、雁荡山寺院和永嘉茶院寺学塾教书。59 岁罢官回乡后，又一直授徒讲学和著述。到 74 岁生命结束而中止。他的教育思想和方法都很值得后人称道和研究。

叶适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安邦治国的人才。他说：“求二天下豪杰特起之士，所以恢圣业而共治功。”叶适在教学中很重视书本知识，他说：“古之成材者，其高有至于圣，以是书也。”但同时，他也要求学生注意外界事物，扩大自己见闻。“观众器者为良匠，观众方者为良医。”而且要“内外相成”，从感性知识到理性知识，并要求以事物来检验理论是否正确。他认为“无验于事者，其言不合。”

而且，叶适对当时的教育制度“养而不取”和“取而不养”的弊病提出批评。他提出三点改进意见：一是必须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二是要加强对州县官学进行考察；三是要加强对学生的封建道德的教育。叶适提倡不拘一格降人才。选拔人才必须以“保民为职”为标准，同时要珍惜人才、保护人才。

注：本文资料主要参考周梦江先生著的《叶适与永嘉学派》。

红十三军先后有三任军长

刘定卿

92年前的5月，红十三军建立。

时隔90余年后的今天，除党史部门认定、亦为大家熟悉的胡公冕军长外，基本未闻还有其他人员任过军长。这符合史实吗？

笔者在撰写《浙南红十三军传》的过程中，经过对文献资料的梳理发现，红十三军的发展历程中，远不止胡公冕一位军长，而是在他之后还有两任军长。

第一任军长是胡公冕

1930年3月初，胡公冕奉中央军委之命，抵达永嘉组建浙南红军。5月9日，红十三军在永嘉成立，胡公冕任军长，金贯真任政委，陈文杰任政治部主任，刘蜚雄任参谋长。当时，红十三军只有一个团，团长雷高升，下辖3个大队，一大队长雷高升（兼），二大队长胡协和，三大队长谢文侯，共约2000人（据1930年5月《布尔什维克》报统计，当时红十三军为2000人），军部设在胡公冕的家乡永嘉县五尺村。

1930年5月，王国桢代表浙南红军参加在上海召开的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在李立三“左倾冒险”错误指导下召开的，会议提

出“在目前革命高潮日益迫近的形势下，准备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创立全国革命政权，已经成为当前的中心问题。”这次大会对王国桢影响很大，为他在浙南执行中央“左倾”路线提供思想基础。

后来成为浙南特委书记的王国桢，认为胡公冕不敢发动农民暴动，不敢向中心城市进攻，不重视部队里的政治思想工作，致使红军中纪律散慢。特别是红一团攻打处州（丽水）时，三大队大队长谢文侯竟然不听指挥，在攻打处州途中擅自将部队带回，导致攻打处州战绩并不理想。因此，王国桢认为谢文侯比土匪还不如，进而把这些问题都归结到胡公冕身上，认为胡公冕犯了右倾路线。

红十三军的问题不断地被王国桢反映到中央。同时，中央还知道胡公冕党籍有问题：早在1928年4月，胡公冕因遭到蒋介石政府的通缉，听从宗侄胡仲横的建议，在上海《民国日报》刊登简短启事，表明自己不问政治，回乡种田。中央由此认为胡公冕已经脱党。后来由于浙南农民武装暴动风起云涌，永嘉五尺农民武装提出要请胡公冕来领导他们武装斗争，中央巡视员金贯真也向中央军委提出，经周恩来同意由中央军委派胡公冕到浙南组建红军。

此后，以李立三主持的中共中央先后两次给浙南特委指示，一次是在1930年5月15日，在《中共中央给温州县委的指示信》中说：

“胡公冕在国共分家后，曾登报自首，中央曾通知你们及告知金贯真同志不能与他发生组织上的关系。党绝对不能允许自首同志恢复党的关系。但你们仍称之为同志，在工作中亦以同志看待，这是非常严重的错误。胡公冕如能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工作，党亦只能以革命分子看待他，只能与之发生群众关系。丝毫不能站在个人信仰上封建关系上恢复其组织关系或告知以党的组织原则，完全是违反组织的行动。你们如不立即纠正，中央必执行党的纪律。”

如胡公冕不站在革命的立场，党必须号召群众反对他制裁他，亦丝毫不能容情。”

第二次，1930年5月23日，在《中共中央给温州中心县委、金贯真及温台永三属红军的信》中又再次强调：

“胡公冕在1928年曾在上海登报脱离党，已不是同志了，因为他在上海重新表示很坚决，中央故给他以到群众斗争中的工作环境，获得努力革命工作的机会，然而他许多观念是错误的。根据王同志（王国桢）的报告，更见得他完全是走旧的机会主义的路线，党的新路线精神，红军的策略路线，他都不了解。他的行动和思想，很明显的不能在党的领导下工作。离开温属回沪军委另外分配他的工作。”

浙南特委在《中共浙南特委七月份工作报告》中说：

“浙南第一次代表大会对红军问题决议，加紧红军的集中领导和统一指挥，在三月内实现一万红军的决议。我们根据这个决议案，一方面通知温、台各游击队，派重要代表开军事会议，讨论集中地点和发展方向；另一方面执行中央对于浙南红军的指示，令胡公冕离开温属。”

浙南特委的这份报告说明浙南特委遵照中央的指示，已经转告胡公冕中央要他离开红十三军的命令。胡公冕离开红十三军后，王国桢即向中央提出：请派军长和政治委员来（能通温州话的最好），愈速愈好。

过去，对中央命令胡公冕离开红十三军一事，有关部门往往回避这个问题，主要原因是怕影响到胡公冕的声誉，不愿意捅破红十三军和浙南特委内部存在“右倾”与“左倾”这样所谓两条路线的斗争局面。所以都以胡公冕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为由掩盖和回避过去。这就是胡公冕被中央命令离开红十三军的原因。这是有文献资料证明的事实，是不争的事实。

由于红十三军政委金贯真牺牲过早，使得军长胡公冕与浙南特委书记王国桢的关系无法协调。在“左倾路线”的干扰之下，胡公冕被迫离开红十三军，实际上胡公冕只当了不到两个月时间的军长。

第二任军长是陈文杰

2016年元月，我与温州一位研究浙南党史的资深学者交谈时，提到为什么至今还没有撰写出一部完整的《红十三军军史》，他说红十三军的历史你能搞得清楚？你知道军长是谁吗？我说当然是胡公冕。他告诉我，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温州翠微山烈士陵园内，陈文杰的碑铭上注明是红十三军军长。他为了让我相信，道出了自己过去曾在民政部门工作的经历。

无独有偶，徐顺平先生在所撰写的《胡公冕访谈录》一文里，说1964年胡公冕第一次回温州，曾在江心屿参观革命烈士纪念馆，当讲解人员说到红十三军军长是陈文杰时，胡公冕很生气，他说：“这是违反历史事实，陈文杰是红十三军政治部主任，怎么说他是军长呢？军长是我，周恩来总理知道的，他当时是中央军委书记。”胡公冕的一番话，令他深感惊讶，“这么大的事，是民政部门弄错了，还是另有隐情？”

这说明红十三军军长不止胡公冕一任，陈文杰很可能就是第二任军长。胡公冕离开红十三军后，是谁接替他出任第二任军长呢？我市著名学者胡珠生先生在他的《温州近代史》中，有过关于红十三军第二任军长的说法。

胡先生是永嘉五尺村人，与胡公冕同村。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

系，在中国古代史、中共党史和温州地方史着力较深，是温州有名的历史学者，曾任温州博物馆副研究员。他撰写的《温州近代史》是研究温州近代史的开山之作。

他在写红十三军这段历史时，曾作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并对红十三军的历史有独特的见解。

胡珠生在《温州近代史》第367页，有这样一段话：

“8月中旬，陈文杰前往缙云县南溪村（位于永嘉县界坑西北）红一团三连连长潘善春家，召集南溪、外前、木栗和仙居县陈坑村等地二三十名红军骨干开会，宣布团部决定：“红一团向西进军，先打缙云城，打进缙云，再进攻永康，然后会合永康三十里坑的红三团一起攻打金华府。这样，我们就可和江西红军联成一片，红军力量大了，把蒋介石赶掉。”同时宣布纪律。不久，红三团派邢火城来南溪，准备接应。25日，第一团集中下岙（或作石梁），由陈文杰整编，陈奉命任红十三军军长，把团部扩大为第一师师部，胡协和升任第一团团团长。整编后，红一师雷高升、胡协和等在陈军长指挥下从五尺西进，……”

胡珠生先生是第一个认为陈文杰是红十三军第二任军长的学者，为此，他找到了许多国民党内部通讯的证据：

一是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秘书处编辑的《铲共丛论》中《浙南共产党过去情形略述（摘录）》，其中说到：

“……浙南总行委机关，设于永嘉与瑞安交界的渔洋（应为渔潭）地方，委员7人，书记王国桢，军委为伪中央所派的陈文杰，其他（特）委为李文钱、梅影、赵胜、

曹珍及一女姓（性）名阿凤的，但机关所在，为永嘉县政府与保安队第四团所侦获，拿获总行委秘书长金緘三、秘书张子玉等2名，要证百余件，亦都连带搜得。过了几天，陈文杰又在永嘉上塘的地方，为保安队捕获，即呈准处以死刑。那时陈犯兼任红军第十三军军长才无多日哩。”

二是1930年9月19日，上海《民国日报》在《温州通讯》一栏的报导：

“温邑剿匪指挥部，于九月二十一日下午四时许，派队押送共犯陈文杰一名，赴松台山刑场，斩首示众。查该犯，宁波人，充红军第十三军军长，兼任共党浙南军委，浙南特委会常委等职云。”

此外，《剿办温属各县匪共情形述略》中，称陈文杰是红军军长：

“温州永瑞平三县，本属共匪炽盛之区，其初由谢文锦、王国桢等，借救穷会名义组织，群愚蚁附，至十九年陈文杰、胡公冕等，复正式成立红军，并联合台属之黄、临、温、仙各县土匪数千，组织浙南行动委员会，侧重军事行动，情势颇为严重。幸驻防保安队努力痛剿，将红军军长陈文杰格毙，胡公冕亦出走。”

从1930年的5月至9月，是红十三军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在这个时期内，红军得到迅速发展，从初期的400多人，发展到6000多人，武器装备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好。胡公冕离开红十三军后，红十三军的军长一直空缺。为此，王国桢在《中共浙南特委关于分工问题给中央的报告》中，便向中

共中央提出：

“请派军长和政治委员来（能通温州话的最好），愈速愈好。”

7月14日，江苏省委根据党中央关于将各级党、团、工会的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的统一部署，成立了江苏省总行动委员会，由李立三兼任书记。根据安排，江苏总行委负责江苏、浙江、安徽党的工作。8月下旬，浙南特委书记王国桢赴上海参加苏浙皖3省联席会议返回浙南后，即将中共浙南特委改为浙南总行动委员会，王国桢任书记，所属各县委也相应改为各县行动委员会。当时中央要求各地总行委要发动农民暴动，把扩大红军作为当前的主要任务。

红十三军第一团成立不久，温岭第二团、永康第三团也先后成立。除第一团归军部直接领导外，其余两个团均归浙南特委领导。胡公冕被中央下令离开红十三军后，全军都已经在浙南特委的领导之下，浙南总行委书记王国桢成为红十三军实际上的领导人。但是，三个团还不够一个军的编制，浙南总行委为了执行中央和江苏总行委的指示，决定将红十三军的团扩大为师的编制，把浙南红军扩大至一万人，正式成立红十三军。

8月25日，红十三军在下岙（石染）进行扩编，将红十三军各团扩大为师，团长升为师长，团政委升为师政委，并组建了新的军部和师部及直属队，并在团以下增设营的编制。这样，红十三军有军、师、团、营、连、排、班，已经是完整的一个军的建制。

红十三军在下岙扩编后士气大振，王国桢与陈文杰决定攻打缙云县城。8月31日拂晓，陈文杰率部攻占了缙云县城，缴获机枪2挺，步枪50余支，木壳枪20多支，子弹9担，还缴获了国民党县府大印，县署文契被烧毁，并打开监狱释放“囚犯”。这次战斗极大地鼓舞了浙南人民的斗志，政治影响很大。9月10日，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报导了“浙南红军占

领了缙云”的消息。

在这次扩编中，陈文杰被浙南总行委任命为红十三军总指挥。为什么陈文杰是红十三军的总指挥呢？因为委任军长必须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说陈文杰是红十三的总指挥，不是我们说的，是王国桢说的。我们发现，在1931年5月17日，王国桢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称陈文杰为红军总指挥：

“至于当时红军情形，自总指挥柴水香同志被捕后，胡公冕从中争夺领导权，捣乱了一塌糊涂……”

这个报告告诉我们：陈文杰的职务是红十三军的总指挥，只是后来情况有变化，周恩来从苏联回国后纠正李立山的左倾路线时，让胡公冕重回红十三军，打乱了中央对陈文杰的任命，造成陈文杰未能正式当上红十三军的军长，但红十三军的总指挥与军长是同一个实职。

从1930年9月起，国民党的军队和报纸都称陈文杰是红十三军的军长。因此，温州民政部门认定陈文杰是红十三军的军长也没有错，只不过没有说明他是第二任军长罢了。

文献中的第三任军长

1930年9月5日，红三师攻打壶镇失利。第三师最先失利，使红十三军失去浙南西面的支撑和配合，再加上敌人大规模的围剿，红十三军开始走向失败。

1930年9月21日，军长陈文杰被叛徒出卖被捕，后英勇就义；中央李立三左倾路线遭到批判后，胡公冕于9月初重返红十三军，面对敌人大军压境的形势，为了保持部队有生力量，他于10月初在龙溪召集胡协和、谢文侯部开会，名义是化整为零，分散隐蔽，实际上等于把部队解散了。

王国桢、李振声和雷高升等认为胡公冕不是党员，这次重返红十三军

又没有军委任命的新职务，明显是在争夺红十三军的领导权，他们不同意分散隐蔽，即率部离开楠溪，准备向青田、瑞安一带游击，伺机去江西苏区与中央红军会师。但部队一千多人在青田白岩村被敌人包围，损失惨重，突围后部队又在大京、高楼一带被打散，雷高升只率数十人回到永仙边界坚持游击斗争。

中央军委发现问题后，立即派新的军长和政委到浙南，企图恢复红十三军。从文献中发现中央有给红十三军派新的军长和政委的线索，派遣的时间是1930年10月19日，是胡公冕召开龙溪会议之后，当时红十三军已经化整为零。

这份文件是浙南特委于1930年10月26日给中共东方局《关于十三军现状及目前工作的布置》的报告，其中说：

“派来十三军李、段、潘、刘诸同志均于本月十九日到温。”

但这份报告中没有说明派来的这4位红十三军干部中，究竟谁是军长，谁是政委？但在另一份报告中，我们发现新派来的军长和政委参加了一个很重要的会议。

浙南特委1930年11月12日给中共江南省委的报告中，有提到新派来的军长和政委，他们于11月5日至6日都参加了浙南特委在路桥黄杰家中召开的扩大会议，报告中说：

“特委委员六人（军长与政治委员都在内），临海代表一人，瑞安代表二人，二师一团团委代表一人。大会对于三全扩会（即六届三中全会）材料，因环境关系，只讨论一个政治决议案，对决议案完全接受。对于浙南过去的工作有一详细的检查与批评，并认为特委有迁移赤色区域

与改组的必要。大会实际加强特委本身外，还须建立温、台、处三个中心县委之必要。因此便决定马上改组了特委。可是为要加强特委来改组，而结果适得其反，因为书记王同志（王国桢）认为新派来的军长与军委对本地语言不通，王同志对一师有相当信仰，要求到红军去工作；同时军长与政委都主张不参加特委……。”

这份报告证实上级已经给红十三军派来了新的军长和政委，他们都同时参加了浙南特委在11月5日至6日召开的特委扩大会议。至于新派来的军长和政委是谁？在温州解放后的30多年里，党史部门和民政部门一直都不清楚。

1996年，台州党史办张善相同志经过8年时间的查证，证实10月19日报告中派来的李、段、潘、刘同志中，潘同志就是红十三军政委潘心元，他已于当年12月初从玉环县苔山岛到温州特委再次参加开会途中被捕，并于当天牺牲。但在李、段、刘中哪一位是军长还不清楚。

有人认为李同志是李超时的可能性最大，李超时当过红十四军的军长，还兼过军政委，他是最有资格当红十三军军长的人选。中央为了恢复红十三军，曾于1930年11月派江南省委外县工作委员李超时到浙南巡视。先前潘心元也曾于8月被中央派到浙南巡视过，后来中央任命他为红十三军政委。那么，中央会不会先让李超时到浙南巡视，先让他熟悉浙南情况，后让他当军长呢？但是，这种推测并不合情理，李超时于11月19日才抵达瑞安，而浙南特委扩大会议是在11月5日和6日召开的，那时李超时还没有到达温州，也不可能参加特委扩大会议。因此，不主张参加特委的那位军长，肯定不是李超时。

但是，李超时的线索，倒是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讯息，他在巡视后于1930年11月21日给中共江南省委的报告中提到：

“红十三军第一师自柴水清（香）同志牺牲后，即被胡公冕领导，一部分雷领导。经过几次打击，分散为数部分，雷本身还领导四五十人，段、李动摇返沪。”

李超时在报告中提到的段、李二人，究竟是谁呢？其中的李，肯定不是李超时本人。原温州市委党史办主任章景濂在他主笔的《红十三军活动始末》的注解中认为，段同志很可能就是新派来的军长，在经过实地考察后，认为红十三军已无恢复的希望，便回上海向中央汇报了。那么，这位段同志叫什么名字呢？是从哪里调来的？这些问题在此后浙南特委与中央来往的文件资料中，笔者再也没有发现过有关讯息。

这位不懂本地话、又不肯参加浙南特委的军长到底是谁？他的“出场”，是否红十三军的另一个谜呢？此事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毕竟这是红十三军历史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参考文献：

- [1] 1930年5月15日，《中共中央给温州县委的指示信》
- [2] 《浙南革命历史文献汇编一、二战时期》
- [3] 《浙南革命文献汇编一、二战时期》
- [4] 《浙南革命文献汇编一、二战时期》
- [5] 《红十三军与浙南特委》
- [6] 《红十三军与浙南特委》

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

——闲谈“青岙即今之青山”

金上进

温州南宋末年宰相陈宜中出生于鹿城，是鹿城人。这应是无可争议的史实。但目前围绕着他的祖居地等，地方学术界颇有争端。尤其是关于“青山”之地的祖居地或是遁归处，争鸣甚多。本刊第15期，曾登载张鹤松《陈宜中遁归之地青奥考略》；今再登载金上进此文，以飨读者。

青岙，即青山的旧地名，与南宋末代丞相陈宜中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据康熙《青山陈氏宗谱》（以下简称“康熙陈谱”）曰：“青岙即今之青山也，青山为与权公（与权，陈宜中字）旧游地，其后守益公迁居青山，亦继与权公之志也。”

“青岙即今之青山”，这说明青山原叫青岙，即青岙是青山曾用名。康熙陈谱有载，陈氏二世祖至五世祖（陈宜中父亲）均安息于斯，六世祖陈宜中曾三度隐居于斯，所以说“青山为与权公旧游地”。

康熙陈谱载曰：陈宜中（1218-1280），字与权，号静观，景定三年（1262）进士（榜眼），德祐元年（1275）任丞相。陈氏始祖赤岸公居闽赤岸，二世祖太尉世善公自闽徙永嘉一都，三世祖伯理公、四世祖安惠公、五世祖恭僖公，均居永嘉一二都（今龙湾区）。至宋季，因海寇骚扰，迁居永嘉郡城外沙（今鹿城区海坛山东麓），后迁郡城南厢相儒坊，即今鹿城区大

小南门外巽山附近。

六世祖宜中公虽出生于城区，但因“青山为与权公旧游地”，故十一世祖守益公于明景泰年间（1450-1457）为继承六世祖之志，迁居青岙（青山）沙湾地方，守益公即为青山陈氏始迁祖。由此可知，青山陈氏原系陈宜中之后裔，也不妨说，陈宜中为青山人一点儿也不为过。然而，每提起“青岙即今之青山”，人们总是不假思索地问：“青山，哪有青岙，不是七都青奥就是洞头大门的清澳呢？”但造成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同音误会原因多 地名随改致疑惑

原因之一：同音误解。一提起青岙本是青山旧地名，大多读者几乎不晓得，他们都以为“青岙”“青奥”和“清澳”三个同音异字的地名是指七都青奥或洞头清澳。原因是同音字往往造成误解。众所周知，汉字是音形义的结合体，音、形不同，其义亦不同。因此，我们对这三个同音地名必须进行端本澄源。

其一，字义区别。青岙、青奥、清澳三个同音地名，在语法上皆属偏正结构，三个修饰语有两个相同，但其意义区别主要看中心语，中心语不同，其意义不同，所处地域也不同。

“𡵓”，没有收入《简化字总表》《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两表，这说明“𡵓”并不是“岙”的繁体字，也不是异体字。我国最早的字典西汉《尔雅》、东汉《说文解字》、清《康熙字典》均未收之，直至清末，“𡵓”才收入《辞源》，其解释：本作“澳”。山坳近水的地方。也作“岙”。多用作地名。这说明汉字未简化之前，“岙”已存在。“也作‘岙’”，说明“𡵓”“岙”两字通用。其实“𡵓”是个方言字，惟浙江、福建沿海一带的地方志或地名志中均有出现此字，暂不举例。《新华字典》又承认“𡵓”是《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以外的异体字，而《现代汉语词典》却说成是繁体字。有不同观点，本就很正常，有对立才有统一。但这两本字典对“岙”

（畧）解释大同小异，且仅一个义项：浙江、福建等沿海一带称山间平地（多用于地名）。有鉴于此，龙湾区青山村，无论是“山坳”还是“山间平地”抑或“近水”，此三方面都符合“岙”的内涵（特点）。青山村南紧倚山坳，有山间平地，村中辟河，曰青山直河，所以青山原名青岙并非无缘无故的。

“奥”与“岙”字形不同，意义也不同。《康熙字典》对“奥”解释，仅有一个合适“青奥”的义项：水内曰奥。七都地处瓯江之中，符合水内之奥特点。《康熙字典》对“澳”解释：崖内近水之处。《说文解字》对“崖”的解释是“高边”。所谓“崖内近水之处”，就是指高地的边或陡立的山边临水地方。《新华字典》对“澳”作解释：海边弯曲可以停船的地方（多用于地名）。这些字典对“澳”解释都符合洞头清澳的地域特点，清澳地处东海湾，东临太平洋，是渔民泊船避风的好地方，所以取名“清澳”也是名副其实的。总之，有比较才有鉴别，三者根本区别：青山的青岙是“山之岙”，七都的青奥是“江之奥”（位于瓯江之中），洞头的清澳是“海之澳”，它们所处地域环境各不相同。所以，此三字很容易区别，但不可相互借用。



其二，字形区别。“畧”（今同“岙”），上“奥”下“山”结构，用法同岙。“奥”《康熙字典》有收入，但字形略异，在“米”之上兼加一撇，即“奥”。毋庸赘言，纵使不识之无者亦明白“畧”“奥”“澳”是迥然相异的三个不同字形。总之，字形不同，其义亦异。

其实，古代地名部门对同音地名的命名蛮科学的，用这些形义不同字将它们严格地区别开来，使人

明白其坐落的地点。青岙，为山之岙，其坐落位置，康熙陈谱《陈氏宗祠记》篇首则述：“郡东南三十里许，有峰曰霹雳，高可千仞，为东瓯巨镇青山其支峰也。层峦蜿蜒，矫然而迴顾者，则龙湖山也。余族世居其下。”青奥，为江之岙，即七都岛，位于城东二十余里，或茅竹岭以北的瓯江之中。清澳，为海之澳，又叫“清澳门”，今指洞头大门，位于城东北二百里的东海之中。由此观来，区分一个地名，一视其字形，二视其坐落的地点，二者对号入座，缺一非可。

言归正传，康熙陈谱所记载的青山旧地名“青奥”（奥，今同“岙”），其为山间之岙，与山相关，故兼山旁，以区别于“奥”“澳”两字。然而，好多专家似乎没有注意字形，却将青山的“青岙”误写成“青奥”或“清澳”。比如《陈宜中遁归的清澳在何处？》一文结论是“青奥即今龙湾区青山”，又如《一卷陈氏宗谱解开温州地名之谜》一文结论“青奥即青山的结论可成定讞”。两文中的“青奥”与康熙陈谱《郡庠士朝益公纪略》记载的“青岙即今之青山”中的“青岙”是两个不同的地方。为何老是将“青岙”写成“青奥”偏偏跟原宗谱唱反调呢？竟然一字之差却让人“惹得纷纷口舌多”呢！

殊不知，文章观点乃灵魂，务必要正确。康熙陈谱《郡庠士朝益公纪略》一文提出的是“青岙即今之青山”这个观点，而不是“青奥即今之青山”！明明是“青岙”却偏偏说成“青奥”，甚至是“清澳”，此与“讲一世的张阁老，不晓得张阁老姓张”又何其相似乃尔呢？怪不得引起诸多读者对“青奥即今之青山”论的疑惑和误解！其原因全是一些专家的错写，以讹传讹。但又把话说回来，或许是同音字地名引起混乱所致吧。

正史未必完全正确，也因同音字难免有错。《宋史·兵志》记载的德祐二年（1276）陈宜中遁归温州清澳，此事与实际不符，据康熙陈谱记载，陈宜中德祐二年隐居青岙（青山），并不是“遁归”洞头“清澳”，所以这个“清澳”完全是因同音字造成误写。康熙陈谱曾载，青岙（青山）是陈宜中旧游地，曾三度归隐青岙（青山）。笔者为此走访了洞头大门。据当地几个老实巴交、不愿意透露大名的老人反映，宋末的清澳，山艰海阻，

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经济匮乏，粮食短缺，加之地域不广，一旦打起仗来则难有退身之地，完全不具备隐居的条件，陈宜中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正一品官员，绝对不会选择这个地瘠民贫、鸟不拉屎的地方；再者，洞头史志部门，也曾多次对陈宜中隐居清澳之事进行调研，最后都终归未果。此外，还有《兰溪陈氏宗谱》记载的其祖始迁自“清澳”，据康熙陈谱载，原兰溪陈氏始迁于青岙（青山），所以这也是同音字所造成误写。由此可知，“青岙即今之青山”可成史实。

原因之二：以为重名。同音往往跟重名混杂，但两者各有异同。不同点是：同音地名是同音异字，而重名是音字俱同。比如，龙湾区青山老地名“青岙”，与平阳县水头“青岙”是重名。现在，人们心目中之所以没有青山“青岙”的印象，是因为一些专家竟把青山“青岙”误写作七都“青奥”或洞头“清澳”，以为“青岙”与“青奥”“清澳”都是重名，没有什么区别，久而久之，人们习以为常，以致认为“青岙”就是七都“青奥”或洞头“清澳”。

在今温州城区（四区），与“青岙”地方重名的迄今尚未发现。据康熙陈谱载：“青岙即今之青山也，青山为与权公（陈宜中字与权）旧游地，其后守益公迁居青山，亦继与权公之志也。”谱序中出现“青岙即今之青山也”，这是序作者补充或强调说明当时陈宜中“旧游地”叫“青岙”，现在已更名叫“青山”。也就是说，清康熙时期青山陈氏修谱之前，“青岙”已易名“青山”，显然，为青山“曾用名”青岙提供了根据。其实，随着时代的变迁，地名变更也是正常之事，何况“山”“岙”相互密切关联的青岙改青山，当然是无可非议的呢。

一个地名的命名往往跟当地的地域环境相关联的。弘治《温州府志·邑里》记载：“七都任洲、沙洲、青奥。三图。”其中“青奥”，属七都，不同于青山的“青岙”，虽音同而字形却不同，而“奥”即是“𡵓”少了一个“山”字偏旁，这也可说明七都青奥并不是山岛，而是由于瓯江潮涨潮落由泥沙长期冲积而成的地方，所以未必加山字旁。而青岙却是与山岙

相关联的。《宋史本纪·瀛国公》记载：“德祐二年正月……遣人召陈宜中于清澳，宜中来谒，复召张世杰于定海，世杰亦以所部兵来温之江心寺。”此“清澳”与青山的“青岙”、七都的“青奥”都不同，“清澳”两字都加了三滴水偏旁，分明是指洞头大门岛的“清澳”，它是地处海洋的地方。由此可知，史料早已根据其语境用“青岙”“青奥”“清澳”三个音同、形不同、义也不同的词给这三个地方进行科学命名，使之一清二楚地区别开来。然而，这里的“清澳”，并不是真真正正的洞头清澳，而是宋史编著者元末丞相脱脱等人以为重名而误写，根据实际情况判断，当时陈宜中正隐居在青岙（青山）地方，所以这个“清澳”应该是指青山的青岙。

因此，区别好“青岙”“青奥”“清澳”三地名的不同字形，不只是对号入座，还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以准确无误地判断其坐落的地点。譬如，《宋史兵志·兵六（乡兵三）》载：“建炎后寨兵。温州十三寨（城下、管界、馆头、青奥、梅奥、鹿西、蒲门、南监、东北、三尖、北监、小鹿、大荆）。”其中“青奥”无疑指七都青奥，因而青山青岙没有设寨的史载。比如，叶适《故知广州敷文阁待制薛公墓志铭》中说：“六年，高宗帆海入青岙门，幸水陆寺。”这里“青岙门”与“青岙”截然不同，前者三字，后者两字，青岙门的中心语是“门”，青岙的中心语是“岙”。那么青岙门究竟在何处？《大清一统志》有释：“青岙山，在永嘉县东北二百里海中，两山对峙如门，亦名青岙门。”显然，青岙门是指“在永嘉县东北二百里海中”的洞头大门。我们亦可根据语境实际进行分析，青岙（青山）处于永嘉县东30里，与青岙门处于200里海中相距170里，青岙（青山）又没有“两山如门的青岙门”，此青岙门明显不指青山，而是指洞头大门岛的清澳地方。总之，凡史书诸如“青奥”“清岙”“清岙山”“青岙门”“青奥门”“清澳门”此类不同于“青岙”的同音异形的地名，必须从实际出发，要实事求是地加以区别。在正常情况下，这些地名均非指龙湾区青山古地名青岙。

原因之三：乱改地名。引用史料，不可断章取义，更不容蓄意篡改，

以假乱真，要做到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要保持原汁原味。否则，“假作真时真亦假”。兹列如下：

例一：该谱的发现，解开了温州的历史地名之谜。据《宋史·兵志》记载：建炎后寨兵，温州十三寨。其中有一寨名为“清澳”者，又作“青奥”，位于乐清、永嘉两邑之间。又据《宋史·瀛国公纪》记载：陈宜中，于德祐二年（1276）遁归温州清澳。但青奥到底位于温州的哪个地方，学者众说纷纭，至今还无令人信服的结论。陈宜中与清澳有种种渊源关系，在该谱得以体现，谱中对此有明确的记载：“青奥即今之青山也，青山为与权公旧游地，其后守益公迁居青山，亦继与权公之志也。”又据《兰溪陈氏宗谱》记载，其祖始迁自“清澳”，两谱互证，至此青奥即青山的结论可成定谳。

鉴于上文，笔者查阅《宋史·兵志》和《青山陈氏宗谱》，竟发现四个问题：

（一）上文所引用的所谓《宋史·兵志》“其中有一寨名为‘清澳’者，又作‘青奥’”这句话，一对照宋史原文已经过专家居心修改，即把《宋史·兵志》原文中的“青奥”竟改为“清澳”。专家又另加注解“又作‘青奥’”四字，此仅为了“方便论证”而已。

（二）对照康熙陈谱，文中已将原“青岙即今之青山”中的“青岙”改为“青奥”。

（三）如此一改，不只将《宋史·兵志》记载的寨名“清澳”、《兰溪陈氏宗谱》记载的兰溪陈氏始迁的“清澳”，与《宋史·瀛国公纪》所记载的德祐二年（1276）陈宜中遁归温州“清澳”中的这三个“清澳”等同起来，也使文中三个“青奥”统一起来，通过等量代换，从而得出“青奥即青山”的结论。

（四）虽然原引文被修改了，并达到了论证的目的，但结论中“青奥”与青山“青岙”是两个不同地方，即跟康熙陈谱原文论点“青岙即今之青山也……”不相符。

由此可悉，专家“论证”了大半天，其证明的“青奥”并非青山的青岙，而是七都的青奥，原因是所论证的观点与原谱中的观点不对号入座。这样一论证，则将陈宜中本是青山青岙人竟被讲成是七都青奥人？！纸上谈兵，徒费心机，白白空证了一番，反而还起了反宣传作用。也就是说，事实终归还是事实，仅靠更改史料是成不了事实的。

众所周知，凡三段论推理，大前提与小前提，必须有“等量”关系，否则不能推出真实的结论。上文所论证的清澳、青奥、青岙（青山）是三个不同的地方，压根不具备什么“等量代换”的条件，怎么能得出可信的结论呢？这样一来，最终还是没有达到证明“青岙即今之青山”的目的。逻辑推理，并非随心所欲，并非搞什么文字游戏。论文的大忌便是论点不正确、论据不真实。

例二：明礼部侍郎瓯滨王瓚为《青山陈氏宗谱》赠序，即康熙本《原序》：“陈氏之族……始自太尉世善公，暨乃弟世矩公也。世善五传至与权公，为宋丞相，因论丁大全，陈自强与众不同，遂托病遁迹青山……”

从这段《原序》转到《宋末宰相陈宜中》一书中，其中“遂托病遁迹青山”一句却被改为“遂托病遁迹青岙”，即把原文中“青山”改为“青岙”。这样一来，反而引起人们质疑：难道“青岙即今之青山”是伪造出来吗？殊不知，王瓚作谱序说陈宜中托病遁迹青山，这是既成的史实，康熙陈氏谱序“青岙即今之青山”也是史实，不用将“青山”改为“青岙”，也可推出陈宜中托病遁迹青岙。

从例一、例二中看来，专家思想相当紊乱，一会儿将“青奥”改为“清澳”，一会儿将“青岙”改为“青奥”，一会儿又将“青山”改为“青岙”，犹若变色龙，变来变去，反而将真真正正的青山“青岙”变为七都“青奥”，最终牛头不对马嘴。

原因之四：偷换概念。例如，叶适《故知广州敷文阁待制薛公墓志铭》中有：“六年，高宗帆海入青岙门，幸水陆寺。”可见青奥与水陆寺相近，青山与水陆寺同属华盖乡。至此青奥即青山的结论可成定讞。

这段文字中的引文意思，是说宋高宗南渡经过“青岬门”并到达“水陆寺”此地方，并不是说青岬门与水陆寺相近。这里的“幸”是个古今异义字，作动词，此处特指宋高宗到水陆寺。这查查《古汉语常用字字典》可得到佐证：“特指皇帝到某处去。”但专家却通过偷换概念，先将“青岬门”换成“青奥”，然后说“青奥与水陆寺相近。”还说“青山与水陆寺同属华盖乡”，最后推出“青奥即青山的结论可成定讞”。试问：青奥门在洞头，而青奥在七都，相距170里之遥，青岬门与青奥怎么等同？青奥为膺符乡，青山为华盖乡，两个不同地域，怎么能推出“青奥即青山”的结论呢？再说，青山是这个“青岬”，并不是那个“青奥”。所以，大前提洞头“青奥门”与七都“青奥”不等同，与小前提“青山与水陆寺同属华盖乡”，它们之间又没有什么等量关系，所以不可能推出“青奥即青山的结论”。这种仅靠偷换概念、脱离实际、纸上谈兵的论证方法，是经不起实践检验的，也是站不住脚跟的。

历史，毕竟是历史，不因人的意识所改变。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存在的变化发展决定社会意识的变化发展。凡文史工作者都会明白，存在决定意识，引文的基本原则：要忠实原文原意，不可随意篡改原文，或根据某种需要而断章取义，或融入主观情感及某种意图。著名历史学家任继愈说得好：“学术研究切忌研究谁就爱谁。”否则往往会导致“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喟叹！

原因之五：视界狭窄。人们说，青岬即是青山，那么青山的“岬”究竟在哪里？

（一）人们心目中由于对所谓“岬”的定义狭义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况且在现实生活中所看到的都是两山所夹成的平地称作“岬”。比如：天河的郑岬、钟桥岬（今名“岬底”），永中的白水岬、双岬，瑶溪街道的皇岬，状元街道的西台岬，等等。其实，青山并非无岬，只不过仅有两个小岬而已。

一个是青山尖西山脚有一个较大的平地，即陈宜中纪念馆西边，今建有8幢高楼民房，山岬有一百多米深，中间原是条山沟，早年停泊好多船只，

直通青山直河。1959年1月，因永强建设温强公路而被填塞。现在岙底山口仍有陈宜中隐居遗址，今辟为菜园，如身临其境，颇有“悠然见南山”之感。一个是在青山陶瓷厂那边，这个山岙更阔大更深远。

(二) 人们缺乏广义角度去理解，去观察。我们温州沿海一带除了把山间平地称作岙以外，还有把山边可泊船的地方也称作“岙”，这样一来，便将岙的外延扩大了。事实便是这样，大罗山东麓一带(包括青山)的地方，在唐朝之前无疑是大海，随处都可泊船，所以青山古地名叫青岙也就是合乎情理了。

再者，山与岙是两个相互维系的结合体，有山才有岙，有岙必有山。然而，从今天实地考察看来，我们永强叫什么岙的地方，不一定都有所谓山坳平地。比如说，海城街道的东岙(今名“东溪”)、天河街道的南皇岙(位于三甲金山寺与垞新屋一带地方)、永中街道的沙岙儿(黄石村)、瑶溪街道的金岙，还有营田上岙，等等，这些地方的地形跟青山地形基本相似，都没有因两山所夹之岙而命名，何况有小岙的青山古地名为青岙呢。

地名命名跟时代变迁相关。如，温州曾叫过东瓯国、永嘉郡、东嘉州、温州府、瑞安府、永宁县、永嘉县等等。就拿今天的永兴街道沙园村来说吧，该村最早曾叫过“南桥”，1949年之后称“康一大队”，改革开放之后，又谓之“沙园村”。又如永兴康三村，过去曾叫“夏方”，改革开放后，易名“萼芳”，同理，青山叫过青岙也就无可非议了！

人们对“青岙即今之青山”论心怀狐疑还有一个原因，则是对青山陈氏宗谱及地情缺乏深入了解。

二、未知陈谱地情史 焉知青岙事实真

(一) 以宗谱为凭。宗谱是地方历史资料，是地方宗族的档案，是最原始的史料，是补史、证史的第一手资料，故可补正史阙遗，亦可用以厘订史实。宗谱信度相当高，有时比正史更准确可靠，因而它的原始材料是

由每户个人提供的，并经过逐户逐人逐项进行多次审查核对，在确保准确无误的情况下，才得以付印。

青山陈氏今有康熙、道光、同治时代的三种宗谱，在文革伊始放置一户陈氏人家墙洞里才保存下来，这是特别珍贵的原始档案。比如说，康熙癸未（1703）重修的《青山陈氏宗谱》载：“陈宜中生于宋嘉定戊寅（1218）五月十八日丑时，卒于元至元庚辰（1280）三月二十日寅时。”宗谱对陈宜中的生卒年记载得非常具体明白，能够精确到具体的“时辰”，人们对此不得不确信。再如，“青岙即今之青山也，青山为与权公（与权，为陈宜中字）旧游地，其后守益公迁居青山，亦继与权公之志也。”其中“青岙即今之青山”论，在康熙、道光、同治《青山陈氏宗谱》三种宗谱的序文里、人物传记中时有出现。所以对此论不得不信，不信也要信。不管是真是假，青山陈氏能够拿出三种不同旧谱，并经温州市博物馆专家科学鉴定论证得以确认，这是铁证如山的事实，还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呢？

（二）三度居青岙。“青岙即今之青山”论，其理由是：青岙是陈宜中旧游地。其根据有三：第一次，明王瓚在康熙陈谱的《原序》中有说，陈宜中在宝祐四年（1256）因论丁大全，托病遁迹青山（青岙）；第二次，康熙陈谱艺文部分《乞恩养病疏》有载：咸淳八年（1272）六月二十五日，陈宜中因国事繁忙，累垮身体，获皇帝特许，暂归田里青山养病，他在养病期间赋诗《病起》提到青岙：“青岙和风弄夕阳，桃花逐水映红妆，赤心保国平生愿，敢谓闲居意味长。”第三次，据《宋史·兵志》记载，德祐二年（1276）正月十八日深夜，归隐温州（青岙）。据《郡庠士朝益公纪略》记载：“六世祖与权公为宋左丞相，时与朝臣不合，退隐青岙，即今之青山也。”并记载，青山又是陈宜中亲手组建、指挥“乡兵”抗元的重要训练基地。他在《答文相公讳天祥书》中说：“宜中幸今病稍痊，纠聚乡兵，十日内，议与足下会师于江口。”上述三方面又为“青岙即今之青山”提供了可靠的文字佐证。

其实，陈宜中隐居青山（青岙）还有另一个道理。科举时代，《易经》

为群经之首，是必考科目，凡进士者咸谙其理。山之岿者，山之属也。山、岿在《易经》六十四卦中谓之“艮”。《序卦传》：“艮者止也。”艮为山；止为静止，引申为官者停职保身，隐居山里。意思是说，艮卦二山相重，上下敌对，应该停职隐退，隐居山中，歇脚养息，不失正道，避免灾祸。江之奥、海之澳者，皆水之属也。水在六十四卦中谓之“坎”。坎，含险、险之义。上下重坎，有重险，凶也。作为二名进士（榜眼）陈宜中，熟谙卦理，定能顺应卦道，无疑选择青山（青岿），而绝不会知理违道去选择青奥或清澳呢。

（三）**事实胜雄辩**。证明陈宜中是青岿（青山）人，不但拥有证据确凿的康熙、道光、同治时代三种不同的宗谱，而且还有铁证如山的清初、民国初的两方墓碑佐证。

人们有目共睹的是，在去往青山尖石梯路中途两旁，筑有两座圈椅型的古墓，一座位于路南首，其铭志为阴刻楷书“青岿和菴陳公壽塋”的古旧青石碑，由于经过300余年的风雨剥蚀，至今字迹依稀可辨。据康熙陈谱记载，墓主系十八世祖和庵公，即陈国玉，字德璞，生于明崇祯庚午（1630），世居青山。青山本地人在自己的家山上树立“青岿”二字的墓碑，可见，在明末清初之前，“青岿”必定是青山的曾用名。从“寿”字看出，该墓为陈国玉生前所筑。

另一座位于路北首，墓主为青山陈氏第廿五世祖琴山公（1850-1909），讳学勤，字志勉，为夫妻合葬之墓。其铭文阴刻楷书“清青岿陳公四位之墓”的青石碑，字迹清晰。其四位先人为陈学勤之先祖，其中两位是陈氏十三、十四世先祖，另两位是二十几世，名讳生卒俱阙，无可考证。墓碑立于民国九年（1920）冬。此两方铭志，非但提供了可靠的文物证据，更印证了“青岿即今之青山”论。至此，青岿即青山，已经真相大白，毋庸置疑。

据康熙陈谱记载，陈氏二世祖世善公、三世祖伯理公、四世祖安惠公、五世祖恭僖公均长眠于青岿白岩山，即今龙湾区环一村（上陈）门前山的

山脚。陈宜中虽居温城，但他始终不忘自己的祖宗、自己的根在青岙（青山），作为素以忠孝美称的陈宜中，每年一度清明节，他无疑会来青山扫墓祭祖。另据原瓯海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娄文溪先生编撰的《青山》一书中说，陈宜中为景定三年（1262）榜眼，在宋代，凡一甲三名均称状元。青山陈氏第十一世祖守益公，自明成化九年（1473）初秋始，每年到青岙东谷庵莲花芯斜岩山坡拜谒陈宜中状元公，并将东谷庵水库坝以南的莲花芯斜岩，取名“状元岗”，同时将状元岗到莲花芯以上的8亩岩坪亦谓之状元岗。为何择斯地命名？许多读者认为，当年陈宜中也许隐居东谷庵。这些记载，不但丰富了人文底蕴，更为“青岙即今之青山”论提供了史实根据。

（四）诸文见青岙。一是“谱序见青岙”。赐进士第通议大夫东阁大学士礼部右侍郎作序：“……予按陈氏自赤岸徙居永嘉，至宋季始显，若与权与可诸公，皆倾动当时，声施后世。青岙守益公一派其嫡裔也。子孙聚族，世家於兹，凡历年所，今家乘纂修告竣，嘱予弁言……”二是“寿序见青岙”。金璠《最庵先生寿序》：“陈为瓯著姓，甲科宦业，载在郡志可考。六世祖与权公为宋丞相，游览至青岙，爱其地灵秀，小筑数椽于青山之麓。”三是“纪略见青岙”。《郡庠士朝益公纪略》记载：“公讳诰字朝益，郡庠士守益公冢嗣也。六世祖与权公为宋左丞相，时与朝臣不合，退隐青岙，即今之青山也。”四是“函件见青岙”。《答文相公讳天祥书》提起青岙：“宜中蒙圣恩，放归养病青岙。”五是“诗中见青岙”。陈宜中在青山养病期间心怀家国之情，作绝句提起青岙：“青岙和风弄夕阳，桃花逐水映红妆，赤心保国平生愿，敢谓闲居意味长。”这些序、传、函、诗中处处出现“青岙”之字，为“青岙即今之青山”提供了可靠的文字史料佐证。然而，研究“青岙即今之青山”并非目的，尤为重要的是给后人以教训以启示。

三、厘清三地混淆名 正本清源以启示

自青山陈宜中研究会成立以来，人们一直对青山陈氏谱论“青岙即今青山”，议论纷纷，大多都持否定的态度。在温州境域内，与青岙同音的地名不多，但人们耳熟能详的则是青岙、青奥、清澳这三个同音不同名的地名。为什么竟然如此议论纷纷呢？其根本原因，就是一些专家学者将“青岙”“青奥”“清澳”三个不同地名混杂起来，以为青岙即青奥，从而推出“青奥即青山”之结论，原来是跟康熙《青山陈氏宗谱》中“青岙即今之青山”背道而驰，这样一来，让人进而否定了青山陈氏是陈宜中的后裔。

本文以康熙陈谱记载的史实为依据，通过以上文字的诸方面论述，厘清了“青岙”“青奥”“清澳”三个不同地名的关系，不可张冠李戴，更不可相互借用，从而充分证明了“青岙即今之青山”论并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而是有其文物史料及文字史料作为确凿的证据的。

这也为我们提供了至少有五个启示：（一）我们提出所研究的课题，首先要观点正确，不要脱离实际，要符合客观存在的实际。（二）地名是一个地方的身份证，要区别一个地名，至少要做到三符合：一要符合宗谱所提供的原始地名；二要符合地名字形；三要符合所处地域位置。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区别各个不同的地名。（三）没有调查便没有发言权。我们不要对不了解的事轻易下结论，不要对尚未为人所知的领域作出错误的判断。我们要从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出发，作好调查研究，力求做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四）一个人的理解力是有限的，即使是对同一件事，不同人往往也有不同看法，不要将自己的理解强加于他人，并一直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五）我们不但要尊重客观精神，而且还要尊重原始记录的资料，实事求是，我们对历史的一切理解与解释，必须建立在唯物主义的信念之上，以承认客观历史事实为前提，将过去所发生的一切真实地叙述出来，恢复历史本来的面目。我们不能随意地剪裁历史，不能断章取义地乱搬与硬嵌，也不能把某些主观假设当作客观规律

应用于各个历史阶段。总之，历史并不是想当然、随心所欲地运用文字修辞的美学效果，历史毕竟是一门有根据的科学。

参考文献

[1] 《陈宜中第一期研究史料》（摘要），温州市龙湾区永中街道龙锦社区管委会、温州市龙湾区青山陈宜中研究会（筹）2015.6

[2] 《陈宜中研究专辑》（龙湾史谭增刊）总第十四期，温州市龙湾区历史学会、温州市龙湾区青山陈宜中研究会编，孙建胜主编，2016.4

[3] 《宋末宰相陈宜中》，中国文史出版社，潘猛补著，2017.8

[4] 《宋末丞相陈宜中纪念册》，温州市龙湾区委史志办编，2018.7

[5] 《中外学者研究宋末丞相陈宜中资料汇编》温州市龙湾区青山陈宜中研究会、温州市龙湾区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陈钧贤编著，2018 创刊号

游老鼠山想到的

郑锦春

新春第一游：老鼠山。

老鼠山，位于温州市鹿城区藤桥镇渡头村。它是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山丘，海拔61米，山体面积36公顷，因其形似老鼠而得名。殊不知，在新世纪初经考古发掘，证明我们温州人的祖先，4000年前曾生活在这里。

2002年1月1日至4月16日，老鼠山遗址进行了全面发掘，面积达635 m²，发现史前连片的石构建筑遗址，清理史前墓葬35座，唐代竖穴坑墓6座，采集到石器、陶器、瓷器、铜器等各类文物1000多件，以及大量的陶片标本。5000年前温州人烧出的黑陶，重见天日。老鼠山遗址的发掘，确定了“好川文化”的命名，使我们明确认识“好川文化”是继“河姆渡”“马家浜”“良渚”文化以后，以瓯江流域为主要分布区的一支史前文化。

于是，新闻媒体曾从多角度报道了考古发掘及文化类型。2005年，浙江文物网正式将老鼠山遗址列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年代属新石器时代。是浙江温州地区发现的第一个有明确文化堆积的遗址，文化内涵与好川遗址属同一文化类型，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对深入研究浙南新石器时代聚落布局的特点及社会结构等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新浪新闻曾刊发《浙南从此有“好川”——一座叫“老鼠”的山改变了浙南》。浙江省资讯发布《温州人，四千年前生活在藤桥上成的老鼠山上》。听藤桥的同志们说，

现已开建“遗址”公园与博物馆。

早晨起来，看到窗外下着雨，犹豫了一下，还是决定按计划驱车藤桥，以了却到老鼠山看个究竟的心愿。当车子在戍浦江畔的渡头村停下，就看到了我们祖先择山而居的老鼠山。从刻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曹湾山遗址公园”的影壁后上山，小道逶迤，坡陡路滑，泥泞不堪。尽管留神还恐摔跤。没走几步，就下来了。此时，忽然想起宋人苏轼《观潮》绝句，“庐山烟雨浙江潮，未至千般恨不消。到得还来别无事，庐山烟雨浙江潮。”

今天游“老鼠山”，但看到的是“曹湾山”，大概是“别名”吧。询问后得知，当时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时，认为“老鼠”不雅，将温州人祖先“居住地”这一地方，改名为“曹湾山”。2013年5月，国务院核定公布“曹湾山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记得小时候务农时，生产队有几位相当于祖辈或父辈的长者，名为“三姆”、“姆儿”、“姆老”、“唐姆”等。你说俗，真可谓俗到底了；你说土，可以说土到家了。但是，从未听闻其后人有改祖宗土俗之名的动念。有时回老家，常听到“某人某人是“三姆”的孙；某人某人是“姆儿”的玄孙。这不但没有给人不雅的感觉，反而觉得亲切、自然。其实，在我们国家里，不乏以“鼠”命名的名称。福建泉州市就有6处含鼠的地点，即老鼠田山、老鼠坎山，老鼠拖鸡山；老鼠田村、老鼠坂村；还有鼠母宫等。广州市番禺区有一座山也叫“老鼠山”，至今还流传着乾隆盛世下的黑暗——“老鼠山鼠猫勾结案”。

老鼠，也有其积极的文化意含。在古代，曾广为流传“鼠咬天开”的传说，老鼠成为开天辟地的功臣。老鼠跻身十二生肖之首，其民间传说既典型，又有趣，因而成为吉祥的象征物。明宣宗朱瞻基的《苦瓜鼠图》，意为多子多孙，富足有余。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其寿最长，故俗称老鼠。”考古发现，鼠是现存最原始的哺乳动物之一，有动物中古老的“活化石”之誉。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万建中教授认为，鼠文化是中华民族神话时代的产物，是人类开创世界、征服自然的艺术反映。由此可见，随意更改地名，或许是对历史缺乏应有的了解，或许是对文化没有辩证的认知。

1992年，联合国第六届地名标准化会议9号决议指出“地名有重要的文化和历史意义，随意改变地名，将造成继承文化和历史传统方面的损失。”2007年第九届地名标准化会议上，在中国等国家推动下，大会作出“地名属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决议。1986年，国务院颁布《地名管理条例》，规定地名必须保持稳定性，除重要的、名不符实的，或带侮辱性、歧视性等非改不可的地名外，其他无特殊理由的地名，原则上不改。各级政府及地名机构，应该汲取任性更改的教训，增强法治思维，对地名更改持慎重的态度。否则，任性更改地名，地名就“焕然一新”，乱得谁都看不懂地图了。



王剑峰摄

江山亦要文人捧

陈颜玉

郁达夫“咏西湖”诗云：

楼外楼头雨似酥，淡妆西子比西湖。
江山亦要文人捧，而今堤柳尚姓苏。

此诗感慨自然景观离不开人文景观。人文融入自然，二者相得益彰，才能使自然景观更具魅力，游人才会流连忘返。

要让温州变得更亮丽，必须提高温州文化品位。仅花上许多财力、物力，把江心夜景妆扮得花哩胡哨，是远远不够的。作家戈悟觉首倡把江心屿建设成为“诗之岛”，是很有见地的。园林景观建设增浓文化味，是旅游景区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但这又不是随意幻拟名目，胡编乱造：这是蟠龙那是卧虎，所能奏效的。至于海盗船、过山车、大转盘之类现代机械游艺玩意儿，只能作为景点的点缀，说白了，只不过是“以景养景”，多收俩钱罢了。

有计划地深入开发人文景观，旅游景区才能真正得到高水平的开发与提升。当然这不是急功近利、一蹴而就的事儿。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其实，枫桥、寒山寺，景色并无出色之处，但因了张继这首诗，千百年来，它吸引了无数中外游客，枫桥、寒山寺、寺里大钟，都成了国

内外游人向往并云集的名胜古迹。庐山瀑布，远比不上黄果树瀑布之巨大，龙秋飞瀑之险峻，但与李白的诗“日照香炉生紫烟”连在一起，它就名震环宇了。今日游庐山，不去看看李白所咏的瀑布，似乎也就对不住这位“诗仙”了。

秦淮河，只是南京一条穿城而过的小河道，曾经几乎成了一污浊小河道，貌无惊人之处。

秦淮河能长留人们心中，是它让人想起了“秦淮八艳”，想起了“女侠名姝”，大义凛然，远胜须眉的一代才女柳如是；想起了血溅媚香楼，桃花扇底看南朝的“香坠儿”李香君。也就是说，秦淮河留给后人的，不只是一抹金粉，胭脂文化。深入一步读秦淮，我们在脂粉之外还看到了民族气节、侠义之风。孔尚任遍访遗民，收集资料，写出了名著《桃花扇》，大学问家梁启超为之作注；近代史学大家陈寅恪教授花大量时间，搜集众多史料，写出洋洋洒洒八十万字的《柳如是别传》。在河网如织的江南水乡，像秦淮河这样的小河道，最平凡不过。只因那一带酒楼画舫，管弦笙歌，“八艳”遭遇，家国兴亡，迭经历史风雨，后代众多文人墨客，尤其是经唐刘禹锡、杜牧及清孔尚任《桃花扇》、吴敬梓《儒林外史》等题咏、渲染，早已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后人“夜泊秦淮”时，那怕心境寂寞凄清，而面对秦淮人家，也不由得会想起六朝金粉的繁华喧闹，及明末清初那段历史留下的模糊踪迹。现代散文名家朱自清、俞平伯在他们各自所写的同名散文《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二文中所描述、抒发的，便是。

再者，秦淮河畔，除“八艳”之外，留予后人的人文景观多多：当我们在乌衣巷口看到火红耀眼的一抹夕阳，自然会记起刘禹锡的诗句：“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入眼的只是野草花，夕阳斜，堂前燕，百姓家。诗中画面平淡，也无惊人之语，却使人看到了历史，看到了豪门权贵衰亡的必然性，炙手可热的权贵只不过是漫漫历史中的瞬间。站在秦淮水文德桥上，想起农历十一月十五，文德桥两边河中各有半个月亮的传说，也会想起吴敬梓题诗：“天

涯羁旅客，此夜共婵娟。底事秦淮水，不為人月圓。”寥寥二十字小詩中，有景也有情，感慨良多。

游紹興，除魯迅故居、鑑湖外，沈園自然也是必去的。沈園里發生的故事，兩首《釵頭鳳》詞句勾勒出的陸游唐琬愛情悲劇，實在是太淒美了。唐陸婚變對兩人的打擊太沉重太殘酷了。唐琬恹恹成病，憂郁死去。陸游終身不忘，後來不斷吟詩懷念這一段生活。四十年後，陸游舊地重游，寫了二首《沈園》：“城上斜陽畫角哀，沈園非復舊池台。傷心橋下春波綠，曾是驚鴻照影來。”“夢斷香銷四十年，沈園柳老不吹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吊遺踪一泫然。”小小石板橋勾起了陸游的傷心往事，橋下春波蕩漾，依然碧綠澄清，只是驚鴻杳然，不見蹤跡。照影的驚鴻，自是指唐琬，而詩中所謂的“橋”，只不過是長約三尺寬二尺余的一方石板而已，平凡得不能再平凡。可人們從中窺見了當年“紅酥手，黃縢酒，滿城春色宮牆柳”，窺見了當年唐琬的倩影及“東風惡，歡情薄”，陸游那顆淅淅滴血的心。這位地家娘（婆婆）莫名其妙地棒打鴛鴦，活活拆散了一對恩愛夫妻。一說是援“七出”之一：無出。可他們婚後連頭帶尾才三年啊！唐琬還是老夫人的內侄女呢！真是“千錯萬錯都是老夫人的錯。”有人（毛晉）說陸游的《釵頭鳳》一詞，“孝義兼摯”，可是我們看到了的只是血淋淋的封建禮教吃人的本質。後人讀陸唐二詞，自不吝一掬之淚。

泰山，五岳之首，矗立在齊魯平原之上，奇松怪石，飛瀑流泉，隨處可見。孔子曰：“登泰山而小天下”。東岳，氣勢偉岸，頂天立地，威武雄壯。上下五千年的中華古文明在泰山處處留下蹤跡。登泰山，猶如在讀一部輝煌燦爛的中華文明史。正像李健吾先生所說，不登泰山，你會感到心中欠下了一筆債似的。

近年來，旅遊熱潮湧起，人們也開始關注開發人文景觀。仙岩梅雨潭邊新建了一座玲瓏小巧別致的三角形“自清亭”，亭內立一座三棱體石碑，碑上面鐫刻著溫籍書法家鄒夢禪所書的朱自清先生的美文《綠》。文美，字美，景美，三者融為一體，有點意思了。只是亭子稍顯得小了一些，有

点小家子气。文成南田，处处可见刘伯温留下的踪迹。刘文成故乡之文化底蕴也确实值得大书特书。自然与人文揉合，增强了山水景物的无穷魅力。

尽管杏花春雨时节江南，西湖眉眼盈盈，艳比西子，试想，设若西子湖头缺少了白居易、苏东坡、岳武穆、张苍水，甚至苏小小，济癫僧，西湖景致将为之逊色多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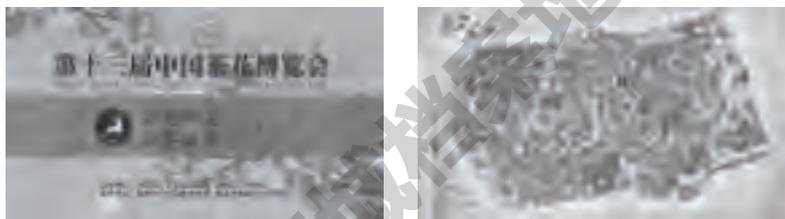
美化鹿城，提高温州旅游知名度，不能光靠灯彩装饰。江心屿，除建碑林，刻上历代诗家题咏，还可建一芙蓉园。古代瓯江中游两岸遍植木芙蓉，可谓“芙蓉国里尽朝晖”。故瓯江一度也曾名芙蓉江。芙蓉花一日三变色，时白时粉时红，气度华丽雍容，一如牡丹。园中也可立若干咏花诗碑。温州江滨路上除郭璞塑像外，还可以竖上几多富古典艺术气息的雕塑，多建几座装饰古朴的长廊。

风流蕴藉，瓯越一脉，温州既有雁山瓯水秀丽风光，又有博大精深文化内涵，谁敢笑我温州是“文化沙漠”！

当年温州，那一场“茶花梦”

天 霖

2022年3月4日，温州多家媒体刊发了一则消息：温州将于3月5日至12日举办“第十三届中国茶花博览会”。



温州举办“第十三届中国茶花博览会”

这则消息勾起了笔者的一段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席卷温州城乡的两场炒作风潮：“山茶花风潮”和“五针松风潮”。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某一年，因为风传香港市面上山茶花价格奇高，有头脑活络的商贩因把内地的山茶花倒卖到香港市场而一夜暴富。于是在温州的大街小巷，几乎是千家万户都立马参与到这场倒买倒卖山茶花的“击鼓传花”游戏之中。不管是开店的，办厂的，摆地摊的，卖烧饼松糕馄饨米面灯盏糕的，开理发店的……几乎所有人都一股脑儿做起了“山茶花暴富”的发财梦。借款举债，典金当银，大肆收购囤积山茶花转手倒卖，以

期大赚一笔。

笔者当时的单位处于市中心广场路和府前街交界处的丁字路口，也就是当时的人民广场西南侧街角。从二楼办公室窗户望下去，马路对面有一家原本是修理自行车的店铺，店主叫“阿琦”（化名），修车技术很不错，据说收入很可观的，这时也不再接单修理业务，关了店门，不知从哪里倒腾过来一批山茶花，在门前的人行道空旷处满地摆开，夫妻俩一叠连声吆喝叫卖。

此番炒作初期，确实有人凭借灵敏的嗅觉和时间切入点而大赚一笔。他们一夜暴富的故事经过口口相传，在坊间家喻户晓，成了市民们津津乐道的热门话题。然后又“激励”着更多的人像打了鸡血似的加入这场炒作大军的队伍。

可惜好景不长，没几天，香港市场山茶花饱和，中间商不再收货，价格顿时一落千丈，不计其数的山茶花沦为垃圾，不知多少人的暴富梦化为泡影，有不少家庭因此而负债累累，倾家荡产。

有人说“鱼的记忆只有七秒钟”，但那个时候温州人的记忆好像也多不到哪儿去——没过多久，市面上又传来了港澳市场五针松价格飙涨的“利好消息”，据说两三簇松球的五针松苗木可以卖到一百多元钱（为当时普通工月薪的两倍多），到处都有人因为倒买倒卖五针松而一夜暴富！于是包括“阿琦”两夫妻在内的许多温州人又“满血复活”地一头扎进了“五针松致富”的幻梦之中，把“山茶花致富”的剧情再度重演一次，然后又亏得血本无归，欲哭无泪。

时过境迁，这两场炒作风潮早已淡出温州人的记忆，但炒作之风却在一些温州人心底扎下了根，然后就是“炒楼炒房”“炒煤炒矿”“炒资本运作”……最后导致温州的实体经济日渐衰微，制造业一蹶不振，经济指数下滑，这其中的教训应该被深深记取。

忆温二中二三事

黄兴龙

1960年，笔者入温州第二中学开始全新的学业。每天从华盖里32号的家中，到达位于海坛山麓的温二中，步行十多分钟，途经河西桥、瓦市殿巷、文史巷、康乐坊、嘉福寺巷，直至校大门面向永宁巷的温二中，全程一公里多。

偶尔的机会，当我面对“温二中六三届初中（丙班）毕业生合影”，照片中20位充满稚气的男同学，15位犹如蓓蕾初开的女同学，及16位老师（前排端坐12位，第二、第三排左右各站立1位），不禁思绪万千。

一、新式校园 苏式教育

温二中海坛山校区前身，始建于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当时系基督教会在温州创办的规模最大、教学设备最现代化的教会学校——艺文中学。

步入校园，显眼的是1954年建造的“三好楼”和“五爱楼”。在冬青树和盛开鲜花的簇拥下，是那么的典雅和华丽。继续前往，就是高耸入云、造型奇特的图书馆和教务处大楼。学校的操场也比我们原来小学的操场，不知大了多少倍。

记得老师向我们这些新同学介绍说，温二中的教学设备是我国最先进

的。它与杭州二中，同为浙江省以苏联模式开展教育的试点单位。樟木制作的课桌、课椅，通体漆成棕黄色。一半略带坡度的课桌桌面，可向上打开从里面取放书本等学习用品。宽大课椅带有靠背。在这样的环境里求学，是何等愉快之事。

升入二中前，同学们就读的县学前、四营堂巷、朔门、新码道、跃进等小学，都是由庙宇等古建筑改建的。其校舍之破旧、教学设备之简陋，是难以言喻的。特别是位于温二中正北面的民办跃进小学，就流传着“跃进小学，背凳背桌”的说法。意思是说在这里上学的小学生，都要自带凳桌以当课桌椅。各家的凳桌，可谓千姿百态，高矮新旧程度各不相同。跃进小学似然名声如此，但其校址前身却是大名鼎鼎的白鹿庵。

相传郭璞建造永嘉郡城时，一只口衔粉红色杏花的白鹿，出现在郡城西南郊，接着向东北方向奔跑，最后消失在海坛山麓。白鹿衔花被视为吉祥的象征，后人就把永嘉郡城称之为“白鹿城”。在白鹿消失的地方，兴建了白鹿庵和郭仙庵。在白鹿出现的地方则兴建杏花堂（原位于鹿城路与雪山路交叉处的大樟树下）。

“五爱楼”后面有小树林，植有不少数十年树龄的香樟树。绿荫如盖的大树下，有序地摆放着花岗岩制作的长条形石凳。这里也是许多来自瑞安、平阳等县住校生早、晚自修的理想场所。

二、校园周边古迹众多

温二中附近古迹众多。校园南面仅一墙之隔的飞檐翘角古建筑，就是原天宁寺大雄宝殿（今解放军的118医院内）。该寺院始建于五代后晋天福三年（938），高祖石敬瑭敕建报恩光孝禅寺。北宋政和年间（1111-1117）改名天宁寺。寺内原有华严、妙峰及贝叶生香阁。明初逆川大师受戒于此。天宁寺与嘉福寺、护国寺、太平寺一起，共同被誉为“内有嘉福天宁、外有护国太平”的温州四大古刹。

校园的东面是海坛山，山顶原有始建于唐代的杨府庙（现温州国际海员俱乐部址），山门上有清末举人池仲霖撰写的楹联“入门便是登云路，出相争传涨海沙。”就是指明代海坛沙涨，温州黄淮、张璠相继“拜相”的故事。杨府庙旁的那棵古樟树，于1994年3月列为“古树名木”。

校园的西面是永宁巷、七枫巷和打绳巷。永宁巷82号有始建于晋代的永宁殿。温州建城后，人们就在此建祠奉祀东瓯王，世称“永嘉地主昭烈广泽王”，以供膜拜。明成化十三年（1477），永嘉知县文林（明代四大才子之一文徵明的父亲），见此地“庙旧狭隘”，向朝廷奏议并获准，将东瓯王塑像移供华盖山西麓的新东瓯王庙。

校园的北面则是瓯江。登上温州东门与朔门的分水岭——海坛山岭背（后被炸平，即今望江路东瓯大厦址），举目远眺，江心屿的双塔和瓯北的罗浮双塔，在滚滚波涛的交相辉映下是那么地瑰丽。

三、中苏交好 互通书信

上世纪五十年代是中苏关系的蜜月期。“苏联今天就是我们明天”是当时喊得最响亮的口号之一。为了更好地向苏联学习，全国各地也都掀起全面学习俄语的热潮。

教我们俄语的李醒吾老师，乐清人。据说他以前曾任国民党政府中的俄语翻译官。他朗朗上口的标准俄语，及其高高的鹰勾鼻、深眼窝，简直就像个俄国人。

在李老师的指导下，我们班里的项邦华、胡福林、童人本、陈清清、戴笑笑、陈白棱、吴志旺、潘中妍等同学，还与苏联莫斯科、列宁格勒、乌克兰等地的七年级（苏联属10年一贯制学校，相当我国小学到高中毕业的12年学习）学生建立通信联系。双方互相交换个人照片及小礼品等活动。从苏联寄来的小礼品有卢布（钱币）、风光明信片、影集、红领巾、铅笔芯等。从温州寄去的有十分精美而小巧玲珑羽绒鸟、书签等工艺美术

品。双方都玩得乐此不疲。

当时与苏联通信的同学，会经常到传达室查看有无自己的信件。如发现其他同学的来信，也会带回教室当众宣布：某某同学，你苏联的朋友已来信。接信者的脸上，马上流露出一种难以掩饰的幸福感。我还发现苏联同学的个人照片中，不乏典型西方面貌，人见人爱的高鼻梁、大眼睛、卷头发的小帅哥和小美女。

项邦华至今还珍藏着当时从列宁格勒一所学校寄来的高档影集、照片，以及至今色彩仍然艳丽的丝绸红领巾。

项邦华影集上有俄语题词，后经我们班里俄语成绩最好的童人本翻译才知，“项邦华：祝贺你在新的年里生日快乐并取得新的成功！你的朋友勃拉加·盖·斯拉尼。1961年2月。”项邦华同意笔者提议，愿将上述礼物捐赠温中校史馆收藏。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随着中苏关系进一步交恶，充满童真的学生之间通信，亦被中断。

四、生物课程 活学活用

教我们生物的是汪云享老师。他身材瘦小，头发花白并略呈驼背，理着平头发式的脸上架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其声音虽然有些嘶哑，上课时还是讲得那么生动精采。

教务楼前面，有一株高大的银杏（俗称白果）树。每到秋末冬初，美丽的金黄色扇面形银杏树叶，就会洒落一地。汪老师在上课时，就会不失时机地向同学们介绍：银杏树属于遗类植物，系当今植物中的活化石。树上累累的白果成熟后，会自然地掉落地上。剥开外面烂熟而软绵绵的果肉，就会呈现出具有坚硬外壳的白色果核。用石头敲破外壳，里面则是淡绿色果仁。有人说炒熟了能吃，也有人说有毒不能吃。总而言之，我还没见过哪位老师或同学将它捡去炒了吃。

1961年，我国经济进入最困难时期。不得已，学校的花圃也都被开辟为小菜园来种瓜种豆。教生物的汪云享老师，则自然而然地成为指导大家开荒、种菜、养猪、养牛的好把式。

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汪老师交给我一张字条，叫我到水心的地头田间（今水心住宅区址），去找一个名叫阿定的生产队长，要一些蔬菜种子给学校用。

那时候，这个区域是名符其实的四周河流环绕的“水心”。我从小南门“渡船儿头”（今“得月花园”内）大榕树旁的船埠头，上了一艘两头麻绳系两岸的四方形小渡船，使劲手拉绳索将该船逐步地位移对岸。只见广袤的田野上，三五成群的农民在挥锄种植蔬菜。同是一个村的，彼此都认识。我很快找到阿定队长并说明来意，他说已知此事，就把事先包好的菜籽交给我，并请我向汪老师问好。这是我首次单独到一个陌生地方完成的工作，因此终身难忘。

我是美术爱好者，为提高教学质量，我还应邀替汪老师画了几大幅彩色的“甘蓝”教学挂图。他说学校里有教学经费，要给我工钱（请社会人士画画也要付报酬）。当然，这些钱无论如何也不能拿，能为教学服务就是我的荣幸。

五、兴趣活动 精彩纷呈

当时的初中课程，主要有语文、数学、政治、历史、地理、生物、化学、物理、俄语、美术、音乐、体育等。但其中最令我感兴趣的还是美术课。

初一时教我们美术的是章华景老师，平阳灵溪（今苍南县城）人。刚从温州师范学校毕业。因其住在校内，我们之间就有了比较多的接触。布置典雅得体的单人寝室中，就挂有一幅他自己创作的色彩缤纷的《牡丹图》，两旁则是他亲笔书写“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每到星期天，他便带领我们爱好美术的同学，到华盖山大观亭、中山公园湖心亭等处写生。

初二年级时教我们美术的是吴思雷老师。他出生书香门第（父亲是著名诗人、学者吴鹭山），天资聪颖，曾就学于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附中，并得到潘天寿、夏子颐等大师的悉心教导。中西美术、书法流派、绘画理论，他样样精通，深得同学们的尊崇。温二中的兴趣小组，主要有美术、书法、乐队、文学、航模、体育等兴趣小组。

因为从小酷爱画画，进入中学后，便在第一时间加入美术兴趣小组。初中美术课设有素描、色彩、构图等基础课程。相比小学，初中学校不论在师资力量或图书资料方面，都高出一筹。在小学里，我只能临摹一些连环画中的图像，及默写当时街头巷尾到处可见的诸如“亩产稻米十万斤”“钢铁元帅升帐”等宣传画。在温二中，图书馆藏有许多书籍供同学们借阅。记得有次我借了一本大型精装的画册带进教室，同学们觉得好奇都想欣赏一下。当几个女同学看到里面有许多男女人体画时，立即丢下画册，红着脸大声地尖叫：“皇天啊，天下怎么还有这样的书籍！”调皮的男同学则纷纷说：“给我看看，给我看看！”面对此情此景，我只能给他们一个无可奈何的微笑。

在这里，我知道了西方的文艺复兴，也阅读了达芬奇、米开朗杰罗、拉斐尔等艺术大师的传世之作。

由于勤奋好学，吴思雷老师推荐我当美术组组长。此外，校园里有个用青砖和水泥砌成、长达十几米名叫“红旗报”的黑板报。除学习园地栏目外，还经常配合形势，进行“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等专题讨论。我积极参与《红旗报》的插图和版面美化工作，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一致好评。我记得当时的《红旗报》主编，就是本校的高中生张绍光同学。

当时温二中还有军乐队、空模、海模、无线电、气象等兴趣小组。项邦华参加的是空模小组，项小孟参加的是海模兴趣小组。那时候温州市航模队，都是以温二中运动员为主力并在该校集训的。

1961年参加市航海模型集训的有项小孟、林永声、杨希贞、张海伦、宋祥生等同学。在市体委黄吕锐老师带队下，同年8月，温州市海模队参

加在杭州西湖边举行的浙江省第一届海模比赛。参赛项目有外观、动力、无线、遥控、竞速艇等。温二中的项小孟（我同班同学）荣获第一组第一名好成绩，当时他还手拿着自制的海模在省体委拍了张照片。宋祥生荣获竞速艇第三名，奖励一个内燃机。

1962年8月15日，温州市航模队（空模）赴省里参赛的队员有温二中的施民岳、项邦华、徐柏林及温一中的朱时光等人。温州的9个人在西湖边拍了张合影，其中浙江省航空模型队的梁玉蓉（女）即是温二中的毕业生。

六、高耸塔楼 不复再见

1897年，中华基督教循道公会温州教区（全国七大教区之一），在城



温州二中（艺文中学）图书馆（黄兴龙摄）

区康乐坊创设“艺文小学”，招收20余名儿童入学，后增至一二百人。同年，他们又在附近的瓦市殿巷租房开设艺文书院，招收学生20名。

1903年，该公会在海坛山西麓今温二中址建成艺文书院新校舍，改名“艺文中学”。英籍传教士蔡博敏任校长。9月1日，举行隆重的落成典礼暨兴办学校改革学制演讲会。应邀光临的温处道道台童兆蓉、温州镇总兵刘祥胜、温州府同知吴中俊、永嘉知县程云骥、玉环厅同知吴蓉等地方官，著

名传教士李提摩太博士、瓯海关税务司史纳机、经学大师孙诒让等贵宾，一起参观全盘西化的教学楼、实验室、宿舍、餐厅、网球场等设施。当时，这些头戴红缨帽、项挂朝珠、满身绚丽服饰的清代文武官员，与身穿时髦西装革履，及文雅长袍马褂的人士交相辉映，可谓温州地方史上一次空前绝后的中外名流大聚会。

1904年，传教士苏慧廉的夫人苏露熙在天灯巷住宅（现瓦市殿巷86号）开办艺文女校。1930年循道公会温州教区创办圣道学院，1937年与宁波教区神道学院合并，亦迁址海坛山麓的艺文中学内，更名为“浙东神学院”。

校内那幢有着两个高耸入云塔楼，典型哥特式建筑风格且美轮美奂的原教学大楼，至今早已被拆。无知程度，不亚于抛弃一件古董红木椅而去购置新沙发。

七、峥嵘岁月 共度时艰

1959年至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当时全国一切物资都要凭票计划供应。作为中学生的我们，每个月有24斤的定量粮食供应，虽然吃不饱，还是能将就着活命。

记得有一次，学校大礼堂堆满从各地调集来的一大捆一大捆番茄（地瓜）藤干，我们许多不懂事的初中男同学，在课间十分钟的休息中，都兴趣勃勃爬上小山似的番茄藤堆上，尽情地互相嬉笑打闹。老师见状连忙高声呼喊：“快下来，快下来，这是北方灾民的救命粮！”当时我心里很纳闷，这些硬梆梆的东西还能吃吗？

过了不久，从农村来的亲戚在我家说，附近的乐清、永嘉、瑞安、平阳、泰顺等地农村，均引起灾荒。不久，全国掀起广泛开展“种十边”活动，要求每个人、每个单位都将自己房前屋后以及园林、山坡、河滩等地种上南瓜、丝瓜、玉米、白银豆、球菜、小白菜等农作物。校园里美丽的花坛也被改变成一个个各自为政的小菜园。与此同时，温二中还开展养猪、

养牛等生产自救项目。

我与林春林、徐定好等同学一起，到过矮凳桥、十八家等地河边，淌水拔过几次“革命草”（一种人也可吃的绿色水生植物），给学校里的猪当饲料。我也被轮流到设在灰桥的温二中农场劳动，所谓农场，便是由三间平房与若干亩农田构成。我还当过一次放牛娃，骑在高大水牛的背上悠哉悠哉。后来，随着灾情不断严峻，人也没得吃，哪里还有什么猪和牛的饲料？

如今再看看我们的初中毕业照，那时候同学们正值青春发育期，由于吃不饱、营养不良等因素，个个都显得那么小巧玲珑，虽然精神看起来还不错。

八、师生情义 天长地久

我们（六三）届的初中有4个班。升初二时正值温一中的初中部解散，加上温二中4个班级由于一些留级生的减少，于是就把丁班一分为三，把同学分流到甲、乙、丙三个班级。我到了丙班。温一中来的同学则编排分到新的丁班。

初一时我的班主任是黄宝奇老师。初二、初三时我的班主任是陈天铎老师。当时协助班主任开展班务工作的辅导员，都是由本校高中部的大姐姐、大哥哥担当。每个班级都设立班主席、中队长各一名。另外由同学民主选举出来的4个小组长，及学习、劳动、体育等委员。项邦华是我初二、初三时的班主席，邵金生则是辅导员。

除了帮助我们完成学习任务，辅导员还会利用星期天时间，组织同学们去开展一些有意义的课外活动。有一次，邵金生老师带领我们到江北岸的白水漈春游。白水漈坐落在永宁山半山腰，是条小小的瀑布，据说下雨时才有水，故当地农民称其为“蓑衣瀑”，意思是只有穿蓑衣的时候才能看到瀑布。这里正像朱自清先生在《温州的踪迹·白水漈》散文所描写的，

她是那样的“凌虚飞下，便扯得又薄又细了”。我们几个比较胆大的同学，就在大家围着碧潭席地欣赏飞瀑时，一鼓作气登上高山之巅。凉峰习习，心旷神怡，隔江是温州城，如诗如画，尽收眼底。

在山顶，有一座早已废弃了的别墅。清光绪二年（1876）《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温州被辟为通商口岸。次年英国派赫埔逊（H. E. Hobson）为首任税务司，在温州朔门设立瓯海关（温州海关），兼办内部邮递业务。此时的英国领事馆就设在江心屿。各国洋行及外籍传教士，纷纷来温开展各自的深入工作。温州夏天比较炎热，于是，他们就花大力气将别墅建在永宁山顶以避暑。

与我来往比较密切的，有乙班的施民岳同学。他参加的是航模兴趣小组，这是一个既动脑又动手的高科技体育竞技项目。在国内外的各种航空模型比赛中，身为“空模健将”的施民岳就得到过不少大奖。施民岳后来任职温州市体委航模队总教练、温州市海陆空模型运动协会名誉会长。那些年，我市的航模运动在国内外取得令人瞩目的好成绩。其中胡李胜巧、胜高荣等运动员多次荣获国内外海模比赛大奖，我儿子黄建也在全国航空模型比赛中，得过2枚金牌、1枚银牌。

余霞散成绮

——巽园钩沉

夏新天 杨瑞津



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巽园余霞楼（带尖顶的洋房）房屋侧为护城河。（邵度摄 黄瑞庚提供）

温州有一俚语，叫做“住茅棚厂，打花柳塘格”，意指住在茅草棚的人，却以住花柳塘的排场、规格来行事，喻人行为不切实际，异想天开。为何要以花柳塘来形容高规格呢？是因为蒲阳会馆（花柳塘宫）、茶业公会、益泰源、源泰生等富丽堂皇的建筑就在花柳塘，更因为温州著名的民国富绅杨雨农的宅院——巽园也坐落于花柳塘。

巽园因位于温州斗城的东南，依周易为巽位，故得名。巽园亦称绮园，

有颇具园林形胜的硕大花园，主建筑余绮楼外观西洋风格，迥异于秦砖汉瓦的中国传统民居。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巽园的花园洋楼与温州东南名胜积谷山比肩咫尺，绿水盈盈的护城河和花柳塘河围绕前后，一河之隔，一边是繁华都市，另一边是万顷良田，好一派山水清华的田园风光。府县多任行政主官、来温的达官贵人，几乎都会拜访杨雨农甚至下榻杨宅，巽园名噪一时，几成官家行宫。



1877年，积谷山上向南望，近处可见蜿蜒上山的城墙。山下，由近到远依次为护城河、花柳塘巷、花柳塘河（陡底河），远处有塔者为巽山。与巽山、风水墩几近直线的临河大宅正是杨氏老宅瑞麟堂。（阿查理摄 黄瑞庚提供）

花柳塘，清、民国曾称花柳塘巷，新中国成立初期称建国路，后称花柳塘，文革中短暂更名红心巷，文革后复称花柳塘至今。花柳塘现属鹿城区大南街道，是一条东起人民东路，西至大南路，东西偏南走向的道路。花柳塘南侧的花柳塘河，民国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称陡底河，后改称现名，使人一听就知晓两者的关系。

巽园的主人杨雨农（1880—1951），名振圻，以字行。他参与创办东瓯电话公司、普华电气公司以及国货公司、光明火柴公司、瓯海实业银行等，

是温州商界巨子，曾任浙江省议会议员、永嘉商会会长。其热心温州地方公益慈善事业，如协济善堂、育婴堂、普安施药局等，杨雨农都积极出资出力。尤其是他和温州金融家汪惺时等创办永嘉城区贫民借贷所和永嘉救济院，并亲任负责人，积极帮扶救助温州底层贫困群体，堪称现代“及时雨”。由于善声闻达遐迩，杨雨农还担任永嘉红十字会会长，新中国成立后被选为温州市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代表。



杨雨农(杨瑞津提供)

杨家发迹于花柳塘，时间可追溯至清道光年间，杨雨农父辈兄弟三人从温州近郊里垟（现属鹿城区南汇街道）来到温州城南开设“杨正记南北货行”，主打产品为以温州名产瓯柑为原料的柑饼。因货真价实，风味浓郁，并兼有理气药效，加上杨氏兄弟精心改善其制法，经营有方，柑饼渐成人们居家小吃、请客送礼的重要之选，产品畅销温、处、台诸府县。杨家也从柑饼起家，在南北货行业越做越大，并逐渐进军其他行业，终成温州富甲一方的大亨。

杨家在花柳塘原建有中式传统大宅，七间三进平房，中堂挂有两块匾额：一为“瑞螭堂”，一为民国总统徐世昌题赠“急公好义”。老宅坐北朝南，杨家当年过着中国传统大家族式的生活。杨雨农发达后，购买了老宅东边

的五亩多的空地，委托温州建造洋楼的高手精心打造新宅，历时数年竣工。新宅巽园建成于上世纪二十年代，40岁左右的杨雨农风华正茂，交游广泛，达官贵人频频到访，文人墨客时时雅集，山水洋楼的巽园车水马龙，宾客盈门。杨雨农自号“巽园”，可见其对巽园是何等喜爱有加。



回忆画中描绘的尖顶余绮楼、假山小亭。
杨景艺作于上世纪末。(选自《温州百景》)

巽园落成后果然与众不同，占地 5.19 亩，如果加上西首的七间老宅，几乎占了花柳塘的四分之一，蔚为壮观。巽园位于花柳塘的东段北首，坐北朝南，南对花柳塘主干道和花柳塘河，北与庆福寺、公共体育场和积谷山隔护城河相望。巽园的东面和南面、北面都有气势不凡的大门，东大门紧邻通向积谷山的彩云桥，上方有青石刻“巽园”二字，系杨雨农挚友龙游余绍宋（越园）所题。大门平时关闭，日常主出入口位于整个建筑的西南部，进门即主楼余绮楼。余绮楼一名由温州名绅吕渭英（文起）所取，出自南朝诗人谢朓（字玄晖，世称“小谢”，谢灵运世称“大谢”）的名句“余霞散成绮”。

余绮楼占地约 1.5 亩，外围墙为粉色石英水门汀，质感和颜色在温州都独树一帜。余绮楼外观为欧式风格的二层建筑，内部却又是中国传统的三进式宅院。从大门主通道进入宅院，迎面是一个中式天井（温州俗称



1923年，弘一法师和庆福寺主持、徒弟及众居士合影。背景即庆福寺和护城河、杨宅余绮楼的尖顶。（黄瑞庚提供）

道坦），通道的两侧各有一间家丁门房和一排平房。过了天井是第二进中堂（温州俗称前间），中堂的两边各有居室（温州俗称正间、二间）。中堂后第三进又是一个天井，该天井西侧为厨房和餐厅，旁边有楼梯可供上楼；东侧为客厅。二楼是同样的布局，也有中堂、居室、客厅，二楼客厅的顶上是一个别具特色的尖顶。因新宅内除了装有时髦的电灯电话，杨家还安装了当时温州极其罕见的浴缸和抽水马桶，杨雨农在冲水系统的储水箱外别出心裁的设计了四角伞状尖顶作为装饰。

装饰作用的尖顶，成了余绮楼的标志性特征，也成就了花柳塘的地标建筑。弘一法师旧照的方位及确定庆福寺老照片，都是依照这当时温州独一无二的尖顶来判别的。

东出余绮楼沿鹅卵石小径即进入花园。三米多高的花园外墙由粗石构成，扎实坚固。花园北首是一大花坦，遍栽奇花异草。沿北围墙是带顶棚的曲折长廊，设有长长的美人靠，可供漫步者休憩。长廊南边的美人靠下是二十米见方的荷花池，风荷挺立，睡莲片片，彩鱼游弋荷莲之间。荷池的东边是假山，由深沟浅坑的海礁石和玲珑剔透的太湖石堆砌而成，造型



1940年杨雨农在巽园雅集当时名士高谊黄式苏施仲周洪邦泰、王理孚、刘景晨等（从左到右）。园内可见花木繁茂，刘景晨手持一枝折下的桃花。背景左侧为积谷山，山腰有驻鹤亭；右侧花木后为“松筠”护碑亭。（杨瑞津提供）

怪诞精巧。假山上建有一个别致的小亭，可沿台阶上山，坐亭赏景。假山的最高处竖着一棵珍贵的松皮石（俗称笋石），嶙峋兀立，一柱擎天。假山以南建有养花的暖房，与假山、荷池、长廊构成了一个山水小天地。

过假山再向东就是主花园，绿草如茵，曲径通幽，种植有梧桐、广玉兰等珍稀树木，不少是温州罕见的果树，如荔枝、橄榄，还有杨梅、石榴、桃、李、柑、桔、柚等。每逢瓜果成熟或有新异食材，杨雨农便会邀请温州的文人雅士前来尝鲜品新，吟诗赋词。如刘绍宽（次饶）、马寿洛（祝眉）、黄式苏（仲荃）、王理孚（志澄）、刘耀东（祝群）、叶鸿遇（适庵）、刘景晨（贞晦）、徐陈冕（寄庵）、潘国纲（鉴宗）、陈亦常（守庸）、黄群（溯初）及马范（公愚）、梅雨清（冷生）、夏承焘（癯禅）、王起（季思）等等都常为巽园的座上嘉宾，连化名张嘉仪在温中教书的胡兰成也屡屡在其作品中提及杨雨农和他的宅院。从存世的刘景晨《巽园惠鲜荔枝，赋博一笑》、夏承焘《鹧鸪天·余绮楼啖雪鳗贞晦命赋》、黄式苏《答王季思余绮楼祝捷见酬之作》、梅冷生《洞仙歌·越日杨雨翁复集绮园观梅》

等诗词中，巽园风雅可窥一斑。或许是有感于良辰美景，文士满座，向不闻诗名的杨雨农竟也曾开腔首吟，一众诗人骚客再步韵唱和，留下一段和鸣酬唱的佳话——“诗妒先成索句忙”（刘景晨《赏菊次巽园主人韵》）。

花园的东北角，有“杨节母碑记”石碑一座，并建有六角护碑亭，亭额“松筠”，为民国总统黎元洪手笔。1917年，民国大总统黎元洪授“节操松筠”奖额和“黄绶银章”予杨雨农的养母金氏，以褒奖其贞孝守节。1926年，在金氏年届七十之际，杨雨农建亭勒石纪之。石碑大约高2米，宽1米，由黑色的青田石制成，碑额雕刻精美。碑文由当时浙江省长齐照岩（耀珊）撰，瓯海道尹张宗祥（冷僧）书。

石碑碑文为：

杨节母碑记

中华民国六年之十月，前大总统以“节操松筠”四字额，奖永嘉杨节母金氏，又锡以黄绶银质褒章，乡人荣之。是则浙江省议会议员杨君雨农名振圻之慈母也。阅四年庚申，耀珊初识雨农，雒诵母德，幸金护之健在，挺劲竹而常青。节母年二十结褵，二十四失所天，今年六十三岁，苦节四十年矣，事姑之孝，抚子之慈，三党同称，六姻交赞。是以翔襍集祐，百福骈臻，天之报施，即于人事券也。

鹿城奇岩绝巘，赤水出焉，道书以为第十二福地，分野居婺宿之东，故壶德徽音，时着于世。雨农少多病，赖母氏劬劳，恩斯勤斯，以有今日。思于飞霞山之麓建一亭，并立碑记，表彰藻翰，为潜德光。闻东瓯有两胜景：一曰奎文亭，黄少保准刻御制诗于石，而覆以亭者也；一曰宝纶楼，张孚敬藏御书文札处，上所赐名也。杨君继之，鼎足而三焉。



杨节母碑记拓片，124cm×102cm，384字，由杨瑞明于临安收藏家中重金回购。

赞曰：大孝显亲，扬己之名以显亲，与扬亲之名以为显，皆大孝也。然非得贤母之善教，无以成子之名，是母是子，均足以风世已！

吉林齐耀珊照岩撰 海宁张宗祥闻声书

节母今年七十，宗祥观政瓯海，为补书上石，以敦世道。

中华民国十五年十月吉日

护碑亭的六根青石柱则由当时六位名士各撰楹联镌刻。其中，池志澂（云珊）：“筑亭傍飞霞愿与仙人同母寿，横塘留爱日长将花柳做莱衣”、吕渭英（文起）：“华袞褒扬片石寿，纲常撑柱一亭尊”、张宗祥（冷僧）：“金石不磨桑海劫，松筠长护女贞碑”、孙宝琦（幕韩）：“四世三公征汉代，千秋双阙表瓯江”、汪大燮（伯唐）：“瑞日流辉长荣蕙草，阶花竞秀印荫慈云”、金兆棫（仲荪）：“有大家风堪书女史，具寿者相永树母仪”，楹联铁画银钩，笔墨遒劲，辞采华美，弥足珍贵。

“松筠”护碑亭的楹联拓片，从左到右，撰者依次为池志澂、吕渭英、



“松筠”护碑亭的楹联拓片,从左到右,撰者依次为池志激、吕渭英、张宗祥、汪大燮、孙宝琦、金兆棫。

张宗祥、汪大燮、孙宝琦、金兆棫。

巽园东北比邻号称“山之形胜甲一郡”的积谷山，巽园的借景手法也被用到极致。在园内，但见积谷山巍然屹立亭台楼阁、花团锦簇之间，留云亭、驻鹤亭、卧树楼等胜迹一览无遗，与巽园风光浑然相融，一副仁者乐山的好景色。余绮楼东侧另建有一幢二层楼房，可供访客住宿，以饱览花园风光和积谷山色。

上世纪四十年代，按照战时要求，温州各大花园均需开挖防空壕，以备在敌机轰炸时，供周边人员躲藏避险。巽园也不例外，在花园的东南部挖了一个长十余米宽二米多的防空壕。一次日机飞临花柳塘一带投弹轰炸，正逢温州籀园图书馆馆长梅冷生在杨家做客，梅馆长也切实体验了一把在巽园防空壕里躲避炸弹的独特感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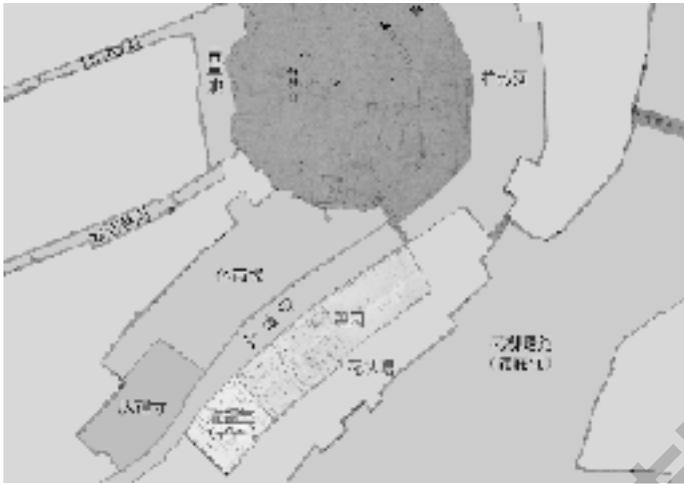
江山代有才人出，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新中国成立后，一代强人杨雨农一病不起，于1951年撒手人寰。之后，杨宅的生活品质便江河日下，愈来愈难承受精致和奢华。别说大宅院的日常修缮是一笔不菲的开支，连地捐契税也逐渐成为沉重的负担。终于，巽园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7000元的价格被出售给温州卫生学校，杨氏家人迁住于不远处花柳塘73号的几个房间。

毕竟对故宅有着不一样的情感，杨氏家人还会时常探视巽园，回顾曾经的点点滴滴。杨宅过后，杨家人几乎是目睹着余绮楼成为卫校教工的宿舍，花园成为操场。虽然花园里的梧桐、广玉兰等绿化依旧，但假山日渐荒废，荷池日渐干涸，后来护碑亭也被拆除，碑更被砸碎（年幼的杨瑞津闻讯而至，好说歹说方从邻家小孩的手中要到一块碑的碎片）。万幸的是，“松筠”护碑亭遭拆后被迁至松台山主山坪，后又因主山坪开建净光塔移至松台山的西坡，成为温州斗城之西南斗魁松台山的一处人文景观。

从花园变身操场，后又成为温州公交的停车场，进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的人民路大改造中，再变成道路和高楼大厦的基础，一代名园巽园最终成为了温州的一个历史符号。



现位于松台山西坡的“松筠”护碑亭。（杨瑞津摄）



依照1936年的永嘉县南市镇16号II 25,155-14E/12W丘形图(局部)标注巽园、瑞鱣堂及周边大致地理标志。——夏志鼎制作(巽园及瑞鱣堂房屋布局图为杨溶东制作)



现代地图：天地图温州标准版——温州市勘察测绘研究院发布



将丘形图缩放至合适比例，叠加到现代地图，重合积谷山两侧的水系和谢池巷、府学巷同中山公园的结合点，就可以看到红色的巽园在现代地图的具体位置，以及蓝色水系的消失、变化情况。（夏志鼎制作）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新开辟的人民东路从公交停车场（巽园）穿过。山顶有亭者为积谷山，山前右为四层的公交办公楼。（孙守庄摄）

温州钱氏子城遗址探考

叶芷甄

瓯越大地见证了温州悠悠两千年的建城历史，自相传东晋郭公观“白鹿衔花”，建“山水斗城”始，逐渐形成了“东庙、南市、西居、北埠、中子城”的城市布局。其中，所谓的“中子城”到底是什么，很多老温州人也未必清楚。这是因为，原来的子城城墙早已在元代就被拆除，仅留下为全城报时的谯楼。

为配合鹿城区广场路片区改造提升项目，寻找子城遗迹，2021年10月下旬至12月中旬，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温州博物馆联合对温州市鹿城区广场路康宁小区地块进行了考古勘探，发现了温州子城西城墙、护城河两侧驳岸及各时期建筑遗迹，取得了重要考古成果，引起了各界关注，并被列入2021年度浙江考古重要发现。



五代吴越国时期子城城墙照（录自网络）

一、子城及谯楼介绍

子城，有时又称牙城、衙城、内城、小城，是指在地方城市中，以围护行政、军事等公共机构为主要目的、修筑于罗城（又称外城、大城）之内的小城。在中国筑城史上，作为城市行政核心的子城以及由它与罗城组成的“重城”形制，渊源甚早，形态构造突出，其遗存与形态框架一直影响到近现代城市的布局与肌理。^①成一农《中国子城考》指出：中国地方城市中的子城“萌芽于汉，产生于南北朝，普及于唐，宋代开始衰落，最终于元末消失”^②。根据钟翀《江南子城的形态变迁及其筑城史研究》的归纳，两宋时期江南的子城，普遍存在于该地区的府、州、军级城市中，均自前代或更早时代继承而来，这一时期子城的规模大体以半里为径，周长在二里左右，其形状较为规整，以近南北向的矩形结构最为常见，因此较多体现了人工规划的意志，多位于罗城的北部或西北部。^③温州子城遗址基本符合上述特征。



旧子城所在位置(来源:光绪《永嘉县志》)

万历《温州府志》载“旧子城在府城内。后梁开平(907-911)初钱氏始筑。周三里十五步(占地面积约6.72平方公里)，通四门，内卫州治，外环以水。元至元十三年废为民居，止存谯楼门址。”^④《十国春秋》卷七十七载：“梁

王冕称皇帝，国号梁，改元开平……是岁，筑温州子城，周三里十五步。”^⑤说明内城建于907年。子城范围东至今解放街后巷，西到城西街，南界鼓楼街，北达仓桥街后巷。四周挖河渠作为护城河。子城四周有护城河，河上筑桥接城门使城内外相通，四处城门上各筑一座城楼，东为“华盖楼”，南为“南门楼”（即谯楼），西城为“西楼”，北为“临圃楼”，主要功能是保卫当时的府治。

元至元十三年（1276）元灭南宋，温州被元兵攻占，为防止军民抵抗，子城城墙被拆毁并严禁擅自重修。一直到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浙东起义军方国珍侄子、时任江浙行省右丞的方明善对谯楼进行修缮，考古发掘出土的晚期城墙可能为此时修建。“从现谯楼西侧开始，长约30米，再往西已无痕迹，此长度与现谯楼东侧保留的城墙长度相当，位置对称存在”^⑥应是衬托谯楼威严的风景墙，并无军事防御作用。弘治《温州府志》卷十六载“玄坛赵元帅行祠在城内谯楼外。”说明此时方氏子城城墙仍存。嘉靖《永嘉县志》记载“赵元帅庙在谯楼西”^⑦，说明此时城墙已被扩建的赵元帅庙覆盖，因而，从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温州府志》成书到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嘉靖《永嘉县志》增修的这一时间段内方氏子城城墙被废弃。至宣统二年（1910）再次修筑。子城城墙虽不复，但被其环绕的地块中心一直为温州官署机构之所在。

遗留下来的是谯楼。“谯门”一称最早见于《史记·陈涉世家》，起义军“攻陈，陈守令皆不在，独守丞与战谯门中。”^⑧《汉书》颜注：“谯门，谓门上为高楼以望者耳，楼一名谯，故谓美丽之楼为丽谯。谯亦呼为巢。所谓巢车者，亦于兵车上为楼以望敌也。谯巢声相近，本一物也。”^⑨谯楼本为城防建筑，负责启闭城门，因其高大宏伟，兼具军事防御功能，成为鼓角陈设的首选。明万历年间乡贤姜准所撰《歧海琐谈》载，温州钱氏子城谯楼设立“铜壶刻漏”，及“鼓更点”，平时值夜打更，按时擂鼓打锣；有军事行动，用六人擂鼓，擂333槌为一通，擂千槌为三通；用五个人吹号角，同吹十二声为一叠，并规定，吹号角三叠，擂鼓三通，战斗即告结束。^⑩唐

代时有地方开始在谯楼中放置莲花漏等计时报时装置，宋代则沿袭唐代习俗，将子城南门作为报时建筑，而南门多为谯楼，因而谯楼就逐渐成为报时建筑。元林彬祖撰《重修温州路谯楼记》载：“按谯楼建自宋淳熙中，高六楹，左右翼各四楹，联以两庑东西百步，累甍为址，下通广逵上设更鼓，千里耳目攸属”^⑩，可知温州子城谯楼在宋代也已作为报时建筑使用。2014年温州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对谯楼西侧、原教育局办公楼旧址地块进行考古勘探，揭露出上下叠压的三期遗存。早期遗存包括五代时期的子城古谯门址、城台、城垣、马道、排水沟等遗迹，毁于元初。元末，方明善据温，谯楼复建，位置东移。晚期城墙即当时所建的谯楼西边墙，不久即毁。明代中期，两期城址被后建的道观玄坛殿所叠压。勘探发现，如今谯楼及西侧地块下存在一处规模相当的谯门遗址，其位置较今谯门略向西。原谯门的东侧城台部分遗迹被压在如今谯楼的下面，其门洞和西侧城台遗迹就在今谯楼西侧。市文物保护考古所副所长梁岩华说，经测量，门洞遗址宽5.10米，长13.25米，距地表深0.74米。西部城台遗址东西长9.65米，南北宽13.25米，外包青砖，中间填土。砌法为错缝平砌，逐层向上内收。这种砌法在宋代李诫《营造法式》中被称为“露龈造”。^⑪



温州谯楼（作者摄）

历经千年风霜，谯楼也几经毁坏修缮。后元代延祐年间郡守赵凤仪自发修缮，至正二十五年方明善继续修缮并增加风景墙。清朝顺治年间因

战乱被毁，康熙十二年副使许重华重建，雍正元年郡守芮复传修缮，乾隆二十二年重修，道光十九年再修。1925年，旧温属公立图书馆设分馆于谯楼。1928年，谯楼辟为民众教育馆，筹资营缮，设图书、讲演、科学、娱乐等，还举办民众夜校普及教育。抗战时期，日军侵温，图书器物荡然无存。1946年，市民又重新捐资修饰。新中国成立后，古谯楼一度遭受冷落。为解决市民住房困难，上世纪五十年代谯楼改为二层楼房，长期被有关部门及其家属居住，谯楼顿失原先尊容。1981年，谯楼被列为温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惟年久失修，倾堕堪虞。为保护祖国文化遗产与文物安全，1991年市人民政府拨专款重修，温籍台胞吴昌涛先生闻讯，慷慨解囊，乐助人民币50万元，修复工程由市文物管理处主持，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设计，临海市建筑工程公司施工。于1993年11月开工，翌年8月，一座基本保持初建原貌的古谯楼以崭新的面貌出现人们眼前。经过修缮的谯楼，总面积为356平方米，四周平台宽敞，外围的花岗岩雕花护栏与正中的仿清复原的楼阁遥相呼应，飞檐雕栏、青瓦红柱、梁柱粗壮、结构严实，底部用条石叠筑城门，用大青砖砌成拱顶，高4.20米，阔4.75米，加上谯楼新刻新镌“东瓯名镇”的匾额，使整个建筑古朴壮丽，雄姿不减当年。为了保护谯楼，2001年10月，谯楼再行修饰，有关部门搬走楼上茶室，开办了一个历史名城图片展和“东瓯名绣精品陈列馆”，汇集了温州古城的历史遗迹，激发市民贴近温州、了解温州，建设新温州的热潮。此后，还先后举办温州风筝展、温籍美术家个人画展、工艺美术展等。谯楼成为传播温州文化的一个重要窗口与阵地。^⑥

2011年，谯楼被公布为浙江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二、相关历史事件

清同治年间温州司马郭钟岳瓯江竹枝词《敲梆》：“谯楼鼙鼓已三更，灯火荧荧杂市声，街析不须申夜禁，侬家犹有未归人”。子城和谯楼位于

繁华的市中心，见证了温州老城的诸多历史事件。其中重要的一例是宋高宗驻蹕温州。

（一）高宗驻蹕

高宗在北宋灭亡之际于南逃途中建立南宋政权，此后匆匆渡江，一路历经艰险，到温州才暂时安定下来。建炎四年（1130）正月二十一日进入温州港，至三月十八日离开温州，宋高宗在温州一共停留了55日。建炎三年（1129）初，金兵分兵两路再度南侵。高宗闻讯，从扬州仓皇出走南奔，经镇江、平江，直至临安；同年冬，金将兀术领兵十万率军南下，穷追不舍。赵构被迫与侍臣、嫔妃等乘船浮海避开金军锋芒，是年除夕亦在海上舟中度过。正月二十一日。赵构船队航至瓯江口青澳门（今洞头大门岛洋面）。二十三日，由青澳门溯瓯江而上，到达乐清瑁头。二十五日移泊龙湾，在此地登陆并“驾幸”福胜寺（龙湾金岙），居七天。这时，流散各地的官员闻讯赶来，人数渐多。后于二月初一日溯江至江心孤屿，驻蹕江心普寂禅院。因岛屿孤悬瓯江，生活起居不便，在温籍官员薛弼的建议下，宋高宗一行于二月十七日，从江心屿向温州城内移蹕。御驾仪卫自拱北门（后改称朔门）入城，民家百姓皆结彩焚香奉迎，百官则迎至永宁桥（今永宁巷口）边，拜伏道旁。后人为纪念这位逃亡皇帝，就把这一带称作“万岁埭”，即如今的万岁里。御驾依次由大街（今解放路）、五马街，通过谯楼（沿今公安路）到达州治（今广场路小学）。驻蹕州治内后，遂改州治衙门为行宫，州治住宅为宫禁，谯楼为朝门。在此期间，百官朝参，悉按六天一朝的旧仪进行，温州地方官员亦随班起居。高宗还以城内的开元寺为天庆宫（今东南大厦址），下诏将汴京万寿观、永安军会圣宫和扬州章武殿的祖宗神主，迁至天庆宫奉安祭祀。由于原州治已成为行宫，特将儒志坊（今府学巷）张氏故宅改建为州治，又以崇德寺（在松台山东麓）为都堂，南城门楼为右相都监衙。在此期间，温州子城发挥了临时行政和权力中心的作用。

在温州避难一月，不仅受到温州官民的拥护、得到物质支持，还初次



州治旧址（图片来源：温州博物馆官网）

领略到皇帝的威仪。宋高宗为避金军暂避温州，对温州的政风形成了显著影响。

一是更多的温州人入朝为官。宋高宗初幸温州，便接受赵鼎推荐的两名温州人吴表臣、林季仲为官，高宗曰：“朕阅三吴多矣，未有如此人物”^④。南宋定都临安后，温州的政治区位条件改善，有利于温州经济文化的发展，也便于本地的士人有机会结交曾在温州任官、后来进入朝廷任要职的官员。温州科举人数也有所提高。建炎二年（1128）以前，温州第进士的人数都在个位数，但自绍兴二年（1132）开始已上升到两位数，如将统计时间截止到孝宗乾道八年（1172），在此40年中，大致每年在十多人左右，最少是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的10人，最多是孝宗隆兴元年（1163）的28人。科举人数的提高，扩大了在朝廷和各地任职的温州籍官员的数量。

二是随高宗而迁的文官武将对温州的政治造成影响。在高宗避难的前后，还有更多的朝官、军将、文人和士兵迁入温州避难。北宋宣仁皇太后高氏的族人高世则，在高宗为康王时曾随从使金，后为元帅府参议官，绍兴二年以后迁入温州。北宋宣仁皇太后高氏的族人高世则，在高宗为康王时曾随从使金，后为元帅府参议官，绍兴二年以后迁入温州。当时皇亲国戚居温者远不止高氏一族，由于“世则以勋戚重望镇之，民赖以安”。^⑤

出知温州也成为了重要的政治机遇，如绍兴年间，就有洪拟、范宗尹、秦桧、李光、张九成等重要官员先后出知温州^⑥。这些重要官员基本上是因为政治斗争的失败而出知温州，而他们也随时准备重返中央权力中心。因此，他们在温州任上积极培植自己的势力，一旦他们重返权力中心，这些温州士大夫也就有了政治上的依靠。

三是温州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布衣上书。或许受高宗暂避温州和靠近行在的影响，政治的神秘性慢慢褪淡，温州百姓开始关心政治，绍兴年间发生最多。绍兴六年（1136）九月温州布衣张顾以《中兴十策》上书，要求在荒年让富户提供粮食，安排饥民在陶山湖畔修筑陂塘。同年平阳人陈尧英布衣上书，提出12条建议，后又上书《清朝政序》《兵书》等建议，令高宗好奇。后亦有温州万春、平阳黄元寿等人向高宗上书。绍兴后，布衣上书的风气仍未绝。

（二） 谯楼雅集

此外，子城谯楼还曾是温州文艺荟萃之地，文人骚客常光临谯楼吟诗赋词，弈棋唱和。民国四年（1915）三月，吕渭英请款创设籀园图书馆（今温州市图书馆）。民国十二年（1923）夏，因飓风，籀园图书馆藏书楼被毁，吕渭英又在馆东畔筑轩房三楹，同时稟请道尹将地处闹市区谯楼的西面两间划作籀园图书馆分馆。民国九年（1920），由永嘉梅冷生牵头，联合郑姜门、吴性健、林默君、沈墨池、郑远夫等多人拟创建诗社，在瑞安薛钟斗建议下取名慎社，慎社初以积谷山侧旧东山书院为聚会之所，后迁至谯楼，由道尹林鹄翔拨款修缮，严琴隐担任监修。

三、重要人物

（一） 建造者——吴越钱氏家族

弘治《温州府志》称温州子城为吴越钱氏家族所建造。唐末，藩镇拥兵割据，战祸四起，温州也是连年战乱。公元907年唐亡，梁王朱晃称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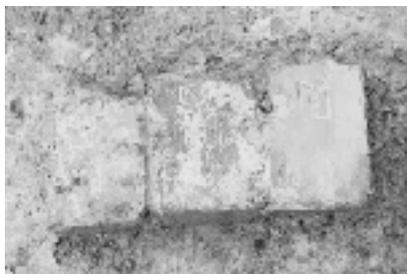


钱传瓘像

帝，封原镇海节度使钱镠为吴越王。根据《十国春秋》卷七十七，天祐四年（907）春三月，钱镠遣子传臻、传瓘讨伐温州的卢侏，夏四月，卢侏在青澳（今大门岛）挡下钱氏的水军，传瓘认为卢军主力在此，不可交战，因此舍舟登岸，从偏僻的小道偷袭卢军，攻下温州。钱氏返回杭州王郡，由都监使吴璋为温州制置使，执行既定决策。此后吴越钱氏家族长期镇守温州，奉行保境安民的政策，使得子城得以保留至宋。

吴越文穆王钱传瓘（887—941），字明宝，袭位后改名元瓘。杭州临安（今浙江临安）人，吴越第二位国君，吴越武肃王钱镠第七子。根据《十国春秋》，钱传瓘早年被作为质子前往宣州，后在讨伐叛乱中屡屡立功，在众人的推举下，被钱镠立为继承人，长兴三年（932）继位。继位后，钱传瓘把所有兄弟名字中的“传”改为“元”。其继位以来，国家安定，政治归道，但身体状况欠佳，仅五十五岁便辞世。

虽许多学者认为温州子城为钱传瓘攻打卢侏后所建，但据笔者所见史料，未有确凿证据，仅为一种推断。首先，当时讨伐卢侏的为传瓘、传臻二兄弟，并未说明谁后来主镇温州，之后传瓘守温州已是后唐同光二年（924）之事。《十国春秋》仅载温州子城为天祐四年（907）所建，具体月份未可知，是否可能是卢侏为防钱军攻打，在温州被攻下前便开始动工，因战败搁置，而钱氏接续其工程？同时，弘治《温州府志》胡注提到“蒋涣任永嘉守为开平元年（907）”^①，他是否和子城修建有关系？当然，《十国春秋》也可能意为天祐四年（907）始建，但并不排除以上可能性。此外，弘治《温州府志》胡注提到唐温州刺史郑谡“乾符四年（877）……防巢之乱，以柳木为栅，保障郡邑”^②是否就是钱氏子城的前身？2021年子城遗址出土的“官”字款子城城砖，或许能够助于深入研究。



温州子城城砖(来自网络)

(二) 修缮者——赵凤仪、方明善、许重华、芮复传

1、赵凤仪

赵凤仪，河南开封人，元延祐四年（1317）赴任温州担任温州路总管，在《重修温州路谯楼记碑》记录他曾自发修缮过谯楼。据弘治《温州府志》，赵凤仪在任期间崇尚儒道，兴办庙学，聘请名师教导，重视地方文教事业，政治清明，民众向化。六年（1319），暴风覆舟，溺死多人。赵凤仪祭江后，督造渡船10只，两岸对开，飞云渡的安全有所改观。乾隆《温州府志》载，百姓将其寓所所在称为亲民坊。《温州经籍志》所载宋人戴侗著《六书故》记录温州方言，原由其子孙献出，赵凤仪捐俸刊刻并作序，使得这一珍贵的温州方言文献得以见世。

2、方明善

方明善是反元将领方国珍的侄子，从元至正十八年（1358）到二十七年（1367）占据温州路十年时间，期间重修谯楼，并复建了谯楼两侧的一部分城墙，工事从二十三（1363）年开始，历经两年，耗费白银二千余两，动用工匠二万五千余人。根据嘉靖《永嘉县志》记载，元至正年间，方国珍与两弟因拒捕杀死了巡检，于是起兵造反，元兵进行缴捕。至正十二年（1352）二十八日，方兵由外沙登岸，从镇海门进入温州城内，官民争相逃跑，海运副千户吴世显统领军民进行抗击。此后元兵与方兵开展了多次交战，温州城内居民深受其苦。直到十四年（1354）方国珍被朝廷招安。十八年（1358），方国珍派遣方明善为省都巡抚，据守温州，在千佛寺屯兵，

期间遭楠溪刘公宽袭击，方明善逃脱，并杀害刘公宽及其城中兵民。十九年（1359），方明善升为枢密院判官，后又迁行省参政，方氏势力渗透江浙，把握粮货交运命脉。二十三年（1363）方明善升江浙左丞，同金升金院，并攻下平阳，不过月余又被击败。二十四年（1364），方明善进公右丞，赐分省印章，金院升副枢。元廷遣军逼迫方国珍投降，授其江南兴胜平章事，淮南左丞相，而方国珍拒不贡粮，元廷出军讨伐，方明善欲驾舟逃至海上，却不得出港，遂降。

3、许重华

许重华，河南开封人，清顺治九年（1652）进士，康熙九年（1670）出任温处道，在任温州九年。根据乾隆《温州府志》（卷十八）记载，许重华上任时，温州局势混乱，民不聊生，他恪尽职守，安抚民众，并捐出俸禄修建学宫和诸多桥梁，还修复了因顺治兵乱而倒塌的谯楼。他的功绩被列入《崇祀名宦册》。

4、芮复传

芮复传，字衣亭，天津宝坻人，原籍江苏溧阳，清朝官吏，主持修缮过谯楼。根据《清史稿》（卷四十七）《循吏二·芮复传传》记载，芮复传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中进士，被任命为浙江钱塘知县，因政绩突出升迁温州知府。在任期间，芮复传把温州岁贡柑橘量降低到足够额度，减少百姓负担。为打击私盐贩卖，芮复传设置监察机构，稳定食盐价格，有效减少了走私。总督李卫欲在玉环山开荒设治，芮复传作为其下属极力反对，认为这是劳民伤财，这一举动受到了时任中堂刘统勋的高度评价。后任温处道，因制裁非法铜矿经营被诬陷卸任。乾隆朝时才得以平反，官复原职。其后因亲人病故，致仕回乡。芮复传兢兢业业，改革温州弊政，节俭奉公，为地方设施修缮不遗余力，创立了东山书院等教育机构，修复了谯楼等历史文物，受到百姓的爱戴。乾隆《温州府志》（卷十八）记载，人们在江心屿浩然楼一侧为芮复传立祠祭祀，纪念他对温州作出的贡献。

（三）弘扬者——陈达、吕渭英、严琴隐

1、陈达

元至正二十五年（1365），为方明善重修谯楼一事所作《重修温州路谯楼记碑》的篆刻者是元代著名的温籍书法家陈达，该记有“集贤直学士、亚中大夫兼皇太子赞善、陈达刺麻实理书，并篆额”^⑩题款。2014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温州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联合对温州府学孔庙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清理出土了《重修温州路谯楼记碑》，使得这位名家在温的珍贵作品得以重现世间。根据潘猛补《八法通神似右军——元代温州书法家陈达》一文的介绍，陈达（1322—1375），龙湾《青山陈氏宗谱》中作陈可达，字子元。金华《兰溪陈氏宗谱》作陈达，字元达，号松亭。他是南宋末宰相温州人陈宜中的侄孙，因祖父自龙湾青山迁居至金华兰溪，所以也有史料称他为兰溪人。年十五征入宿卫，二十学书于书法大师康里巉巉、杜本。至正壬辰，擢端本堂司经，寻转正字，又迁文学。因劾顺帝时奸臣秃鲁帖木儿而遭迫害，解官南归“病卧故里”，依居永嘉先墓下面。在朱元璋攻克温州时，陈达欲几度寻死而被士兵救起，安置于濠州，后遇赦，死于兰溪，葬兰溪甘棠乡门村原。

陈达书法学王羲之父子，但又有自己的风格，水平高超。当时元廷钦安殿成，在廷善书法者咸书殿榜上进，朝廷独用陈达题字，其书法水平，深得皇太子欣赏。吴沉《临池轩诗》称赞：“集贤学士相门孙，八法通神似右军。奉诏曾题金殿榜，承恩更号玉如君。山中铁限穿成穴，池上墨花凝作云。一代几人称绝品，家鸡野鹜浪纷纷。”

陈达学诗于当时著名的学者张雨和马彦恂。在《青山陈氏宗谱》中，我们发现了陈达佚诗。如《无题》：“闲庭芳草日萋萋，帘卷东风紫燕齐。玉笛未谐嬴氏婿，锦机先学窦家妻。歌残杨柳肠空断，梦到梨花思转迷。脉脉幽怀对岑寂，可堪憔悴度深闺。”《午睡》：“花影萧疏竹影低，恹恹一枕绿窗西。枝头好鸟知人意，飞过垂杨别院啼。”《寄李子（讳孝光）》：“年来偏意故人深，双鲤稀传尺素音。抱病岂缘司马谒，伤时不作杜陵吟。”

江城月白空携酒，山馆春晴独对琴。何处浮云看世事，如君真得百年心。”

陈达亦是一名收藏家，藏有宋李龙眠《洛神赋卷》，唐李白《上阳台书》等珍品。^②

2、吕渭英



吕渭英像

民国十二年（1923）夏，谯楼西面两间用作籀园图书馆分馆以供藏书，主办人是温州著名的实业家、慈善家吕渭英。吕渭英祖籍永嘉县罗溪（今瓯北），光绪十五年（1885）中举，先后在北京、福建、广东等地任职，曾任福州知府，官至候补道台。1908年卸任后，出任过广东官银钱局总办、广东实业银行行长、浙江地方实业银行总理，直至民国九年（1920）返温州。吕渭英是一位业绩显赫的实业家。为谋实业救国，先后与虞恰卿、蒋佰器等众多实业家经营合作办厂。

吕渭英非常重视地方文教事业，中举后的第三年，即在老家罗溪兴办“罗溪塾”，此后亦创办了永嘉自治研究所、温州府中学堂（今温州中学）、温州府官立中等农业学堂（温二中前身）、楠溪学堂（今枫林小学）、城南小学、明德小学、永嘉第二高等小学校（今永兴小学）、瓯海公学（今温州四中）等温州众多学校。吕渭英也热心于公共图书事业。光绪二十八年（1902）七月中旬，吕渭英等人筹备恢复永嘉东山书院，开办永嘉图书社。孙诒让同吕渭英各捐大量书籍助建。民国八年（1919），温属六县联立图书馆（即籀园图书馆，今温州市图书馆）建成开放，吕渭英将其“于园”藏书3289册全部捐赠。民国十二年（1923）夏，因飓风，籀园图书馆藏书楼被毁，吕渭英又在馆东畔筑轩房三楹，同时禀请道尹将谯楼的西面两间划作分馆。1912年，吕渭英与陈介石聘陈怀创办《东瓯日报》，这是截至目前温州发现的最早的一份报纸。1920年，他资助郑振铎、高觉敷、姜琦、马公愚等人创办《新学报》。《新学报》是国内最早直接介绍马克思、

列宁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进步刊物之一。

吕渭英对温州文物保护事业做出巨大贡献。上世纪20年代，为弘扬地方文化，吕渭英募建仙岩陈傅良祠、东瓯王庙、八仙楼、东岳庙、蛟翔巷仁济庙、温州府城隍庙。三次修葺飞霞观、飞霞洞、梅雨亭，重建温州谯楼、巽吉山文昌阁等。收回江心寺久租洋人之浩然楼，建蛟翔巷三御书亭，捐建江头宗祠。^②

3、严琴隐

近现代温州著名文人、教育家严琴隐和谯楼有着不解之缘。严琴隐（1893-1996）又名文父、文虎、文黼、文慈，字琴隐、琴庄，本邑名宿，在文学诗词、乐理律吕、古琴、书法等领域造诣深邃，亦涉猎武术、医学方面，撰有《乐律金鉴》《琴隐联语》等作品，与当时文化名人冒广生、刘绍宽、夏承焘等互有诗词酬唱，留有诸多诗篇。他热心于公益文教事业，曾协助创办东山图书馆、温州武术馆、永嘉补习中学等。

他出身书香之门，祖上开设“严日顺”瓯绸机坊，是瓯绸的著名商家，祖上曾五度监管谯楼的修建。严宅位于谯楼下的鼓楼街，严琴隐从小在宅中的芙蓉书院接受启蒙教育，屋后曾是宋高宗来温驻蹕的行宫。民国九年（1920），严琴隐等人创建慎社，社址后设在谯楼，严琴隐还邀请满腹经纶的瓯海道尹鸱翔（号铁尊）参加慎社，并请道尹拨款修缮谯楼，琴隐担任监修。民国十三年（1924），严琴隐出任温属六县籀园图书馆长，设分馆于谯楼。据严氏家藏其《旧温属图书馆第二任馆长成绩》一文，在他任内，“第一次依《四库全书》凡例编定藏书目录六册”“接收瑞安黄体芳通政、漱兰先生蓼绥阁藏书，曾亲至杭州与其至戚林同庄先生商定，同意慷慨捐助本馆”“接收黄溯初《敬乡楼丛书》初、二、



严琴隐像

三集送馆”“日本版佛氏（大）藏经全部到馆”“整理七都涂田六七百亩、瑞安塘下乡涂田数千亩早晚两季所收入全部（用于）公开购书”，而他自己则对加薪、馆长车马费一文不取，可惜因一年后因恩怨遭解任。历经多年的颠沛流离、忍辱负重，严琴隐在晚年得以平反，被复聘为浙江省文史馆员，仍热心于地方文史工作。^②



参考文献：

① 钟翀：《江南子城的形态变迁及其筑城史研究》，《史林》2014年第4期，第1页。

② 成一农：《中国子城考》，《古代城市形态研究方法新探》，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94—125页。

③ 钟翀：《江南子城的形态变迁及其筑城史研究》，第8页。

④ 王光蕴等：万历《温州府志》卷四，1985年补抄本，第6页。

- ⑤ 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七十七，清乾隆五十八年海虞周氏此宜阁校刻本，第1976页。
- ⑥ 郑梯燕：《从谯楼遗址发掘谈温州子城兴废时间》，《东方博物》2016年第2期，第31页。
- ⑦ 王叔果等：嘉靖《永嘉县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1月，第71页。
- ⑧ 司马迁：《史记》卷四十八，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2534页。
- ⑨ 班固：《汉书》卷三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88页。
- ⑩ 姜准等：《歧海琐谈》，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78-179页。
- ⑪ 张宝琳等：光绪《永嘉县志》卷五，《中国地方志集成》，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第59页。
- ⑫ 温州都市报：《温州鼓楼街谯楼旁发现古谯门和古城墙遗址》，2014年3月8日，<https://zj.qq.com/a/20140308/004268.htm>
- ⑬ 360百科：“温州谯楼”条目 <https://baike.so.com/doc/1480821-1565874.html>
- ⑭ 王叔果等：嘉靖《永嘉县志》，第173页。
- ⑮ 王瓚等：弘治《温州府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167页。
- ⑯ 王瓚等：弘治《温州府志》，第142页。
- ⑰ 王瓚等：弘治《温州府志》，第183页。
- ⑱ 王瓚等：弘治《温州府志》，第182页。
- ⑲ 张宝琳等：光绪《永嘉县志》卷五，第59页。
- ⑳ 潘猛补：《八法通神似右军——元代温州书法家陈达》，2016年4月7日，https://mp.weixin.qq.com/s/_uawzJ1bcm20iBjalG-5Xg
- ㉑ 吕朝晖郑全：《他推动了地方文教现代化——先贤吕渭英续记》，2018年10月15日，https://mp.weixin.qq.com/s/j63zkAdxj8SXVMPS_MJsrg
- ㉒ 严永鏞：《我的祖父严琴隐》，2016年11月11日，<https://mp.weixin.qq.com/s/CU85icPQ28rpaNZESPKC9g>

我与寺前桥的故事

适 凡

因为谢灵运《登上戍石鼓山诗》，我造访藤桥，这是一个偶然；
由此，平生第一次接触龙泉院，更是一个偶然；
继而有了寺前桥背后故事的发现，则是前两个偶然因素综合作用导致的必然了吧。

（一）

某年，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我骑车路过寺西的水潭边，再经一小片竹林前，一座石桥，进入视野。这样的普通石桥到处都是，我也没有在意。

偶然的是，桥那头一棵小树下的一块石碑，吸引了我。上前一番观察，寺前桥。隶书体。也许是见到的名胜古迹太多了，“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没有让我产生多少兴趣，这个名称让我对它的审视大打折扣。我对什么级保护单位的定论极其反感。因为这个界定，束缚了人们的思维、想象、审美。

不过，这块碑上却写着“瓯海县人民政府公布”“瓯海县文博馆立”，此外未见详细介绍。“瓯海县”与藤桥的交集，也好理解，藤桥曾经在瓯海辖区范围。

此后，我将所见告知朋友。朋友听完，很兴奋地说：“那座桥啊！很

古老了，听说是宋朝时候桥边上的龙泉院修建的。桥梁石头的外侧还刻有文字呢！”他说完以后，还跟我说了很多关于龙泉院的事情。越发激起了我的好奇心。

回到家，我上网搜索相关信息。网文上说：“寺前桥，在戍浦江支流上，因坐落于龙泉院前，故名寺前桥。桥为三孔梁式石桥，跨度33米，桥面宽9米。单根石梁厚0.4米，宽0.5米，长9米。桥两侧分别刻字：乾道八年（1172）壬辰岁季冬癸卯创始龙泉院乾僧师表；淳熙六年（1179）己亥岁孟月丙子记广阳石匠游成。”

看到这段文字，我如获至宝。温州宋建石桥存量不大，据我所知，较早的有一座是瑞安八卦桥，另一座是位于龙港芦浦的年糕桥。没想到在藤桥这么不起眼的地方，也藏了一座！

我决定再访寺前桥。

（二）

又是一个周末的午后，我带着一种粉丝见偶像的心情再度光临。

我趴在桥面去看两侧的刻字。这一看，让我有了发现新大陆一般的惊喜。

桥两侧有字不假，却与网文上的内容大相径庭。经过我反复观看和触摸之后，我发现一侧的文字应该是“乾道八年壬辰歲季冬癸卯創始龍泉院幹僧師表”，另一侧应为“淳熙六年己亥歲孟春丙子日訖功橫陽石匠沈成”。

颇为兴奋的我，这时再审视这座桥，仿佛听到一个声音在说：“被记成这样，真是委屈了。”

在桥上来回走动，观看、设想、推断……突然，桥面上一丛结缕草下露出一道光滑的“横”向纹路，似乎像是人加工过。我断定草下面是一个字！

我扒开草丛，一个大大的“德”字映入眼帘。那流畅的线条，圆润的笔画，雅正的字体……“原来草丛下面真的有字啊！”

稍加清理，整个条石边出现了一列字。经过辨认，内容大致为“前洋季德兕禾二十千开”，其中“禾”字又非禾字，它不仅比“禾”少一撇，看上去它还带着竖钩呢！这哪能是“禾”呢？可不是禾，字典也再无其他字了，这难道是一个早已不用的异体字吗？这列字的最后一个“开”字，又小很多，与整列字一看，极不协调，似乎是后来加上的一般。我只能这样猜想：这二字应该是因为风化关系，少了其他部分。

把这一列字一读，这内容又难以让人理解，难道这是这旁边以前应该还有其他碑文的吗？

后续的探索，因为各种事而搁置。

(三)

2014年，我从武汉大学进修回来，对于写作，较之以前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了。回藤桥没多久，我又到了寺前桥。这次的探访，才算我真正读懂一座桥，因为寺前桥的结构深深地吸引了我。

寺前桥的桥墩两侧呈三角状，颇像一条两头尖尖的小船。远远看去，或者航拍看下来，一定像是两条船驮着一个桥梁一样。这样的场面颇有几分浮桥的味道。其实，把桥墩变尖，这样的构造极大程度减少了水流对桥墩的冲击，这也就是这座桥为什么能屹立千年不倒的原因了。寺前桥算是美学和力学和谐统一的典范之作。

我又想，既然是这样，如果要减轻水流对桥墩的冲击，那只要把上游弄尖就好了，为什么下游方向也要弄尖呢？水都从这边流过去，对它没有什么冲击力啊！潮水上涨是会对桥墩造成极大的冲击。把桥墩弄尖状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四)

又是一个冬日晴和的日子，我有了闲暇，决定再去看它。

刚走到寺前桥，便看到很多人在砍河两旁的那些竹子。“难道是相关部门要修改河道吗？要修缮寺前桥吗？要使这里成为景点吗？”面对我的提问，砍竹子的人似乎要赶着完成任务一样，对我爱理不理的。河岸上不久便变得光秃秃……

后来，因为潘哥的出现，我又再次燃起了热情。2016年，我又一次来到这里。我想拍一些照片和视频把这事告诉更多人。

来到这里已经下午，我边拍视频边解说。视频快录完的时候，桥上来了一个人，待我说完，他马上问我是谁、干什么的等一系列问题……听他口气，似乎是在质问一个有盗窃文物嫌疑的家伙。

一番对话之后，他没有了当初的警惕。他说：“难得藤桥还有人如此关注这一座桥。”然后我们有了更多的交流，我也告诉他草丛下的那行字。这让他愈发激动了，拉着我说了包括龙泉院的搬迁、文革后的佛珠、龙泉院的老井、建设香樟小学时候挖出的灯盏等等很多事……我也这知道他叫潘孙策，是开琴行的。

再谈寺前桥，是前些日子。我去星火那里办事。工作台上一份“朱姓字辈谱”引起我的兴趣。

于是，星火跟我说起了他家“周姓”的来源。谈到了他家祖上、老屋和寺前桥。他告诉我，寺前桥的建设，他祖上也是有份的。说当年寺前桥的建设冲了他们周家的风水，这才使得寺前的周家没落了……不仅如此，没想到星火那里还有很多为了报批寺前桥文物的原始文件、图片等资料。令我大开眼界！

这样一圈下来，对于寺前桥的了解，我似乎更深了。

一座八百多年的老桥以及神秘面纱被一一揭开。它已经不是一座桥了，它应是这一区域一段久远历史的沉淀和载体。我无法想象有多少人从它身上走过，有多少令悲观离合的故事与它有关！它始于龙泉院，见证了龙泉院的始末，可以说它是龙泉院至今唯一的亲人了。

龙泉院已然是荡然无存了，听说原址因为大火之后，搬离了两百米远，

后来又改建成粮仓。也许自不用交公粮后，粮仓渐渐被废弃，一度沦为五金小作坊，现在因为企业整顿，小作坊也停办了。龙泉院彻底地安静在了二零一八年的春风里。



相关链接：

洛阳桥，也就“万安桥”，是福建省泉州市境内连接台商投资区和洛江区的一座桥梁，位于洛阳江水道之上，也是著名的跨海梁式大石桥，素有“海内第一桥”之誉，是古代“四大名桥”之一。

宋皇祐五年（1053），泉州太守蔡襄主持洛阳桥建桥工程；前后历六年之久，建成这座跨江接海的大石桥，桥梁全长834米，宽7米。

2021年7月25日，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通过，成功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6处世界遗产，洛阳桥是22处代表性古迹遗址之一。

洛阳桥首创一种直到近代才被人们所认识的新型桥基——“筏形基础”；所谓“筏形基础”，就是用船载石沿着桥梁中线抛下大量石块，使江底形成一条矮石堤，然后在堤上建桥墩；洛阳桥桥墩全用长条石交错垒砌，两头尖，以分水势，减轻浪涛对桥墩的冲击；为了巩固基石，中国古代劳动人民还首创了“种蛎固基法”，即在基石上养殖牡蛎，使之胶结成牢固的中流砥柱，这是世界上把生物学应用于桥梁工程中的先例。

寻访《叮叮当》中的古迹

张 晓

“叮叮当啰呵哩，叮叮当啰呵哩，山脚门外啰呵哩，啰啰哩孤老堂，松台山上仙人井哪啰呵哩，妙果寺里猪头钟哪，呵咋……”《叮叮当》是温州家喻户晓的童谣，悦耳动听，我是唱着《叮叮当》长大的。

有专家推测，《叮叮当》产生的最早年代应当在明朝，也有人提出《叮叮当》距今只有 200 多年的历史。不管怎么样，《叮叮当》是温州人心目中的最美童谣。短短的三句歌词，描绘了一幅绝美的鹿城古景图。每当耳旁响起这首熟悉的旋律，松台山、仙人井、妙果寺、猪头钟等景物便会象电影一样在我眼前一一呈现，令人心醉！

歌词中的孤老堂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烟云中，其他的，尚能寻找到昔日的芳踪。让我们怀着别样的心情，去寻访《叮叮当》中的历史古迹吧！

（一）山脚门外

山脚门是温州府城西南角的一座古城门。

古城仙鹿远，百感赴斜曛。海气千年聚，山形九斗分。东晋明帝太宁元年（323 年），著名的地学家郭璞客寓温州。为卜郡城，他登上郭公山，见“数峰错立，状如北斗”。当时温州鹿城有九座山，分别是：华盖、松台、

海坛、郭公、积谷、黄土、巽吉（巽山）、仁王、灵官（现仅存华盖、松台、海坛、郭公、积谷、巽山六座），其中，华盖、松台、海坛、郭公四山是北斗的“斗魁”（北斗的四颗斗星称“魁”）；积谷、巽吉、仁王三山为“斗杓”（斗柄三星称杓）；黄土、灵官二山则为辅弼。于是，郭璞就“城于山”，因此，温州也叫“斗城”。

建城期间，有一天，郭璞梦见一只神奇的白鹿衔花而过，所到之处，一片鸟语花香、祥云腾飞，于是，他就把温州叫做“白鹿城”。

郭璞采取依江、负山、通水的原则进行选址营造，设计了东庙、南市、西居和北埠的城池布局。同时，根据城内外九座山头的不同方位，在营造白鹿城过程中在四周建筑七座城门，分四向而立，这就是温州古城“七大门”。据明弘治《温州府志》记载，温州郡城城门从东到北逆时针分别为：镇海门、瑞安门、永宁门、来福门、迎恩门、永清门、拱辰门。

七座城门的名称各有出处：永宁门、瑞安门、永清门分别以唐宋时温州古称永宁县、瑞安府，以及永嘉乐清各取一字而得名；镇海门、拱辰门以地理位置而得名；迎恩门则以迎接过宋高宗赵构而得名。

镇海门就是今天的东门；瑞安门就是今天的大南门；永宁门就是今天的小南门；来福门也叫三角门、山脚门，就是今天的来福门一带；迎恩门就是今天的百里路与勤奋路交界一带；永清门是今天的麻行一带；拱辰门是望江门最初的名字，就是今天的朔门。

来福门古时为何叫“三角门”呢？因为该城门处在古城西南的三角地带，故称“三角门”，又因坐落在松台山麓，温州人俗称“山脚门”。

不过在“南宋三大学派”之一、“永嘉学派”集大成者叶适的笔下，却把这个城门叫做“生姜门”，写下“生姜门外山如染，山水娱人岁月长”等诗句。叶适出生于瑞安，或许是受瑞安方言的影响，“山脚门”“生姜门”读音类似。

“山脚门”是城内城外在西边的交界地带，也是老百姓从事经商和出殡习俗的必经之门。旧时交通不发达，近郊乡下的农民，把自家生产的咸

菜、菜梗、菜干等腌制品用“三板船儿”运到山脚门外的清明桥，然后再挑到各个菜市场。旧时，城里人去世，棺材一定要从山脚门中抬出，装船运到乡下安葬。故温州土话有“担进菜咸，抬出尸骸”之戏谑，另有一句“棺材抬啦清明桥”的俚语，也典出于此，用来比喻大势已去。明代后期，人们一致认为此城门名称不雅，为讨吉祥，官府将“山脚门”改为“来福门”。

《叮叮当》里的“山脚门外”，就是今天的来福门、松台山山脚下。

“山脚门”外有一个有关刘英的故事。1942年2月8日晚上，由于叛徒出卖，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就是在“山脚门”外的“恒丰盐店”被捕的。

今天，我又来到了山脚门外，这里，面貌焕然一新，市区九山公园——松台山历史文化提升工程接近尾声。你看，仿古建筑来福门、三牌坊已建成，“松风胜境”重返人间，又见“怡园”，“松风阁”马上就要竣工了，来福门古街、三牌坊古街将于春节前举办相关的开街活动。真是令人流连忘返！

新来福门牌坊古朴典雅、巍峨壮丽，宽约12米，高约9米，木料主材采用的是耐久性较强的菠萝格。



新建寿福门。(沈耀进摄)

作为“斗魁”的松台山，古时因青松覆盖、山坪如台而得名。清代诗人朱彝尊有诗曰“苍苍山上松，飒飒松根雨。松子落空山，朝来不知处。”更是为松台山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现在，松台广场上种植多株黑松、山顶配植松林群落、打造开放式松主题盆景园，使山脚门外更添山水诗韵，“松风胜境”渐入佳境。

在松台广场南侧有座湖心亭，旁边种植着两棵“兄弟松”，松下假山造型的石碑上刻着两字：“怡园”。湖心亭就是建在怡园的原址上，怡园又名曾宅花园，是清道光三年（1823），温州名士曾佩云、曾裔云兄弟所建，是温州十大私家花园之一。怡园取义《论语·子路》：“兄弟怡怡”，意为兄弟和悦相亲。

城中云日如火催，净光行食声转雷。
不知何处白蘋起，便有满坐清风来。
莫言作楼非急务，翁当运斤儿执锯。
待得三间著此风，病叟扶携上楼去。

这是叶适写过的一首诗，名为《净光松风阁诗》，“松风阁”曾一度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今天，新“松风阁”即将掀起它的盖头来，这是一座气势磅礴的双层建筑，古香古色、飞檐翘角、美轮美奂。

门口挂着一副楹联：

园宅耸层楼，白鹿江城新画本；
水心怀盛事，永嘉学派古乡贤。

这副楹联由诗人俞大文撰、书法家汪廷汉书。这里的“水心”就是指叶适，叶适是温州永嘉（今鹿城区）人，号水心居士，南宋思想家、文学家、政论家、官员，曾居永嘉水心村，世称水心先生。

在“松风阁”旁边，黄庭坚的“松风”两字重见天日，格外惹人注目。这两个字，可以说是“飘若浮云、矫若游龙”，令人如痴如醉。

叶适与松台山有着很深的渊源。据史料记载，宋嘉定元年（1208），59岁的叶适落职回乡，在城郊水心村居住。他看到松台山上唐代古寺“净光禅寺”损坏，便出资在“绝景亭”下重建“宿觉庵”，并于次年作《宿觉庵记》（《叶适集》卷九）。叶适还在松台山建有“松风阁”三间。所以，他在《净光松风阁诗》中说“待得三间著此风，病叟扶携上楼去。”

今天的山脚门外重现了古韵松台的美好丰姿。

（二）松台山上仙人井

仙人井坐落在松台山巅，古称“上井”，恰与山脚俗称八角井的“山下井”相对应，是温州古二十八宿井之一。史载东晋太宁年间，郭璞筑永嘉郡城时，认为天有二十八星宿，地有二十八口水井，于是按天上星座的相应位置，开凿“二十八井以象列宿”，以达到天地对应的吉利之意图。

松台山山巅有净光塔，山麓旧时有净光禅寺，所以又名“净光山”，它文化底蕴深厚，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深深吸引着每一个温州人。

仙人井，在我看来，它不单单是一口井，它是我无忧无虑儿童时代的一个缩影，曾给我留下多少童年欢乐的记忆！它为什么叫仙人井？仙人井里真的住着仙人吗？这位仙人什么时候出来呢？这些都是我小时候最爱问的问题。

现在的仙人井，变靓了，周围加了一圈雕花的护栏，如同穿上了一件新衣裳。时光荏苒，它依然静静地守候在金光闪闪的净光塔下。

仙人井井深为5米左右，圆形的井栏为单块石所凿。现在，它虽然加了铁锁，但是我仍能看见井水清澈如初，它的水源是从松台山的山岩中源源不断地流出来的，千年不涸。

抚摸着仙人井的井栏，我的思绪飞到了五彩缤纷的儿童时代。

因为离家近，小时候的我，经常去松台山玩，可以这样说，松台山是我儿童时代的乐园。那时候，我经常问奶奶：“松台上的井为什么叫仙人井？”奶奶说：“井里住着仙人。”我又问：“仙人会出来吗？”奶奶先是愣了一下，而后笑着，摸摸我的头说：“会的，心诚则灵，你多去看几次，看多了，仙人自然就出来了。”

我信以为真。此后，我就记住了奶奶的话，每次去松台山玩，总是忘不了去看望一下仙人井，我觉得，我一定能看到仙人的，心诚而灵，情真则明，看的次数多了，仙人自然就出来了。

那时去松台山，多半时间是和邻居小朋友一起去的，一是为了看仙人井，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可以与他们一起玩“螳螂酸酸”的游戏。“螳螂酸酸”也叫三叶草，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三片叶子，呈倒心形，样子十分可爱。那时候，松台山上到处都是。“螳螂酸酸”可以吃可以玩，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很诱人。

上世纪70年代，儿童娱乐项目十分匮乏，一种草，几位谈得来的小朋友，可以开心地玩一整天。我们在山上采来一大把的“螳螂酸酸”，拔下它的茎叶，轻轻拔掉茎上最外层的皮，里面就剩一根细丝了。我们会一人执一根茎的一头，利用有叶片的一头做武器，把它甩起来，勾住对方的“螳螂酸酸”。等它们纠缠在一起的时候，像拔河比赛一样往自己的方向拉。谁的“螳螂酸酸”先断了谁就输了！

玩玩“螳螂酸酸”，看看仙人井，我的童年如梦如幻。但是，我看了好多次，总也看不到仙人出来，仙人到底什么时候出来呢？我问奶奶，奶奶总是笑而不答。我心里暗暗对奶奶的话产生了怀疑。

上学以后，我读了很多书，自然更多地了解了松台山的历史，同时也知道了仙人井的来历。

松台山，为唐代永嘉大师瘞葬处。永嘉大师据说是在瓯海头陀寺落发，曾在温州开元寺出家，与天台宗八祖——左溪玄朗为同门友。东阳策禅师

认为永嘉大师虽明佛理，却未得名师印证，劝其往参曹溪六祖慧能。永嘉大师受其激励，前往慧能处，与之答对，机锋妙语，旁人甚异之。慧能留其一宿，时称“一宿觉”。《祖堂集》冠之“一宿觉和尚”。因此，永嘉大师也叫“宿觉大师”。宋太宗曾赐松台山为“宿觉名山”。

相传，宿觉大师在松台山修道，常饮用此井之水。他为何喜欢这水？据说这井水又清又甜，深受他的青睐。公元713年，宿觉大师圆寂，人们把宿觉大师的圆寂视作仙人的造化，因此叫做“仙人井”。这个仙人就是宿觉大师。他的一首《证道歌》万古流芳。

但是那时松台山的山门被解放电影院堵住了，山巅原有的始建于唐元和中期的宿觉大师真身舍利子塔——净光塔也消失在历史的烟云中。直到1998年夏，解放电影院因建设松台广场而被拆除，雄伟壮观的松台山的山门从此重见天日。

21世纪之初，温州市人民政府发起重建净光宝塔，于地宫出土大师舍利子一枚、舍利罐、印有重建净光塔造型和文字的宋代遗砖、瓦当等文物，弥足珍贵。妙果寺达照法师有诗曰——

江月与松风，大师遗芳踪；宿觉今致用，净光本无穷。

雾露兼云霞，觉者之生涯；禅教相联璧，证道永无差。

新净光塔于2006年建成，门口的对联令人回味无穷：二十空门元不住，一性如来体自同。此对联源自《证道歌》——真不立，妄本空，有无俱遣不空空。二十空门元不着，一性如来体自同。

人们在松台山山顶建了一间“永嘉大师纪念馆”，以纪念这位温州乃至中国具有影响力的历史文化名人。门口对联“佛性戒珠心地印，雾露云霞体上衣”正是永嘉大师一生的写照。

仙人真正“出来”是在2013年11月19日那一天，永嘉大师塑像现身松台广场“宿觉名山”前，这座塑像，以永嘉大师拜见六祖慧能法师的

故事为创作背景，再现了永嘉大师“振锡而立”、翘首昂视的动人情景。永嘉大师塑像总高设计为4.9米，是为了纪念大师住世49年（665-713），基座设定为1.3米，寓意2013年是大师诞辰1300周年。塑像主体部分用锡铜制成，整体色调采用古铜色，充分体现了松台山古朴凝重的人文气息和历史底蕴。

当时，我看到这座塑像后，心情十分激动，童年的梦想终于成真。此时此刻，我想对天堂里的奶奶说——奶奶，我看到了，我终于看到了仙人井里的仙人，他身披袈裟，气质儒雅，目光炯炯有神，他左手平放，手心朝上，右手手持锡杖，面对打坐修禅的六祖法师，娓娓讲述自己的开悟境界，他是那么的专注认真，又是那么的自信威仪，他唤醒了无数“梦中人”，令万人敬仰！

古井盈盂水，灵韵日月长。不管岁月如何变迁，松台山上仙人井的水，永远流淌在我的心上！

（三）妙果寺里猪头钟

猪头钟是妙果寺的镇寺之宝，高三尺许，重八百余斤，其质非铜非铁，酷似青石，千百年来被视为东瓯神奇古迹。

宿觉名山——松台山南麓的妙果寺创建于北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始创者为僧人文昌，他是天台宗僧人慈云遵式门下。“妙果”两字，典出梵语，意为“三密相应成就殊妙胜果。”但是，温州民间流传着妙果寺为唐永嘉宿觉大师所建之说。

妙果寺环境清幽，九山湖的碧波陪伴着她，净光塔的金光照耀着她，她气势恢宏、庄严肃穆、禅风懿范，梵音远播。千百年来，善男信女，香火不断，是东南朝圣之地。

听我的爷爷奶奶说：猪头钟原名叫“济陀钟”，温州话“济陀”与“猪头”谐音，人们叫着叫着，就把“济陀钟”叫成“猪头钟”了。

钟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打击发声器之一，也是人类文明宝贵的物质遗产。中国的古钟文化历史源远流长，自成体系，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钟不成礼。钟不仅是一种文化，是一种思想，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从庙堂之高到江湖之远，古钟在人们心目中都具有崇高、公正、贤明的象征意义。

《说文解字》对钟的解释是：“钟，乐钟也。秋分之音，物种成。从金童声。”东汉随着佛教的传入，寺院广布，佛钟就流行开来，“有寺即有钟，无钟即无寺”，闻击钟磬之声，能生善心，能增正念，佛钟成了修善纳祥的象征。

立于庙宇之中的钟，就是神圣的法器。佛钟有梵钟与半钟之分，梵钟即大钟，一般悬挂在钟楼顶层；半钟小于梵钟，体积如梵钟一半，多吊在佛堂的后门檐上。

猪头钟是一口梵钟，就象大钟寺有了永乐大钟后游客络绎不绝，寒山寺有了寒山寺大钟后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自从有了猪头钟，妙果寺便名扬天下了。

徜徉妙果寺，一种历史的厚重感油然而生。“凿石依山作小庵，花香入座月侵檐。虽然眼界无多地，解使人天竞耸瞻。”这是南宋状元王十朋的一首诗，名为《次韵宝印叔题止庵三绝》。宝印大师，就是王十朋的叔父，曾任妙果寺第五世住持，能诗，王十朋《梅溪集》有与宝印大师唱和篇什。宝印大师尝筑止庵以居，王十朋为此还写过《止庵铭》。

“教秉禪华戒宗梵网，忤依地藏愿趣弥陀”，这是妙果寺内收藏的一幅弘一法师撰写的对联，这幅对联表达了弘一法师“普为一切众生故，不思議劫处地狱，如是曾无厌退心，勇猛决定常回向”的悲悯情怀。

“大腹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口含笑笑世上可笑之人”“妙有真空莫以如来相求我，果圆花发应无所住而生心”，我国著名国学大师苏渊雷书写的这两幅弥勒佛对联深深地吸引了我。对联告诉我们不管人生路上遇

到什么样的困难，都应豁达大度、坦然面对。

这里有永嘉宿觉大师的遗迹，这里有文人墨客的锦绣诗篇，这里更有发人深思、催人奋进的人生哲理。

“稽于史实松台山上仙人井，留得民谣妙果寺里猪头钟”。今天的猪头钟静静地安放在妙果寺大雄宝殿东侧的古钟楼，石质雕花白色须弥座托负着猪头钟那正圆筒形的躯体，钟腰上下均刻有正方形条线，钟唇呈波浪形，设计简单，却给人无尽的遐想。

据传，宋神宗元丰年间，值继忠大师住持妙果寺，某日薄暮，有客僧来寺挂单，其貌若愚，而出言必符宗乘。逾数月，日间入市丐化，布施所得，悉购猪头，归寺啖酌。一日斋罢，客僧负锄至寺旁山麓，掘一土井，将所食剩之猪头骨悉藏井内，覆以石压土泥涂封，谓人曰：“吾历年所募铸一钟，今七七日后，于此成就。”旋遂不见客僧形影矣！月逾，井中果现一钟，钟钮位二猪首合拢状。众人咸惊异，以“猪头钟”名之。

这口神钟为什么没有钟钮呢？1919年，含金钟钮被帝国主义入侵者盗走，自此神钟不再悬挂，留给人们无尽的遗憾。

古钟楼内，高193厘米、宽100厘米的《重建妙果寺碑记》非常醒目，碑刻立于1990年，由达崇率僧众所立，陈铁生书碑文，碑文主要记述了妙果寺的地理、历史及近年来的重建经过、主要建筑等。

我与妙果寺真的有缘，上世纪90年代结婚后住在夫家，夫家与妙果寺距离不足300米。于是，妙果寺就成了我常去的地方。天王殿、大雄宝殿、厢房、地藏殿、观音阁、斋堂等我都去过，当然，看的次数最多的还是猪头钟。

记得小时候，当我第一次听大人们说起猪头钟的传说，非常好奇。有一天，我们家吃完猪头肉，我偷偷地把猪头骨收集起来，埋在自家后门的泥土中，七七四十九天后，我拉着奶奶去看，里面有没有长出猪头钟，奶奶刚开始是一头雾水，当她听说了我的原由之后，便哈哈大笑起来：“傻丫头，那只是一个传说，你怎么就信了呢？”每每回想起这件童年的趣事，我总是会心一笑。

一次偶然的机，我读到了妙果寺住持达照法师为纪念妙果寺创建一千周年而作的一组词：《望江南·妙果钟声》，这组词这样写道——

钟声响，宿觉有名山。瓯浦云峰妙果寺，松台月色永嘉禅，塔影正悠然。
钟声起，灯火又依稀。有寺有山人乐住，非铜非铁钮悲离，历史应无欺。
钟声来，风卷暮云开。无我无人无世界，有花有月有楼台，闹市绝尘埃。
钟声传，守护问伽蓝。车水马龙门外过，心灯佛事意中参，步履已蹒跚。
钟声遍，世道不堪言。石火光中留梦幻，蜗牛角上寄缠绵，何日可安闲。
钟声透，大地本无心。二十年前缘故客，三千里外遇乡亲，妙用到如今。
钟声徹（彻），直上九云霄。浩瀚江河归巨海，微尘世界纳纖（纤）毫，
万古永滔滔。



这组词激情飞扬、意义深刻、令人难忘。昨晚，我做了一个非常奇妙的梦，梦中我听见一阵浑厚悠扬的钟声，从市区妙果寺那个方向传来。幽幽梦幻中，猪头钟竟然活起来了，动起来了！

中国人在辞旧迎新之际都有到寺庙撞钟祈福的习俗。每当除夕之夜，敲响一百零八声钟，预示着新年的到来。除了祛除人生的一百零八种烦恼，获得吉祥、安乐的寓意之外，更为新的一年祈祷祝福。

镇军民而康泰，保卫府以平宁。啊！妙果寺里猪头钟啊，你从《叮叮当》中走来，你从宋代的传说中走来，你蕴含着松台山温情的灵光、你蕴含着仙人井透明的芳香。你把吉祥如意洒向大地，你把平安幸福带给人间。

啊！妙果寺里猪头钟！

古城白鹿响叮当，旋律迷人韵味长。

笔墨大张吟盛世，青春瓯越绽芬芳。

今天，山脚门外、松台山、仙人井、妙果寺、猪头钟组成的这幅鹿城古景图注入了新的元素，呈现出勃勃生机，温州——这座有着 2200 多年建城历史的山水斗城焕发出新的魅力！

跟着唐朝学霸游鹿城

郑小良



公元 813 年前后，唐代深州陆县（今河北省深州市西旧村）有一个读书人叫张又新，字孔昭。此生甚是聪明，在乡试、会试、殿试三次大考中均得第一，即解元、会元、状元。在 1300 多年的科举考试中，连中三元者仅十七人，也就是说每 80 年才出一人。好家伙，成了京兆解头、进士

状头、宏词救头，时人号之“张三头”。真可谓是学霸中的霸王。

他曾经当过温州刺史，到过温州很多地方。不妨循着他的足迹游览一番。

（一）五马街——浙南第一街

时清游骑南徂暑，正是荷花百里开。

民喜出行迎五马，全家知是使君来。

这是一首张又新写五马街的七绝《百里芳》，意思是：盛世清平的日子，在南方六月的酷暑中，驾着马车一路游行，正值百里荷花怒放，此时此刻，便想起传说中百姓全家出动迎接王羲之出守永嘉，庭列五马，绣鞍金勒的盛况。

这就是五马街的由来之一。宋哲宗时，温州知州杨蟠《百咏五马坊诗》云：“相传有五马，曾此立踟躇，人爱使君好，换鹅非俗书。”明嘉靖《温州府志》载：“王羲之，山阴人，为永嘉郡守，出乘五马，老幼仰慕，为立五马坊。”

清光绪《永嘉县志》亦载：“王羲之守永嘉，庭列五马，绣鞍金勒，出则控之，故今有五马坊。”可是王羲之从来没有担任过温州太守。但据《永嘉县志》记载：南宋洪庆善《韩文辨正》及《字典》“马”注：“谢灵运任永嘉太守，以五马自随，立五马坊，五马亭。”后来就叫五马街。明朝文学家彭大翼《册堂肆考》中引述了一段记载：“谢灵运出守永嘉，人曰骑紫马者太守也。”故杜甫诗云：“使君骑紫马，捧拥从西来。”汉以后，五马相随，成为太守仪仗队的特有标志，这在汉乐府《陌上桑》中已有所反映。

五马街到底是谢灵运而立还是王羲之而立暂且不管。据资料显示：五马街的前身是五马河——护卫子城的河。温州古城含内外城两个部分，呈

回字形。外城又称罗城，内城因建造时间晚，故称子城。温州古城格局千年未变，外城有护城河，内城还有三重护城河，街巷傍河，四通八达。据明王瓚和蔡芳编纂的弘治《温州府治》记载，谯楼前曾有三重护城河：第一重是从小南门河进到雁池（乘凉桥一带），第二、第三重是“径其支河，方过雁池未至城西，即从宅真桥（今宴公殿巷西入口处），东出小周桥（今公安路与宴公殿巷汇合处），至通道桥（宴公殿巷东入口处）边，与下河通南门内河，径为南濠第二重，而五马河为第三重。“由此可见五马街历史上最初是一条护城河——五马河。宋代石牧之，曾知温州，是第一个开发五马街的官员。温州古城火灾频繁，石牧之采用建保甲联坐的火保制度来防火、救火，取得很好的效果。他还下令拆迁影响交通的房屋，开辟出一条宽敞整齐的道路，从此五马街畅通无阻、日益繁荣。清时五马街分为直街和横街，郡治前或谯楼前南北纵向的为五马直街，民国时改为公安路；东西横贯的叫五马横街（今日的五马街）。

1934年，因道路拓宽，五马街改名为中山街。解放后，又恢复五马街之名。旧时这里商贾云集，绸布庄、百货店、铜锡器皿行、中西药店，钱庄等鳞次栉比。最有名气的是“五味和”“金三益”“老香山”“第一百货公司”“温州酒家”“百好炼乳厂”等。

“五味和”矗立在五马街口，原温州酒家对面的“五味和”，是温州史上最悠久的一家副食品商店。它始建于清光绪六年（1880），是宁波慈溪来的杨正裕、冯伯楨等十来个宁商集资500银元创办的，起初只是家蜜饯行，地址在馒头巷西段，也就是现在的鼓楼街78号，门两侧书：“蜜饯海味各种药酒；南北果品罐头茶食。”横书：“五味和”。“五味和”原名“五和”，因冯伯楨与清末名家梅调鼎，字友竹，晚号郝翁，慈溪人，清末书法名家、画家）有旧，遂嘱书店招，梅再三推敲，认为应在“五和”两字间加一“味”字，不但读来顺口，且寓意酸甜苦辣咸五味调和与贩卖的商品所对应，故有此名。光绪二十九年（1903），杨正裕的儿子杨直钦继承父业，在五马街口增设分店，即现在的五味和所处的位置。小杨很

有经商头脑，业务发展迅速，特别以瓯柑畅销京津北方而获利巨大。民国二十一年（1932），温籍股东林敏卿任新店经理，因经营有方，业务不断扩大，在温州独占鳌头。1956年公私合营，1966年转为国有，改名为地方国营新风副食品店，1979年恢复原店名。“五味和”最出名的是“白鲟生”（鱼生），制作工艺有百年的历史，远销海内外。曾用龙泉青瓷罐精装销往香港。旅居台湾的著名报人马星野得到一罐乡亲送的“白鲟生”后，激动万分，挥笔写下了：“拜赐莼鲈乡味长，雁山瓯海土生香。眼前点点思亲泪，欲试鱼生未忍尝。”的诗句。小小鱼生勾起了游子无限的乡愁。

金三益始建于清咸丰九年（1859），由浙江吴兴县南浔斜桥兜人金绪宝三兄弟创办。他们贩进湖州蚕丝，贩出温州瓯绸。由于瓯绸织工精细，品质优良，深受外地人欢迎。而温州瓯绸作坊喜欢选用湖州蚕丝，因此两头得利，收入丰厚。起先在市区鼓楼下开设专营湖、苏、杭绸缎的商号，名曰“金同益”，后改名为“金三益”。由于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信誉确立，生意兴隆。后迁址五马街中段，成为温州绸布大号。温州民谣有唱：“头顶东桂芳（帽），脚踏余顺康（鞋），身着金三益绸布庄。”足见“金三益”声誉。“金三益”店面门是石窟门，有五间，门口是一个门台，走进去以后是一个天井，上台阶便是大堂，大堂后是员工宿舍和会客厅。“金三益”财力雄厚，国货公司、太平洋钟表店等都是它的产业，在上海有很多商店、银行的股份。旧时，温州的老百姓订婚、结婚、生子、做客、逢年过节，都喜欢到“金三益”买布匹，再找裁缝师父做新衣。

老香山，创办于清同治年间（1868），这座中西合璧、历史悠久极具特色的三层古建筑，是温州五马街“老字号”的标志之一。尤其是该店自创办以来，一如既往地经营中药材、中成药、中药配方、参茸滋补品等，而且从未变迁店址，也无间歇、中断，历经150多年余年至今未变，在温州实属罕见。老香山的创始人是明州宁海县香山（今宁海县西店镇香山村）药商李氏（名字、生卒不详）。辛亥革命后，第二代传人李厚康于上世纪二十年代花巨资盘下相邻的温州著名乡绅包兰儒的宅邸，兴建一座三层中

西合壁的楼房，落成后请著名书法家曾耕西（1893-1990），温州鹿城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西泠印社温州域友）题写“老香山”三个斗方大字，制成镀金横匾悬挂店堂门庭上额，延用至今。老香山外观洋气十足，水泥钢筋浇筑，砺灰抹面，镂花雕刻，红木窗户，高大光亮，十分气派。拐角处为钢架玻璃推门进口，两边为八片屏风联运启闭、方便自如。西北首为砖墙，隔热防晒。墙上设有多扇气窗通风，有石库门，店堂呈现一派古色古香。杉木柜台为七字形，柜头短平，柜尾宽长，宛如一条长龙，甚为精致美观。

温州第一百货公司，创建于1925年，前身是蜚声浙南的“云博百货商场”。云博百货商场是由温州著名商贾许漱玉（1880—1967）创办的。光绪十八年（1892）许先生到温州益大布店当学徒，六年后便独资在曹仙巷租赁房屋开设“许云章绸布店”。民国六年（1917），许先生在五马街购置房产，建造洋楼，将许云章绸布店迁此营业，先后开设“云章洋货行”和“云章绸缎局”。民国十四年（1925）又在西侧建洋楼，开设博鸥广货店，专营百货，合并称“云博百货商场”。之后，许先生又在其商场后面买下了三十余间旧房拆迁，同时将原先的砖木结构楼房换成钢筋水泥建筑，将几座楼房连成一体，形成大规模建筑群。他将商场后楼租给一位青田陈姓的华侨开设意大利餐馆（抗战爆发后，陈老板将餐馆转让给温州名厨徐岩池等三人，遂改名为“华大利”，80年代红极一时，是高大上的象征），又在店后建造一座剧院，取名“中央大戏院”（现在的大众电影院），连在一起称“云博万物大市场”，在温、台、处商界首屈一指。1941年—1945年，日军三次侵占温州，盛极一时、规模空前的云博百货商场被炮火湮没在乱世之中。解放后，人民政府在此基础上重建。

（二）百好炼乳厂

吴百亨（1894-1973），祖籍乐清，出生于鹿城。少时仅在教会崇真

小学读过三年书，后去农村替人放牛，做帮工。17岁来温州普益药房当学徒，得晚清名士陈幼农赏识，将女儿陈吉安许配给他，并资助3000大洋在五马街开办百亨药房（现五马街1号）。1926年9月在药房堂后创办百好炼乳厂，以“白日擒雕”为商标，1929年，产品获中华国货展览会一等奖，次年又获西湖博览会特等奖。与此同时，英商以“擒雕”系盗用英瑞公司“飞鹰”商标为由，与百亨进行了长达4年的诉讼，百亨完胜。从此“擒雕”声誉越发卓著，产品供不应求，成为中国最早的乳品加工企业、最早拥有乳品工业商标的企业、最大规模的甜炼乳生产企业、最高质量奖企业、拥有最先进甜炼乳生产设备企业称号。

（三）温州酒家

温州酒家创建于1956年，位于市区五马街与解放路十字路口，“五味和”对面，是温州第一家国有饮食企业，号称“浙南第一楼”。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温州酒家最擅长瓯菜，并以此倍受四方宾客青睐。冲着它的名气，这里成为市民操办酒宴的首选之地。这里藏龙卧虎，名厨辈出，是当时浙南烹饪人才中心，被誉为名厨的“黄埔军校”。中国八大菜系之一的浙菜，本无温州瓯菜的地位，以一代名厨金次凡为首的众多厨师，使瓯菜烹调艺术和瓯菜名肴走出温州，走向世界。金次凡大师以“锦绣鱼丝”“双味蛸螯”“三片敲鱼”“爆墨鱼花”等，在1983年全国名厨技术表演鉴定会上一举夺魁；他的徒弟仇云华在1988年全国第二届烹饪大赛中荣获三项全能金牌、潘晓林荣获大赛三项全能奖杯；1990年，后起之秀周雄的温州酒家在全国青工技术烹调大赛上又以高分夺冠。1996年被评为国家一级酒家，拿手菜七星丸、咸菜鸡、蒜子鱼皮、八宝松饭等都是瓯菜中的精品。

（四）谢池巷——不寻常的巷

张又新《谢池》诗云：“郡郭东南积谷山，谢公曾是此跻攀。今来惟有灵池月，犹是婵娟一水间。”清光绪《永嘉县志》记载：“谢康乐守郡，爱永嘉有东山之胜，且山水优美于会稽，乃创第凿池于积谷山下。”此池便为“谢池”，也叫灵池。谢公及后人曾在此居住过，所以谢池所在地称作“谢村”。北宋温州知州杨蟠规划三十六坊，将这里改为“谢池坊”。元代曾改为“亲民坊”，明代改为“云衢坊”，清代改为“谢池巷”并沿用至今。相传谢村红叶四时不谢，又有“四季红叶村”的美名。唐代诗人司空图《寄崔道融旅寓永嘉》诗中，曾有“碧云萧诗霁，红叶谢村秋”之句，描写的就是谢村的景致。

北宋大观三年（1109），被称为“元丰九先生”之一的周行己，因曾师事程颐而遭新党参劾，罢职回温，在谢池坊古宅创建“浮沚书院”，传习洛关（程颐、张载）之学，“邦人方知有伊洛之学（程颢、程颐）”。使洛学在温州盛行，奠定了永嘉学派的基础。

清道光五年，时任湖南粮储道的张瑞溥（字百泉。举人）辞官还乡，在谢池旧址购买十多亩地营造“如园”，临池建楼三间，承袭“池上楼”原名，以纪念谢灵运。如园又称“张宅花园”，北起府学巷，南至谢池巷，东与中山公园一墙之隔，西边包括现温医附一院（儿童医院）急诊楼。内建怀谢亭、春草轩、鹤舫、十二梅花书屋、飞霞山馆等建筑群。园内尽栽梅、兰、松菊、蕉、竹。站在池上楼，临窗而望，山光水色，赏心悦目。对面积谷山的“小赤壁”和月担桥，连同墙外树木苍隋、泉涌池绿，菡萏含苞；园内楼台亭阁，假山奇石，回廊曲榭，石径通幽，无不令人称奇，仿佛把苏州园林的隽秀、精巧移植至此。晚清封疆大吏、有中国楹联学开山祖之称的梁章钜笔下的“楼阁俯城隅，一角永嘉好；风流思太守，千秋康乐旧池塘。”正是如园的真实写照。

与如园一墙之隔的周宅花园，俗称周宅大屋，由清嘉庆年间（1796—1820）周雨生购屋并进行扩建。周宅南北有河，正门为谢池巷，后门是府学巷，纵深五进，后门对面是周宅宗祠（后为明德小学、府学巷小学，今为城南小学分校）。整座周宅大屋占地17亩多，内有厅堂正屋、厢房、边间、谷仓、供销柴间，有大小中堂36个、道坦（天井）72个，设友花吟馆、种莲池馆、小浮沚廊。园中有假山、水池、廊榭、花墙，种有桃、竹、梅、柳，四季如春，花樽、花盆无数，楠木、红木制的太师椅、八仙桌，太湖石的石墩多座放置园中。大屋为青砖门庭，门台上书“大夫第”横匾，大堂悬挂“周景善堂”巨匾，另有贴金匾额“竹孝松贞”，在当时甚至今日堪称浙江最高、大、上整体民宅。清温州府司马郭锺岳有《过周氏涉园看菊》一诗，描述涉园当时的盛景：“信步东山下，徘徊到涉园。闲庭问松菊，浮涉浸窗轩。秋色心清赏，寒香目笑存。远来谢车马，莫使俗气喧。”还有周家出了个赴日留学、曾参加同盟会的周孟由和我国银行界元老周守良等著名人士。周宅后来成为平阳矾矿驻温办事处、温化职工宿舍等。

城下寮庆福寺坐落在积谷山下（现中山公园内），大南门东城，坐西朝东，紧靠城墙，山门前一湾护城河，环境优美，闹中取静。有“城市山林”之称的庆福寺，创建于清嘉靖和道光年间。寂山和尚住持时，与吴璧华、刘景晨、杨雨农、周群铮等地方士绅、社会名流交往甚多。周群铮的大哥周孟由与同在日本求学的李叔同（弘一法师）因志趣相投，成了莫逆之交。弘一法师早已慕名温州山水清秀，气候宜人，曾多次在庆福寺住过（离周家近，便于照顾），并拜寂山和尚为师。弘一法师留居温州长达十二年之久，占据了他24年修行生涯的一半。庆福寺成了他的第二“常住”，温州成了他的第二“故乡”，因此，庆福寺香火鼎盛。

据老人回忆，谢池巷颇具江南民居特色——小桥、流水、人家。20世纪50年代以前，巷中间有一条小河穿过，河上架有几座石桥，其中有名的有“永宁桥”“寿女桥”，两岸民居错落有致、鸡犬之声相闻。相隔二三十米有小埠头，既可以停靠小船，又可以供居民洗涤。河畔植树成荫，

河中清水荡漾，可见小鱼浮弋，常见有人垂钓。每逢盛夏，小河成了青少年戏水、游泳的场所。这条小河与城内纵横交错的小河相通，经茶院寺连接塘河，直达瑞安、瞿溪等地。

近代以来，谢池巷走出了众多的名人。被誉为“一代词宗”的夏承焘，就出生在谢池巷一个普通布商家庭。上世纪三十年代，他搬住谢池巷原东山书院旁，以“谢邻”自号。其得意弟子琦君曾寄居此处。谢池巷168弄18号曾经是1919年由黄溯初、潘鉴宗、吴璧华等人创办瓯海医院（附一医老院）的教工宿舍，居住过杨玉生、林镜开、缪天荣等名医。

（五）华盖山——天下第十八洞天

张又新在大观亭上作《华盖山》诗云：“一岫坡陀凝绿草，千重虚翠透红霞。悉来始上消归思，见尽江城安适百家。”

华盖山，亦名东山，素有“九斗山”斗魁之首的称谓，山不高，56.8米（小丘而已），但被唐代道书《洞天福地记》列为天下第十八洞天。相传，黄帝时，容成子修炼于此。据《洞天福地记》载：第十八洞天华盖山。周围三十里，名容成太玉之天。《方輿胜览》载：浙东路瑞安府华盖山，去子城一里，山有洞，乃容成太玉之天，第十八洞天也。据《潜确类书·区宇部》载：华盖山，在温州府城东，《道书》第十八洞天，下有容成洞，相传黄帝的老师、重臣容成子修道于此，宋仁宗尝三遣使访之，有三生石在耳。据《浙江通志·山川考》：华盖山，在温州府东，一名东山，有容成太玉洞，为天下第十八洞天。相传黄帝时容成子修道于此，又有石龟池、三生石、青牛坞、丹井、蒙泉诸胜，其巅有大观亭。据《温州府志·山川考》：华盖山，在府治东，当九斗山之口，有容成太玉洞。据《永嘉县志·山川考》：华盖山，在县治东，其巅有资福寺，又有江山一览亭，后圯。明嘉靖间，郡守龚秉德重建，改为吸江亭。万历间，副使蔡廷臣复建，改名大观亭。又有容成洞，三生石、王粒松，金鸡岭，青牛坞，石龟池，丹井，

蒙泉，一清泉诸胜。

《永嘉县志》载：唐高祖武德七年，淮南道行台仆射辅公祐反，台衢诸郡皆陷，瓯民筑华盖山固守。高祖派遣将周法明击之，公祐死。宋项评，幼灵异，好神仙术。嘉定间，游华盖冈，遇异人，授以修炼法。遂弃世事，结庐罗山溪旁，自号守虚子。隐修辟谷，竟坐化。北宋第一神仙道士林灵素，字通叟，温州人。善雷法，以神通威名于世，为神霄派领袖级人物。北宋徽宗赐号“通真达灵先生”“元妙先生”“金门羽客”。他筑室华盖山，名通真庵，宋高宗赵构改其名为资福寺，故华盖山又称资福山。元代至元和延祐年间毁于大火。明永乐年间重建；万历年间，抗倭英雄王叔杲重修；清康熙年间再次重建；同治六年知府戴槃葺而新之，并复拓隙地，构“左宜”“右有”两山房，为游人觞咏之所。

据《名胜志》云：山巅旧时有华盖楼，今大观亭是其址，初名“江山一览亭”，已圯；明嘉靖间重建，改为“吸江亭”；万历中复建，改名“大观”；后不知圯于何时；清雍正、嘉庆、同治间都曾重建过。现亭建于清同治六年（1867），亭高7米，占地70平方米。大观亭原有一幅对联：“春秋多佳日；风雨此登临。”横额：“江山一览。”

温州知府文林（1445—1499），字宗儒，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在温州任职期间，抚恤贫民，兴办学校，疏通水利，减轻赋役，深受百姓爱戴。后赴山东博平等地为官，温州人民联名上书，渴望文林再来温为官。弘治十一年（1498），文林回来了，到任后立即处理积案，积劳成疾，次年卒于任内。温州吏民自愿凑集千金为其治丧，家人尊其遗训谢绝一切丧礼。温州人民为此在华盖山北坡建了一座亭子，名为“却金亭”，以纪念这位清官。文林的儿子就是名满天下的明朝大才子文徵明。

东瓯王庙是为了纪念东瓯王驺摇统率义军跟从鄱阳令吴芮投入灭秦的洪流。秦灭后，又帮汉高祖刘邦打败项羽，立下战功，封为东海王，都东瓯，俗号“东瓯王”。他勤政爱民，改变了瓯人“断发文身”、以蛇、蛙、鱼、蛤为食的原始生活。同时大力发展手工业。让温州在2200年前就成

为一个手工业商贸城市。为了纪念他，在华盖山西麓建造东瓯王庙。后圯，明王叔杲重建并撰两歌，其兄王叔果撰写了《重修汉东瓯王庙碑》。后圯，成了学堂，现又重建。

蒙泉位于华盖山西麓，俗称砚瓦槽。是市区三大名泉之一，泉水冬暖夏凉，味甘沁脾，久旱不干。传说张果老写字时，曾用笔在此砚中浸了一下。泉边立有宋太祖赵匡胤第五世孙赵子游墓志铭。据《永嘉县志》载：“《谈荟》：温州酒有蒙泉、丰和春。”（原注：“《瓯江逸志》：唐人酒多以春得名。永嘉丰和春亦著名，酒史盖效于唐也。”《温州轻工业志》载：“北宋咸平二年（999），市区清心堂的丰和春（酒）选用华盖山麓蒙泉的水，制成碧露酿液。”可见自唐代开始，蒙泉已经成为酿酒的著名泉水，甚至出现“蒙泉”“丰和春”名酒。

二十八宿井之一——横井始凿于晋太宁年间（323—326），今井重建于元至正庚寅年（1350），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加修，民国二十五年（1936）重修。井栏呈六角形，为六块青石板合榫而成，外侧刻有几何花纹，内侧三块青死灰上刻有“天宿”及纪年铭文。井壁用青砖平铺成圆筒形，内径约1.45米，深6.5米。横井井水由井底岩石缝中涌出，水质清冽甘美。

东山书院，旧在华盖山（东山），温州最早的书院，创办于北宋，宋皇祐间（1049—1053），王开祖讲学处，并开永嘉学术之先河。东山书院名师云集，陆汝钦、王执玉、孙扩图、张振夔、孙锵鸣、王棻等，培养出陈舜咨、张梦璜、林从炯、董旂、伍叔傥等一大批佼佼者。明嘉靖十二年（1533）毁于台风，三十一年知府龚秉德重修，清雍正芮复传移建于城东南积谷山麓（现中山公园内）。

1927年2月，北伐军进入杭州，震动上海，上海司令李宝章秉承孙传芳旨意，派出大刀队屠杀无辜百姓，激起民愤。时于上海大夏大学（华东师大）学习的温籍共产党员陈亮、陈骏等组织宣传队、市民救护队，在上海曹家渡一带进行宣传活动，被李宝章的大刀队抓住，在五角场被杀害，

英勇就义。上海市学生联合会召开全市学生大会暨死难同学陈亮、陈骏两烈士追悼会，有 5000 千多人参加，大会作出决议，将陈亮、陈骏两烈士与“五四”死难烈士合葬，并呈请市政府抚恤烈士家属。上海大夏大学学生会为烈士出刊纪念。上海《申报》《民国日报》等刊登两烈士英勇不屈的斗争事迹。消息传到温州后，各界人士决定将华盖山双忠祠改建为二烈士祠，由蔡元培撰文、马公愚书写《二烈士碑铭》，现在原址建双烈亭，以告慰烈士、教育后人。



吴莹摄

蝉园甘露润心田 转眼云烟四十年

——忆方介堪先生

陈言

2021年，方介堪先生诞辰120周年。温州博物馆举行“玉篆春风——纪念方介堪先生诞辰120周年特展”。与书友前往观看展览时，40年前拜方师学艺的历历往事不时浮现。

（一）方师帮我取名字

1980年5月，方师住蝉街一个大院子第三进西边的老房子。我由方师孙女方凝碧带到他跟前，他的卧室兼书房在二楼，房间里摆着一张书桌，一张床，还有一张八仙桌。

方师安排我在八仙桌上写字，临写秦《泰山刻石》。方师说：“《泰山刻石》非常好，要一辈子学下去。”我写好字请老师批改，他都是用手指在习字纸上，指出哪些不足的地方，从不提笔改作业。老一辈艺术家的教学方法与现在不同，他不直接写给你看，而是开导你的悟性，让你去看书，领悟其中奥妙。有一次，我斗胆请老师示范给我看，方师只写了一个《泰山刻石》里的“刻”字，我全神贯注地盯着老师的起笔、行笔、收笔，让我受益匪浅，我在脑海里时时回放方师示范的过程，至今记忆犹新。

方师会客一般安排在下午，上午自己搞创作，楼梯口贴了一张“上午

恕不会客”的字条。但他特安排我在上午时间不定期去他家学习，令我非常感动。我写字，方师刻印，我临写完了，就伏在老师的桌前看他刻印。节奏动听的奏刀声，使我萌发了想学刻印的念头。方师看出了我的小心思说：“想学印啊？”我频频点头。回家时，方师借我《伏庐藏印》和《赵之谦印谱》。之后，我从这两本印谱入手，走上篆刻的道路。

初次学印，老师没有直接教我笔法，刀法，而是让我明白印章的方向。他说：“有些人刻了一辈子的印，连印的方向都不知道。兽钮印，应以兽的尾巴朝自己，印款刻左边；瓦钮印，应以两孔为左右。”然后叫我回去多摹写汉印，并告诉我水印上石的方法。

1981年，方师八十大寿，我撰写贺寿联忐忑地递给老师，以表祝贺。方师拆开，高兴地说：“挂上挂上”，就起身挂到自己书桌后面的墙上。当时我的原名是陈杰忠，我乘机请方师给我取名。几周后，我收到了方老师给我取的名号，“陈言，墨盒”。之后我将身份证名字改成陈言，一直沿用至今。

方师午餐一般不喝酒。午睡起床后，师母给他炒个韭菜拌鸡蛋，老师拿出一个七两的大玻璃杯，半杯白兰地，半杯青岛啤酒兑起来喝，边喝边聊天。我知道老师喜欢喝酒，但在上世纪80年代初，市场上很难买到国内十八大名酒。我千方百计托朋友通过外贸渠道，买到西凤、古井、竹叶青等国内名酒，送给方老师，老师非常开心。一天我去方师家里，看到床上有三张他篆刻的《心经》印屏。他拿了一张递给我说：“这张给你，一般人我不给的”。我受宠若惊，连说谢谢！现如今这张印屏一直挂在我的书房里。

若干年后的清明节，我带几位学生前往永嘉方师的墓地祭拜，特意带上老师生前喜欢的白兰地和青岛啤酒，半杯白兰地半杯青岛啤酒兑起来倒在墓地上。

1982年，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准备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请方先生推荐会员候选人，方师自己写了两页的推荐名单，然后叫我把名单拿给温州市

工人文化宫的黄瑞庚老师，再补充几名，在第二页的最后几列中，我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方老师这样写道：“陈言，三十岁，书法学秦篆汉隶，工研篆刻”。在方先生推荐的两页名单中，都是温州地区书坛和艺术界的名家和元老，把我也名列其中，感激之情，无以言表。

方老师有记事的习惯，客人来访，有新鲜事儿，他都叫人家写在他的台历上。有一天，谢振瓿先生来访，聊起生活趣事，说钓鱼时，拿风油精在身上抹了一下，蚊子都不来咬他，方老师听得津津有味，觉得风油精是个新鲜事物，便叫他把风油精写在他的台历上。

（二）方师家里结识良师益友

在方师家学习的过程中，结识了不少温州书画圈良师益友。如王荫槐、张如元、马亦钊、谢振瓿等。

有一天下午，我到方师家问字，正巧张如元老师也在，我问方师，“古玺里的“事”与“吏”的写法，怎么是一样的？”老师指了指张如元老师说：“问他”。我转身请教了张师，原来在古玺秦印中，“事”与“吏”是通假的。由此可见，方师是非常认可张如元老师的古文字功底。

1983年，方师年事渐高，加上文革时遭受摧残的后遗症，身体日渐衰弱。他便提笔写张小便签给他的高足林剑丹先生，嘱咐他日后在篆刻上给我指导帮助。此后，我经常拿印稿，请林先生批改。

一晃四十一年过去了，回忆从师学艺过程的点点滴滴，倍感恩师的深情关怀和孜孜教诲。我心中永远记住老师的嘱咐，几十年如一日，从事书法、篆刻创作和教学工作。夜深人静时，我作七律一首，以纪念恩师诞辰一百二十周年：

蝉园甘露润心田，转眼云烟四十年。濡笔阁楼如入定，及门刻琢未逃禅。
鸟虫朱迹名寰宇，桃李新声续管弦。不负先生久疏引，清流一注尚延绵。

回忆蔡心谷先生二三事

沈洪保

新中国成立初期，平阳县只有初中，没有高中。平阳的初中毕业生要想读高中，得去考瑞安中学或温州中学。1954年，我瑞安中学初中部毕业，考上瑞安中学高中部，年级中就有许多平阳考来的同学。据他们说，名叫蔡北新的那个同学，他的哥哥叫蔡寿康，是平阳中学的语文老师，字写得很好。因此，我那时便知道蔡寿康的大名。可我不知的是，蔡寿康先生就是后来的蔡心谷先生。

我不知道蔡老师什么时候调到温州城里。过了许多年以后，我到温州师院工作，而且参加了民主促进会，蔡心谷先生也参加了“民进”。当时“民



蔡心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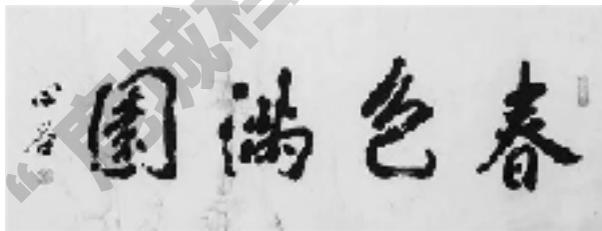


蔡心谷与夫人

进”会员还不是很多，所以开会时常常碰见，这样才认识了蔡心谷先生。

我曾经与音乐家陈乐书先生比邻而居。陈先生也是平阳人，而且他与蔡先生都曾在台湾工作过，因此他们关系很好。他们有一个朋友圈，如吴行健、樊祖鼎等七八个老知识分子，经常聚会，在风景点或餐馆或在乐书先生的院子里。他们聚会时，或品茗或搞几个小菜，喝几杯淡酒，无拘无束，欢声笑语，海阔天空任所之。

蔡先生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性格安和，总是带着微笑。他是著名的书法家，但从不摆什么架子。别人求他写字，他都会欣然应诺。至于润笔多少，他是不计较的。有时候拿一点，有时候不拿。我儿子结婚时，请他写幅字挂在书房。他就写了“诗情画意琴韵书声”条幅，不取分文。至今这条幅还挂在书房里。蔡先生隽永多姿的书法，使书房增添清雅的气氛，真可谓书法多情似故人。陈乐书先生，为人幽默，喜作打油诗，他自己认为是好玩的。后来在朋友的鼓动下，挑选结集，蔡心谷先生就给他的诗集题签，大笔一挥曰“乐翁趣语”。如此锦上添花，使乐书先生的诗集更受友朋的喜欢，第一次印刷不够分，还来个第二次印刷。



叶坪是温州知名诗人。他的诗人特质，常常会奇思妙想。他选了他的一些诗歌，竟然请蔡心谷先生把那些诗歌用毛笔抄起来，来个“诗书合集”。一般人会想，蔡先生年龄大，排起来是高一辈的，而且是著名的书法家，还是温州市书协副主席，怎么会给你抄诗？想不到蔡先生竟然答应叶坪的要求，真的把一本诗集抄起来。后来叶坪的奇想成真，银河出版社出版了诗书合集《回眸·一九八八》。激情的诗与清雅的书法融合，实在是一个

创举，可谓珠联璧合，这也是温州文艺界历史上一桩值得记录的趣闻逸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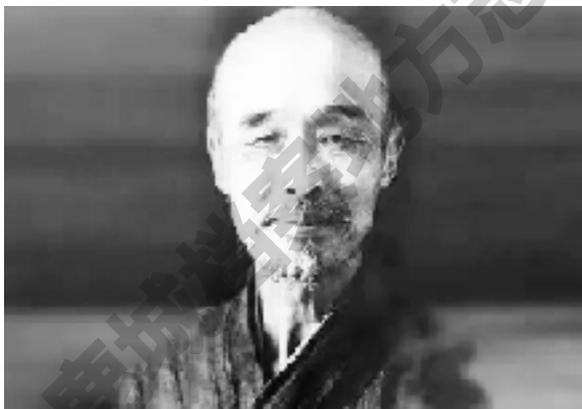
在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发展过程中，汉字的书写逐渐升华为一门艺术。中国书法成为国粹。但当今，中国书法伴随着繁荣，种种乱象也纷至沓来。有人打着创新的幌子，在歪门邪道上用气力，大搞丑书，糟蹋书法，忽悠国人、误导青年，实在令人感到惊诧与悲哀！古人说言为心声，书为心画，从诗文与书法中可以看出人格的高下。蔡心谷先生是谦谦君子，温文尔雅，他周身始终都透着一股书卷气。文如其人，字亦如其人。蔡先生喜用鸡毫，其书法劲挺而浑厚，内劲而外秀，并融入篆隶笔意。他人品正，书风亦正，是名人真迹中可宝的珍品，是真正可称作墨宝的书法。现在许多人对蔡先生的书法藏之赏之学之，这是对传统书法的美的享受，也是对传承中华国粹的美好的心愿。

先生已逝，墨香永存！



从李叔同到弘一的书体质变

孤 岛



弘一法师李叔同

李叔同是一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他的一生都在追求自己的艺术和理想。有人说，一生只能干好一件事情，而李叔同的人生经历却告诉我：人的一生可以成就很多事情。他是一位天才与通才，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工诗词、擅书法、会丹青、长音律、通演艺、精金石，并最早将西方话剧、油画、钢琴等引入国内。

年轻时代，他是一位爱国诗人，以大量激情昂扬的古典诗词，传达出“五四运动”前那个时代的云烟；他留下了创编并作词的百年名歌《送别》，

和中国人运用西洋作曲技法写成的第一部合唱作品《春游》；最早开创了现代话剧，自编并主演了《茶花女》《黑奴吁天录》等；篆刻也成绩斐然，在西泠印社埋有他的印冢，后人出版了《李叔同篆刻选》。李叔同中年以后出家为僧，起初向印光大师学净土宗，后来自己修行起最严最苦且失传几百年的律宗，吃最简单素食，穿打补丁衣服和破草鞋，是真正的苦行僧，最终成为一代高僧，并让失传的律宗得以香火重燃，写经传法，竟成佛意飘然的书法家。他还是成功的教育家，让学生丰子恺走上画坛和文坛，让

刘质平走上乐坛，让曹明华走上文坛，让吴梦非走上艺术教育的成功之路……这次，我专谈他的书法。

李叔同的书法，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出家前和出家后前期、出家中后期。

他出家前俗名李叔同，出家后有了法号弘一，其书法也可分为李叔同时期的书法和弘一时期的书法，只是李叔同时期的书法，一直延续到出家后的初期，我称之为“叔同体”，即“叔同金石书法”，以方正、雄刚、霸气的魏碑楷为特征；而弘一时期的书法，则是他出家中后期修道开悟成道之后，我称之为“弘一体”，即“弘一佛意书法”，以瘦长、柔润、浑然为特征。其实，出家后，李叔同的书法已经开始慢慢转型，虽然还是魏碑楷体书法，金石味很浓，但用笔已经更加老辣、自然，更加浑厚、沧桑。真正脱胎成为“弘一体”书法，还是在弘一修道悟真到了高境界，身心气场皆焕然一新以后，也就是李叔同从一名才华横溢的艺术家，蜕变为空明无我的一代高僧以后。



李叔同晚年“弘一体”书法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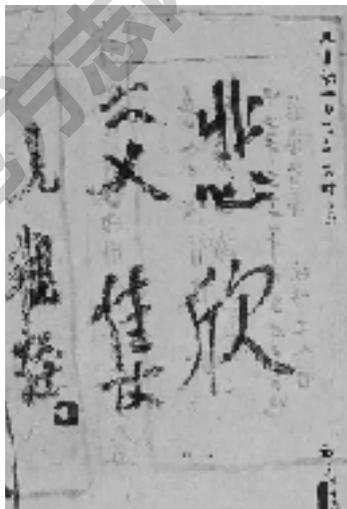
李叔同从小就读书习字，14岁临习篆书和小楷，并练习篆刻，后来，他主攻张猛龙、“二爨”等魏碑，到中青年时期，他的书法已初步形成自己特色：雄强遒劲，傲骨铮铮。起落以方笔为主，点

划横竖突兀，棱角分明；而结体多为方形，端庄工整、硬朗、紧张。

出家前的李叔同，血性十足，浪漫十足，再加上临帖以北碑为主调，所以，这时期他的书法是古重的刀剑戟，因为入世救世的念头强烈，处处有凛冽的锋芒。文如其人，字如其人，李叔同时期，他的文与字字里行间流露出一种年轻气盛的家国情怀，才华横溢而敢于担当，只是清末腐败，不能公开选用新人。所以，其书法也有一种与世不容的清高傲立姿态，像悬崖上的苍松翠柏。从形式上，这个时候的李叔同书法，以北魏碑帖为基础，掺以智永和尚、王羲之、苏东坡等人的书法笔意，写出了他青壮年时代大气凛然的精神、血气方刚的性格和方正锐利的思想，笔笔是钢筋一样的线墨，一如国家栋梁、护国护民的刀剑武器。

那时，他的书法在自我与超我境界。

李叔同中年出家后磨砺的转型书法作品，创立了一种“弘一体”，不再年轻气盛，不再棱角分明，不再碑味十足，尤其是到了晚年，他的书法进入全新时期，开始走向修长、柔韧、清瘦、恬淡的风格，放弃精气，销蚀骨力，以随意的节制、浑然的淡雅、禅悟的了然、云鹤般的淡远，达到人形与书形合一，佛我两忘、书我两忘的无我之境界。有人说，弘一的书法是脱离了人间烟火味的，是与世无争的宁静、悠然。



李叔同晚年“弘一体”书法作品

我曾经在福建泉州开元寺李叔同纪念馆欣赏到了李叔同出家前后风格完全不同的书法：一方一圆，前方后圆；一刚一柔，前刚后柔；一武一文，前武后文。两种截然不同风格的书法作品，判若两人。

出家前，李叔同的“叔同体”，洋溢着北方英雄阳刚之气；出家后，李叔同的“弘一体”，流淌着南方大德高僧的隐逸之韵。无论是出家前的生活奢华，还是出家穿百衲衣的清贫自得，无论是碑的骨，还是禅的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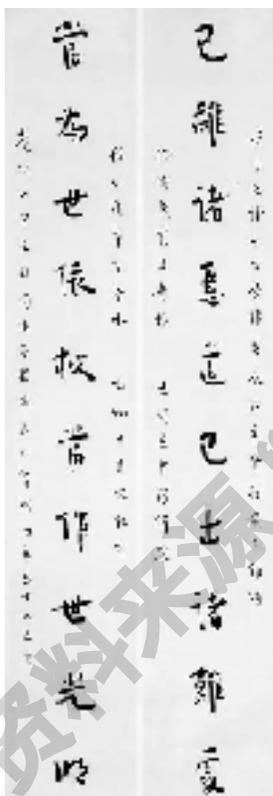
李叔同其人其书始终如一都是严于律己、谨守法度的，年轻当富家子弟时没有纨绔的自私、张狂与放荡，晚年出家为僧后也没有追名逐利的俗气，一生都能够淡泊功名，素心向天。从书法作品上看，李叔同前后期书法虽然外在形式迥异，但内在法度和神韵却都是严谨、规矩的，没有江湖草莽气，也没有只为自己书写痛快而不考虑观众的狂草书体和潦草笔墨。

这一方面与李叔同的做人做事向来严肃认真有关，他有一种做什么一定要尽力做好做成的人生理念。另一方面，也与他后来修行律宗有关。弘一50岁以后的书法，与其人一样，真正达到了孔子所说“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规矩与率性浑然一体。

弘一说，在万法皆毁（包括世间法律与道佛戒律被破）的时代，只能

以“戒”（自戒）为师，按戒律说话做事，戒除自己的私欲。世人都只无限地自我扩张，却皆不愿、也不能自我约束，越是大权者、大富者、大名者，越是任意扩张自我的欲望，让自我无限膨胀。弘一本性少私，在几十年的修持戒律中，完成了一个天才自我约束的人生。他瘦长柔韧、自然放松、率性恬淡的行书书法形式，凝聚着禅意佛性，与那位吃肉喝酒、放荡人生的唐代怀素和尚的狂草形成强烈对比。普通人观赏弘一的书法，不仅看得懂他写的佛禅内容，传达出一种素心、向善的精神力量，也让人欣赏到古雅而宁静的美。

如果说，李叔同出家前写书法，与所有世俗书法家一样，存在着为书法而书法的专业技艺敬业理念，而出家后，作为僧人的弘一书写书法不是志在书法的外在形式，而是志在书法的书写内容，他写佛经、写佛偈、写佛理对联和条幅，都是一种自我修行或传播佛法的方法，包括他亲自



李叔同晚年“弘一体”书法作品

为弟子丰子恺的第一本《护生画集》题写诗词、说明文字，皆不是为了“彰显”他的“书法作品”，而是为了传播万物有灵、众生平等的大爱，为了弘法利生，为了拯救天道人心。

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与李叔同生前努力并成就斐然的篆刻、音乐、话剧、教育等一样，都是世俗人间精神追求的一部分，而他在杭州放下工作和家庭在大慈山定慧寺出家，则已经宣告与这一切告别，他出家后本来准备将书法创作与这些艺术形式一并放弃，但印光大师告诉他，可以用书法抄写佛经、题写佛禅文字，以书法的形式弘扬佛法。从此，弘一写书法只写佛法内容，再不写任何世俗社会的诗词文章，包括名言警句。

在书法上，作为出家人的弘一不是为书法艺术而书写，而是为弘扬佛法境界而动笔，如果说前者是一种精神活动，后者则是一种灵魂修持。而他晚年的书法则达到了一种本我和无我的境界。本我，是一种人之初的本来面目，是老子说的“复归于婴儿”；无我是一种放下自我与超我，达到天地人合一、佛我合一的忘我境界。

他的书法遗世独立。其人生也如此，大作家林语堂评价说：“李叔同是我们时代里最有才华的几位天才之一，也是最奇特一个人，最遗世而独立的一个人。”

孟庆江的人生三品

褚 坚

日前，我有幸再次拜访中国著名画家孟庆江先生。在交流的过程中，他热情、健谈而又充满正能量，的确使我受益匪浅。他的人生道路也有坎坎坷坷，年轻时也曾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但在他的画作中，看不出有任何的怨气和不满。画里画外，他把人生的坎坷当作丰富人生故事的驿站。他的内心积存着积极向上的人性哲理，于是我概括为“孟老人生三品”。

勤奋

在二个多小时的交谈中，孟老回忆起自己的从艺生涯。年幼时，他就对艺术十分酷爱。初中二年级临摹当时画家阿老先生画在学校墙上的《向毛主席献花》宣传画，获得老师和同学们的交口称赞。画稿至今还保存着，现在看来确实十分逼真。高中毕业参加艺术院校联合招考，第一志愿是中央美术学院；第二志愿是中央戏剧学院。结果被两所大学同时录取。孟老经过慎重考虑，选择了中央美术学院。想起当年，孟老的神采中透出几分得意。的确，这两所中国艺术最高学府至今的名气还是响当当的。当时，中央美术学院在华东六省一市仅招两个名额。与孟老一起考上中央美术学院还有一位是上海的王兆荣，曾担任江西美术家协会副主席，现在是上海

刘海粟美术馆馆长。这样的成绩除了天分，必须加上勤奋才能达到。

尽管当时孟老最终没有选择戏剧学院，但他对戏剧的爱好始终贯穿他的人生。无论从他的关于戏曲的绘画作品，还是他利用业余时间经常写的剧本，参与一些戏剧演出等，都可以从中读到他对戏曲艺术的热爱和勤奋。他与戏剧界的梅葆玖先生、武生泰斗王全璐、评剧名角演“刘巧儿”的新凤霞等都有较多的交往。2020年，温州文化界改革，将原“温州戏剧研究院”与“温州书画院”合并为“温州戏剧书画研究院”。当时，许多专家不理解、不接受，后来请孟老作“戏剧和美术的共同艺术美”讲座。孟老以对两门艺术精深的理解娓娓道来，引起听讲座的书画和戏剧艺术家们的共鸣，促使大家愉快接受这次改革。

孟老今年已经八十五岁，但仍然精力充沛、思路清晰，每天工作到凌晨一两点。由于很忙，也很少运动，但每餐喝点小酒。询问孟老，他父母是否长寿？答案却与事违。他十多岁失去母亲，三十多岁父亲去世。从遗传学角度看，孟老没有占优势，但孟老现今八十五高龄为什么还如此精力充沛、如此健康呢？孟老自己给出的答案就是两个字——勤奋！

根据孟老保守统计，他至今创作连环画约达140套；应邀创作连环画封面204幅；创作大型国画近千幅；发表电影剧本一部。身为著名编辑的他，编撰书、画册更是不计其数。其中，孟老画并撰文的代表作有《刘胡兰》连环画、《邓小平与香港》《画说中国历史》30册、《中国近代史》连环画10册、《爸爸妈妈读过的书》连环画20册、《伟哉中华》上下册达160米等几十套本。有个成语常常用来形容一个人的学术成就，叫“著作等身”。而这个成语用在孟老身上似乎苍白无力，我认为应该用“著作超身”更为贴切。

孟老对每项创作也体现在“勤奋”二字。1973年组织上安排他创作刘胡兰连环画。刘胡兰就义于1947年，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创作有很大的难度。孟老接到任务后，陷入深思。后来，他深入到刘胡兰老家，住在村民家中整整三个多月。由于刘胡兰生前没有留下任何照片，他只好通过

村委会叫来村里与刘胡兰年龄差不多的女孩子，让刘胡兰亲属指认这些女孩的形象那点与刘胡兰相像，然后汇总起来，成画后再让村民指认哪里不像，经过数十次修改，最后形成我们从连环画看到的刘胡兰形象。后来，这一刘胡兰形象成了后来创作刘胡兰的“标准”形象。

我在这篇文章初稿完成时，在微信发给孟老后的第三天，我担心手机微信字小孟老看不清，特意加大成二号字打印登门征求修改意见。想不到，孟老根本用不着我的打印稿，他在微信里通读我的初稿后，整整手写十余张修改意见给我。我为孟老的认真劲感动，更为孟老年过 85 高龄，竟然有这么好的眼力、思路还这么清晰而钦佩不已。

与孟老交谈中，这个不平凡的老人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勤奋”。这是成就他成功人生的优秀品格。

乐观

近年来，与孟老的交往比较多，他给我的第二个感觉就是“乐观”。

六十岁退休，对一般人来说是人生的收官阶段。但孟老的人生态度完全与常人不一样。他乐呵呵地把人生分为：“0—60 岁为第一阶段，叫做积累阶段。他说这个阶段是成长、学习、工作为主，受到各种因素影响。比如读书时，有考试这支指挥棒牵制着；工作时，受单位工作任务和领导牵制着；还有要养育孩子等等人生琐事，不允许自己有太多的发挥余地。只有进入第二阶段才有充分的人生自主权，他把 60 岁到衰老不能动称为人生第二阶段，也就是辉煌阶段。辉煌阶段不设上限，他认为不同人有不同上限。他觉得自己现在 85 岁，还可以干三十年。从他乐观的言语中我听出，他把自己的人生第二阶段设在 115 岁。也许看官读到此，会认为这是在吹牛，人生百岁是个极限，但我与孟老交流中，我感觉孟老这个人生第二阶段上限设置得非常理性。不信，我向你透露个信息，孟老在 80 岁时书面制定了自己人生重大计划。我将其择要罗列如下：共十五条。第一条，

继续完成《京杭大运河画》，200米；第三条，创作红楼梦《大观园全图》，含626人；第六条，工笔画《女人体百图》，继续完成59幅；第十二条，《伟哉中华》大型画册修订出版；第十三条，《孟庆江文集》（50万字）整理出版；第十四条，封笔之作《话说瓯江》完成；第十五条，《孟庆江全集》整理出版。尽管没有全部摘录，但看到一位八十岁“老人”制定如此宏大的计划，一个刚刚走出校园不到30岁的博士也感觉有点大！有点难！但我从孟老处了解到，他今年85岁，五年过去了，计划大多已经完成过半或者已经启动。也许你认为，孟老是名画家，有秘书帮忙！错了，他就是自己一个人在做！他每天工作到凌晨许，每天上午七八点起床，然后按部就班地开始工作，奋力完成他的人生计划。也许，有了远大的追求目标，有了乐观心态，他才能在八十五岁高龄仍然精力充沛、思路清晰，一点也不显得老态。是的，人生是否能发挥作用与年龄没有直接的关系，只要像孟老一样有了人生的目标，动力就会源源不断地迸发出来。退休了，不要以为年事高了，什么都不干、什么都放弃，如果这样，那么人生就会留下一个可怕的目标——死亡！

他把人生第三阶段称为“无用阶段”。说这时已经无法工作，乐观地将目标定为“等着老去”。

从他的音容笑貌、从他的举止行为，都感受到他的乐观向上的品格。他每一幅画、每一篇文章、每一部书都传递与主流价值观紧密相融合的正能量。

己亥年末，新冠在荆楚大地流行时，得知医务人员不顾自身安危奋力工作在抗疫一线时，他想自己也不能落后，就连夜画出医务人员出征与家人告别时的场景，观后催人泪下，也感动了一线医务人员和广大群众。在孟晚舟被美国无辜扣押三年而回归祖国时，他创作《归途》画作，无偿赠与孟晚舟女士，传递出一股拳拳爱国之心。有约稿为“五七干校”2022年纪念创作时，他把当时在“五七干校”一起劳动的几位典型名人画在一起。其中，有冰心看菜园子、邵宇赤膊割麦、臧克家学毛著、许麟庐放鸭子等，

最后一位是自己，还不忘记幽默地题上“孟庆江当班长”。

的确，当年他同全国六千多名文化界人士第一次下放到湖北省向阳市“五七干校”，主要劳动是种水稻。同来的大多是北方人，只有孟老来自南方，就指定孟老当技术员，也就理所当然担任一个劳动班的班长。其实，孟老从小在温州市区长大的，只有在中学劳动课下乡插过秧，对怎样种水稻也了解不多。不过孟老是个乐观好学的人。他一边向农民学习，一边担任“技术员”，很快掌握水稻种植技术，还写了本科普书《水稻栽培日记》。当他回忆起当年在“五七干校”的艰难岁月时，还是一副乐呵呵的样子，带有几分童真！这乐观精神感染了我 and 周遭的人们，这正是他的又一激发人生动力的优秀品格！

“人生不在能知，而在能行”。孟老常常说，人生不要太纠结于为什么。没有太多的纠结，每天的生活总是乐呵呵的！有时候想的太多就会因为思考停止前行的脚步。我们要在行动中思考，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做好充足的安排，做好应变的准备。

热心

孟老是土生土长的温州市鹿城区人，直到上大学时才离开温州，大学毕业后分配在北京工作。曾任人民美术出版社副主编、《连环画》主编、《中国艺术》副主编、人民日报《人民艺术》名誉主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评审专家、国家图书奖评委等一系列职务。官至副厅，在美术文化界也颇有名望，但他从不摆架子。年轻时如此，年老也是如此。有人称他是著名画家，他常常会纠正道：“我真正的职业是编辑”。

在北京工作时，孟老曾帮助过一位来自江苏如皋的叫胡蓉的残疾女孩。胡蓉是一位脚残疾只能借助轮椅行走的农村姑娘，但立志刻苦学习连环画。父亲送她到北京参加《连环画报》社举办的培训班。时任人民美术出版社副主编、《连环画》主编、培训部校长的孟老得知后，为她租房、免费辅

导她绘画，周末还请她到自己家，由夫人为她做好吃的菜改善生活。在北京期间，胡蓉深受母亲车祸死亡和高考落榜的双重打击，曾想放弃学习。孟老得知后，主动联系胡蓉，鼓励她继续学习，免费辅导并引导她学习动漫。在孟老的帮助下，胡蓉获得动漫国际大奖，被当时香港报纸称为“中国卡通第一人”。从此，她稿约不断，在北京成立公司，并成了家，成为孟老引以为荣的弟子。

孟老对家乡一直铭记在心，有着浓浓的乡情。他一直挂念温州的社会、文化旅游等事业的发展。特别是对温州传统文化的挖掘做出很大的贡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他曾适时地为温州市政府出谋划策，恢复温州传统文化活动——“拦街福”。他还积极参与南塘街规划、设计，为温州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每年秋冬季节，孟老都会回温州居住，一是避寒，二也是对一份家乡的情节、一腔乡愁。温州市政府对孟老也十分关心，在环境不错的瓯江边住宅区，新田园“聚英家园”拨出一套130多平方米的精装修房子无偿供孟老回乡居住。孟老居住一段时间后，考虑夫人年事已高，又腿脚不便，同时也不想老占着政府的房子，他毅然退还给政府，自己在永嘉大厦花二百多万买了一套供自己两老居住。有人感觉奇怪，聚英家园不讲房产价值，就是每年出租的费用也不菲，孟老为啥要白白放弃。孟老回答的很轻松：“我现在退休工资也不低，儿子也是画家，也不需要老人资助，钱放着也就放着，在家乡买房子住不是很好吗？再则，现在住的房子在闹市区，生活也很方便，更重要的是站在现在居住房子的客厅里，往下刚好看到他小的时候生活、玩耍、上学的地域，也让他常常滋生出浓浓的乡愁，也个他的美术创作以无尽的遐想”。从这里看出，孟老对家乡深深眷念的一种朴素情怀。

孟老在北京工作几十年，只要有来自温州老乡找他帮忙，不管是否相识，他都会要热心地帮助。1967年冬天，北京下起鹅毛大雪，十分寒冷。温州十多位年轻人随大流到北京串联，由于事先准备不足，没有带足够的

冬衣。又与当地衔接出了问题，无处可住，深夜十二点还无处落脚。此时有人想起孟老，抱着试试的心理用公用电话给孟老办公室打电话。没有想到孟老正在办公室加班。孟老接到电话一口答应安排。此时，已经没有公交车，孟老又不会骑自行车，只好根据电话里描述的不太准确的位置冒雪跑步寻找。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北京街头找到正冻得瑟瑟发抖的老乡，最后把他们安排在人民出版社的一间画室里度过寒冷的一夜。

孟老是著名画家，又担任美术编辑部的行政领导，他对温州的画界后学也十分关注。他在担任人民美术出版社副主编、《连环画》主编期间，有许多工作需要外包给社会年轻绘画工作者做，孟老时常照顾温州年轻画家。笔者采访过程中了解到，现在温州许多知名画家都曾经接过孟老“照顾”的外包的“活”。孟老在他们工作过程中，还不时对他们热心指导，带动温州一大批年轻画家的发展。这些实例枚不胜举，在孟老看来回轻描淡写地说，这些都是“举手之劳”。但深深地透出孟老朴素又浓烈的乡愁。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孟老常说。他对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总是热心而不遗余力。“热心”是我在与孟老的接触中感受到的又一个打动我的优秀品格。

每个成功人生一定都有成功的品格。仔细回味孟老的成功人生，就是因为他有“勤劳、乐观、热心”的人生三大优秀品格，才有今天的成就。在采访孟老的过程中，我常常被孟老的“三品”折服感动！

瓯菜老厨师郑志钦

朱凌云

郑志钦，温州老一辈瓯菜名厨，省一级厨师。他曾在温州酒家工作17年，还在华大利餐馆、浙南酒楼工作多年。单位承包后，他和家属在矮凳桥成功开了十余年的茂福酒楼。他教了很多徒弟出来，这些徒弟现在大都在各大酒店当厨师长。他还兼职烹饪教学，传授瓯菜技艺。

（一）

郑志钦，1939年11月出生，温州乐清人。兄弟姐妹4个，他排行老三。

10岁时，郑志钦到温州亲戚家拜年，留在了温州。他表哥在五马街开黄釧记饭店，他有时就给店里跑腿。亲戚安排他去读书，因为听不懂温州话，读了半年即辍学。“土改”后，他回到乐清。没念两年书，又受表哥邀请，到表哥店里干活。

1956年初，全国范围出现社会主义改造高潮，温州私营企业（包括小商贩）全部实行公私合营和合作化。温州县前食堂原为一私家小餐馆，由吴正桃等人经营，经公私合营后，规模扩大数倍。食堂有三层，计500多平方米。该食堂比温州酒家和四顾桥的华大利餐馆开业都早，是温州市区当时最大的食堂，工作人员达四五十人。郑志钦和王成山是首批到该食堂

工作的人员之一。不久，他即拜陈余友为师，学习改刀，算是正式入了行。当时工资为 15 元左右。

陈余友以前和张阿宝、银姆合伙开小餐馆，公私合营后，他们和其他一些搞餐饮的都进了县前食堂。银姆负责进货，陈余友等人负责改刀，张阿宝等人站炉台。没多久，林宝姆厨师调进食堂，陈余友调去百里食堂当经理。郑志钦又拜林宝姆为师，烧柴火弄炉灶，学炉台功夫。

1956 年 2 月，温州市饮食公司敲锣打鼓宣告成立，由毛志平任第一任经理。1957 年上半年，饮食公司在城西教堂召开饮食业大会，并举行师徒签约仪式。该仪式按红白案分两批，有师徒十几对。陈余友和郑志钦是一对，陈锦树和王成山、南永坤和永望、吴正道和张珍珠（女）、谢聘康和赵芳弟，祁碎标和黄国荣、吴康华和卢作汉、邵清山和诸葛汉等一对对师徒，都签约结对。

不久，林宝姆调去四顾桥的华大利餐馆工作。师傅相继离开，郑志钦感觉很失落，便和老师傅陈余友商量，也调到了百里食堂工作。工资升为每月 24 元。

1958 年 10 月，国营温州煤球厂成立。此后炉灶用火，改烧煤球。

1959 年，刀工、炉工已学得娴熟的郑志钦，调到地处府前街至人民广场钟楼之间的青年餐馆工作。该餐馆规模一般，有工作人员十多人。他改刀、站炉都做，已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厨师，工资也升到了 39 元。

1960 年 1 月，郑志钦和瞿宝莲结婚。不久，他调到墨池坊口的“小天津”点心店做改刀，负责肉食等切片。当时，达到一定级别的领导，分配有熟食券，吃面条等点心时，可凭票供应熟食。同年 4 月 25 日，温州市五马人民公社成立，5 月 7 日，西山、城东人民公社相继成立，全市实行公社化。其时，温州市区上规模的餐馆有 5 家，温州酒家和华大利餐馆算是最有档次的，其他三个区域各有一家，分别为百里餐馆、广利餐馆和城西餐馆。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百业萧条。刘少奇主席提出开放自由市场政策。同年 12 月，温州恢复农村各种形式的集市贸易，商品范围除粮食、棉花、

油料统购统销物资外，其他农副产品在完成国家收购任务后，均可进行交易。该政策盘活了市场，餐馆的生意渐有起色。

1961年，郑志钦重回百里餐馆。该餐馆的工作人员工资分几类，分别为厨师、包点师、服务员等，每类再分几档，其中厨师的工资最高。郑志钦领的是44.5元，算是了高档了。

1962年，郑志钦被调到四顾桥的华大利餐馆工作。该餐馆有四层，近50位工作人员。甘宝堂是餐馆的官方经理，绍永贵为私方经理。厨房方面，由南永坤等人负责冷盘，虞福明等人负责改刀，林宝姆等人站炉台。郑志钦给宝姆当助手。

华大利餐馆推出“五元和”和“十元和”，分别为四盘两菜和四盘四菜，特别受欢迎。四盘为烧鹅、肉、鸡肫凉拌和燕尾（肥肉伴点面粉油炸），菜为敲鱼、三鲜、糖醋排骨、炒猪肝等。然而好景不长，自由市场政策被批判后，随即收拢，餐馆生意一落千丈。

1965年，浙江省饮食公司在杭州举办第二期餐饮进修班，脱产学习。全班共30人，其中温州4人，分别为郑志钦、王圣光、黄洪元、金次凡。在进修的半年时间里，杭城名厨以理论和实习相结合的方式，无私地传授高超的厨艺，让他们受益匪浅。没读过几年书的郑志钦，学理论格外吃力，因此比别人付出更多的汗水。期终，他以97分的高分结束进修，还被评为班级先进分子。他说，那时候杭城的名厨刀工确实厉害，让他大开眼界，终身受益。

也就在杭州进修期间，他收到了一封信，大意为华大利餐馆因为生意清淡，难以为继，被温州中糖公司收购了。郑志钦从杭州回来后，华大利餐馆已经关门。他只好去市饮食公司报到，被调到大同餐馆当厨师。

（二）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郑志钦到温州酒家工作。当时两派武斗如火

如茶，酒家的 40 余位工作人员，也是进进出出。不久，经理被调出，郑志钦当上了经理。“斗批改”开始时，郑志钦去上海四川饭店取经，取回来一种“大家菜”，就是将以前的各种菜单取消，点菜都取消了，代之以五种菜肴。

郑志钦和金次凡既是同事也是聊得来的朋友。两人经常闲聊，感叹手头不宽裕。其时，金次凡开始去做“撑儿”赚钱。郑志钦当了三年经理后下来，改当厨师，也开始去做“撑儿”。那时温州人结婚都在家里摆酒，一般人家都摆蝴蝶盘，后来经厨师们不断宣传，龙凤盘逐渐流行起来。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餐饮业一片萧条。温州酒家将三楼改成了那种很简陋的格子铺旅馆。那时候凡入住的，都要凭介绍信。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王圣光当上了温州酒家经理，要带领酒家打翻身仗。他们研究顾客需求，将鹅肉、肉片烧起来，放到酒家门口 1 元 2 元一碗地卖，生意好得都要排队。厨房里，徐岩池、郑志钦等人任改刀，金次凡等人做冷盘，吴正桃、张阿锡等人站炉。他一直在酒家工作了 17 年。

温州酒家后来还开辟了 6 个包厢和 3 个大餐厅，装有中央空调，配置新娘化妆室。酒家推出了三丝敲鱼、蒜子鱼皮、双味蛎蚶等 130 多道瓯菜，并烹制粤、川、淮扬风味菜等，成了那个时代温州餐饮业当之无愧的龙头老大。



20 世纪 70 年代左右的温州酒家菜单 (陈长兴提供)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餐饮业恢复了生机。但是私家餐馆逐渐兴起，不断蚕食着国营餐馆的市场份额。

1983年左右，郑志钦离开温州酒家，去了广场路华大利餐馆当厨师长。其时，华大利餐馆首任经理王成山已调到海天楼大酒店，甘端华为第二任经理。餐馆生意不佳，局面惨淡。说来也巧，那段时间，温州民间开始流行在酒店、餐馆摆喜酒。而郑志钦厨艺出色、做“撑儿”也是名声在外，招来了很多客人。那时候，大都摆10元一桌的酒席。生意兴隆时，摆到60余桌。因为排位紧张，楼上旅馆都要拆了床临时应付。一次，一户人家摆8桌，非指定要郑志钦掌厨不可。餐馆实在没位置了，就在酒楼下的菜市场肉架上摆起了酒席，让人叹为观止。

1985年，山外楼因为经营亏损，经停业扩大装修后，变身为浙南酒楼。郑志钦调去当经理。酒楼打出了横幅标语：欢迎省一级厨师郑志钦到酒楼掌厨。很多客人来定酒席，都要指定他掌厨，非他不定。如他请假，酒席都会被取消。郑志钦做的一手好菜，最拿手的，有马铃薯黄鱼、网油黄鱼、银耳绣球、松仁玉米、三丝敲鱼、三丝敲虾、生爆鳝片等，点者甚众。

没有红火两年，郑志钦突然被查出患上了糖尿病，还有血脂偏高，不得不住院治疗。此后不久，各大国营餐馆、酒店纷纷搞起了承包，浙南酒楼也在列。承包后，他不用去上班，拿200多元的工资，一直到1999年正式退休。

郑巨华是郑志钦的大女儿。早在1985年，她和老公张茂福即在矮凳桥自己的家里开起了茂福酒店。张茂福于1983年获得过由温州市商业委员会授予的四级厨师证书。酒店起先有10余桌规模，因为生意不错，又买了边上的房子，扩展到可摆17桌。该酒店属于温州典型的那种家族企业，当时和矮外楼酒店齐名，几乎天天爆满。

在实行单位承包制后，郑志钦闲着无事，也到酒店帮忙。她女儿要给他每月1500元的工资，他硬是只拿1200元。做了两年多，女儿女婿出国，酒店就由他打理。两夫妻一门心思扑在酒店上，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一直

到 2000 年因旧城改建房子面临拆迁，于是收摊休业。

(三)

郑志钦于 1982 年 7 月，获得由温州市商业局授予的一级厨师证书。1986 年 8 月，又获得由省商业厅授予的省特三级烹调师称号。1989 年，温州一批厨师，由张宝元和市商业局领导叶荣标带队，参加第二批浙江省厨师技术等级考试。全省共 20 多人，温州占了 10 个，分别为郑志钦、仇云华、甘端华，陈长兴，潘晓林、黄新姆，金冲、姚松林，郑加勋，周联和。结果，仇云华、潘晓林、郑志钦分列前三名，引起轰动。此外，温州还有甘端华、周联和获得省一级厨师职称。



1989 年，参加第二批浙江省厨师技术等级考试的人员合影

1989 年，央视七套摄制组到温州拍厨师类节目，郑志钦作为温州厨师的代表，上了电视节目。1990 年 1 月，他获得由省商业厅颁发的特二级烹调师证书。1992 年 6 月，获得由省商业厅颁发的特一级烹调师证书。1997 年 6 月，郑志钦和叶国光、甘端华、仇云华、潘晓林等名厨，被聘为“中亚杯”温州首届烹饪大赛鉴评师。1997 年 9 月，郑志钦又获得由全国劳动部授予

的“中式烹调师”证书。

郑志钦在工作之余，还热心烹饪教学。1978年至1980年，由浙江省饮食公司出资在温州市饮食公司举办内部烹饪培训班，郑志钦开始了执教之路。此后，他先后在华侨中学和矮凳桥的劳动技校任教，还在各种临时的烹饪学习班执教六七年。省饮食公司在华大利餐馆举办过2期厨师班，他担任教学工作。

郑志钦做了一辈子餐饮，培训了很多徒弟。他的徒弟可分为两批，在酒店餐馆教的徒弟，如叶林、吴城忠、黄忠和、志林、林云等，现在基本已出国，将瓯菜厨艺传到了国外。在茂福酒店带出的七八个徒弟，如徐国平，目前在梦江大酒店当厨师长；郑元东、元肆、元伍三兄弟，在乐清柳市投资聚丰园大酒店任职；姜鹏，目前为新南亚大酒店厨师长；孙棉尧，在乐清清华联大酒店当厨师长；孙永克，在聚丰园大酒店做了二十多年的厨师长。

资料来源“鹿城档案地”

这两口六角古井

徐贤林

这两口六角古井，位于温州市区一条无名小巷的中段边上，有多条平行的无名小巷连接环城东路与永东路，但因有这两口古井，使这条无名小巷霎时变得灵动而从侪辈中凸现出来。

我与这两口六角古井间的故事从十多年前开始。我们决定在市区购房，妻子开始在老城区寻找房源。一天周末，出差在外的我接到妻子电话，说在环城东路相中一套二手房，位置很好，面积也合适……儿子接过手机说，位置确实很好，六楼的房子，东西朝向，站在东面窗口可以看到欧洲城，站在西面窗口，海坦山、华盖山、积谷山一览无遗，还有，小巷里有两口六角古井，水是活的，里面还养着小金鱼呢。擅长数学的儿子立体思维很强，他扼要的口头描述，立马给我一幅立体的环境图。而那两口六角古井则令我遐思。

于是，我们入住与井相邻的都市房子。

我第一次从环城东路拐入这条无名小巷。小巷两旁是一片两层老屋，褐色的墙黑色的瓦，典型的老式住宅区，居民从自家的门扉里进进出出，展示着繁华都市里难得一见的慢节奏……一株无花果叶繁枝茂，一丛昙花也长得张扬，一位满头白发的老太太提着一只拴着绳索的塑料桶径直走向无花果树下，我的目光追随老太太的身影，于是便看到了两口古井。古井

紧靠民宅墙边，两口井紧紧挨着，砖砌抹石灰的井口呈正六边形，西首那口井的井口被封堵了。老太太从东首的那口井里打水。我静静站着，看着老太太动作娴熟地打水，然后慢悠悠提着水穿过一条小弄不见了身影。我有点吃惊，每家每户都安装了清洁的自来水，年迈老太太为何要舍近求远来打井水呢？已是晌午时分，这时，一位老头一手提着水桶一手提着米篮向水井走来，他打上水，在窰井边上淘米，神情专注而惬意。在短短半个小时里，我看到八位老人来打井水。我突然悟到：他们住在这里，与水井为伴，岁月沧桑，水井已与他们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了，与其说来打井水，倒不如说是到井里舀情怀。我对水井的理解又深了一个层次。我走近水井，六角井口显得苍老，砖缝的石灰已高度石化而有了结晶体，井水清澈，一眼望穿井底，井里有十余尾小金鱼，或游弋或悬停，长尾巴拨动竟也激起涟漪，悬停的小金鱼瞪着水泡眼看我，将我视为不速之客？

我问过几位老街坊，这两口井叫什么名字，凿于何时，是否也属于永嘉郡城二十八宿之一，他们都说不出个大概。看来，这只是两口无名水井而已。这倒给我提供了遐想空间：昔日，这里地处城外，环城东路原来是护城河，上世纪七十年代时，舢舨船还可以直接划过来在陡门头和涨桥头靠岸呢。我展开联想，楠溪和青田流域的小商贩搭舢舨船到温州城，看到城外这大片空地，就搭起一座座简易棚栖身，白天进城叫卖土特产，晚上出城在简易棚里宿夜，久而久之，这里形成一片聚居区，为了解决饮水，他们集资寻找水源凿井……于是这里便有了这两口井，这是两口草根水井，与一条护城河和一座华盖山相隔，华盖山山脚有两口著名的古井，系容成子炼丹汲水之用。这四口井是否源于同一条水脉，我无法考证。

我在小巷里进进出出，都不忘看一眼这两口井和井边的昙花和无花果，当然也与慢悠悠生活的街坊们行个点头礼。井里的小金鱼老是长不大，也总是悠然游弋或者悬停，水泡眼还是以那样的姿态望我，而我早已不是不速之客了，我是这里的常住民。水井对我而言没有实用价值，只是望着井水可以释放一下都市生活积攒起来的压力。

直至有一天，井水进入我家，使古井与我们之间直接连接起来。妻子在中山公园买了两尾杂种金鱼和一个球形玻璃鱼缸，卖主说这种金鱼好饲养。儿子放学回家一看到金鱼便非常喜欢。金鱼也给我们带来一点小小的乐趣。金鱼由儿子一人喂食，说来也怪，每当儿子打开门锁进屋时，两尾原先静卧缸底的金鱼霎时活跃起来，儿子喂鱼乐此不疲。然而，好景不长，半个月后的一天中午，两尾金鱼莫名其妙肚皮向上死了。妻子怕儿子难受，又到中山公园买了两尾体形与原先两尾相近的金鱼。我提醒，如果用井水金鱼可能存活更长时间。妻子依我言，到水井取水养金鱼。这两条金鱼依靠古井井水一直养到儿子上大学。妻子也怠养金鱼了，便将它们放进古井。从此以后，我每次经过井边都会望一眼水井，察看一下我们那两尾体形有些独特的小金鱼。

几位民工在那片老屋的褐色墙壁上钉上“D级危房”的铁皮牌子，老街坊作鸟兽散搬离。有一天，几位民工在老屋外围上一周绿色铁丝网围栏，两口六角古井也被圈围进去。

无名小巷冷清了。不见前来打水的老人。已有海碗口粗的无花果树依旧在疯长。无主的昙花却蔫了。也无人观赏小金鱼了。

这里整体拆除是必然的。

这两口六角古井的命运如何？我不知道。

石坦巷里的大学时光

苏德来

庚子年寒露，独自步行从飞霞路去石坦巷，寻找大学时代的记忆。一路上回味着西贝柳斯的《第五交响曲》，作者五十岁时创作的这首作品，弥漫着人生复杂隐晦的气息。曲中法国号响起，少了一种少年亦或青年的冲动。虽然，木管乐器奏起，百鸟歌唱中，似乎迎来春天，但音乐还是沉稳的中年人品质。《第五交响曲》已经摆脱了《第四交响曲》中那悲哀与低沉，摆脱孤冷的味道，多了一份积极向上的心态。

孤冷，可能是一种人生态度，那是经历失败后对生活更清晰的认识，如同在北欧的冰天雪地中艰难行走，苦痛可能是肉体，可能是思想，但依旧能坚持向前迈进。

音乐，总能让我找到慰藉的理由。当然，寻求一种温暖记忆也是需要的。走过公园路，少年、青年的映象已经不再回归，所谓的复古也牵强附会。唯有穿过五马街的时候，一家店里播放舒曼写给克拉拉的第一首情诗《童年情景》，如此自由，天真，欢乐，充满梦幻。钢琴自由奔放容易感染人，特别是舒曼的这首由七个乐章组成的曲子，魔力地引入回忆。

毋庸置疑，我回到了年轻时光。心底深处浮现出石坦巷，石板铺陈的道路，在青砖绿瓦照应下，诗情画意。那里有我的爱情，有《水车谣》声中起舞的伙伴，有我喜欢的先生们，一切历历在目。

味蕾记忆最是鲜明。小巷中有一家猪肠粉店和一家早餐店，我是最喜欢去的，粉和糯米饭都是一元钱一碗。现在想起来小巷里有关它和它的味道才是最正宗。确实，我的记忆储存中最多的是有关石坦巷小吃带来的欢乐。

真实地说，玩和吃相对于课堂，我更喜欢前者，甚至我喜欢窗外知了的歌声，元明清文学里的爱情故事是不如窗外知了的鸣叫声。尽管年轻帅气的老师，用他清纯男高音卖力读他从新华书店里买来的教案和文学分析之类书本中的知识点，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老师音响是有变化的，有情感，是认真的，尽管如此，却也不如窗外知了单音节的歌声。我以为窗外有天籁。

当然，我也喜欢宋代文学、美学、写作课等等，毕竟教授们是有水平的。只不过花花世界总比枯燥无味的课堂有趣味，年轻只要当下欢愉。

如今的信河街车水马龙，是忙碌的。站在十字路口望去，晃如隔世。现实中的石坦巷，已经成了宽阔的大道，昔日的石板路早已换成了水泥路。街道左边有几处等待拆迁的旧房子，也不是记忆中拥有的。不过，对她的回忆与寻找，是亲切的，是美好的。

深秋的风撩乱我的头发，也撩来一缕暖阳，更撩起了一个风高夜黑的回忆——

年关将至备一些年货，是温州人过新年前不可或缺的生活内容之一，如酱油肉、鳗鲞之类。但，这些一般自己动手，晒。学院的老师也不例外，学院宿舍楼顶有阳台，阳台是同学们聊天、休闲的好去处，也是恋人们夜间约会的好地方。阳台也是晒酱油肉、晒鳗鲞的好地方，北风一吹，太阳一照，没几天即可以收成存放。

那年初冬，学院后勤处一位胖胖的老师在阳台上晒了四条大鳗鲞，每条一米五左右长，有二三十厘米宽，肉质饱满，有一两厘米厚。阳光下的新鲜的鳗鲞，闪闪发亮，勾起了同学的食欲。

夜晚降临，精力旺盛的我们睡不着觉，直到夜半还在议论阳台上鳗鲞、可否把鳗鲞弄来享用等话题。很快取得一致意见，于是，有了分工，文哥、

冰哥上阳台偷鳗鲞，我的任务是翻墙出去买酒和取点酱油醋。

下半夜的寝室楼是很安静的，听到的只有鼾声和风声。几个黑影蹑手蹑脚地踏上了通往阳台的楼梯，迅速地顺利地将两条大鳗鲞揽入怀中。到了寝室才想起这么大的鳗鲞如何处置？人多思路宽阔，烧了吃！于是用剪刀把鳗鲞剪成小块，放在“烧的快”水壶里煮。

我以飞毛腿般的速度从宿舍北门的铁门翻出去购置酒和调料。回来时遇到值班老师，问我怎么现在才回来？我说，肚子饿了，吃点心。可能是夜深，老师问了一两句也就放行。但是，我的心脏跳动他肯定听到的。

到寝室时，鳗鲞已经烧熟。我的天呐，那叫一个美味啊！从此后，所有的鳗鲞味道，不如那个夜晚味道鲜美。

第二天早餐时分，餐厅外一个女高音用温州话在咆哮，“鳗鲞给人偷了，哪个狗生的偷了我的鳗鲞……”出餐厅，见到走廊架着一个小黑板，写着一行字“谁偷了鳗鲞，狗生！”

后来，学院展开调查，大家信誓旦旦没有做坏事。

回忆有关大学时代的石坦巷，却不知不觉地写到偷鳗鲞的事情，以致一边写一边笑。

石坦巷，是我青年时代走过的一条充满烟火味小巷，虽然如今容颜大变，但关于她的回忆，如明媚的阳光温暖我的心灵。

站在石坦巷深处榕树一弯小河旁，河面闪烁着春天的绿色，小河通向九山湖（河），这是唯一让我在早已卸下黑发的年龄尚可热泪眼眶的地方。

拂过耳边的风儿，捎来远方李宗盛的《漂洋过海来看你》：

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陌生的城市啊熟悉的角落里。

渐行渐远的山前街

施菲菲

(一)

因为城市改建、道路拓宽，鹿城旧貌换新颜，以致前往采访竟然找不到山前街。在路人的指点下来到这里，放眼望去，一片高楼大厦，没有弯曲幽深的小巷，没有毗连成排的店肆，唯有傲立在笔尖峰的巽山塔让人深信这里就是山前街。



雁塔立峰尖

山前街南起茶院寺，北至卖麻桥，因为在巽山东南麓，便以方位命名，称其为“山前街”。

“巽吉山头塔影尖，疏林斜挂月纤纤。时间清唳云中鹤，曾驻飞仙白玉蟾。”这是清同治年间温州司马郭钟岳在《瓯江竹枝词》中对巽山雁塔胜景的描述。

移步巽山，山坪上有法严寺。法严寺始建于北宋开宝年间，原址在巽山西麓，已有一千多年历史，新中国成立后被改建为巽山小学。1977年，附近的居民不忘祖先遗留下来历史古迹，自筹资金，由戴克箕等人发起，在巽山上重建法严寺。1987年得到批准，特邀请释海德法师主持该寺。如今法严寺旁边尚存释海德所立的《重修法严寺功德史碑》。

法严寺前的山坪上，东首有思峰亭，亭的横额是林剑丹先生题写的，西首有观塔亭，观塔亭依山势自然高差巧妙建成两层，下层名为巽山亭。法严寺后便是温州市区四大古塔之一的雁塔，又名巽山塔。

巽山塔几经修建。据明代王诤撰写的《巽吉山建塔记》记载及遗存下来的塔砖上的铭文信息，该塔始建于宋朝，后“岁久塔就圯”，直到明万历三年（1575），由永嘉县县丞徐浩督工在原塔基上重建。当时的雁塔下有“文昌阁”，塔南有“魁象亭”，塔后有“骖鹤亭”等胜景。道光五年（1825）该塔曾复修。

历经百多年风雨沧桑，古塔显得残破不堪，塔身向南倾斜。1974年5月19日上午，古塔终于支撑乏力而倒塌。庆幸的是温州摄影界老前辈邵度先生于1944年曾经拍下当年的巽山古塔，使后辈仍可领略千年古塔的曾经风采。

旧城改建时，为恢复历史古迹，温州市人民政府拨款200万元在原塔基上重建雁塔，新塔于2004年10月竣工。塔身高35.35米，底径6米，塔基用粗钢筋锚固在基底的岩石上。抬头仰望，只见新塔为六面七层砖混结构，六簷飞翘，美轮美奂，每个角上系有铜铃，风动铃响，给瞻仰者带来耳目之享受。

雁塔北面的“驂鹤亭”，相传宋时道士白玉蟾曾经控鹤驻此地。“驂鹤亭”南北两向的石柱以郭钟岳《竹枝词》中诗句作为楹联，南为：巽吉山头塔影尖，疏林斜挂月纤纤；北为：时间清淚云中鹤，曾驻飞仙白玉蟾。

(二)

美丽的传说留在记忆里，深邃的人文滋润着世世代代，说起山前街美人台的故事，银发的老妪老叟们其乐无穷……

相传晚清时期，山前街将军殿对面有一座戏台，农闲时节，各地小戏班都会来此演出，南来北往。其中被人们称为“老锦绣”的乱弹班最有名气，该班一艺名为小莲的花旦，身段美，扮相靓，唱腔佳，武功好，是该戏班的台柱子，捧场者不少，人称“红莲子”。由于“红莲子”貌美艺高，常常引来地方权贵及好色之徒的垂慕纠缠。但“红莲子”始终洁身自好，为百姓所钦佩。一天“红莲子”演完戏下台，进更衣室换戏装衣帽，当地一位“地保”，外号叫“癞蛤蟆”的突然将她拦腰抱住，死死不放。小莲虽然竭力反抗，但已躲避不及，眼看自己玉体将受辱，小莲奔上戏台，夺剑自刎。人们为小莲保节烈举唏嘘赞叹，辖地知县得知此事深为动情，提



“美人”何处寻（图片作者：陈国浩）

笔为戏台撰联：花好榭品洁；艺高澄冤清。还在戏台照屏上塑上“红莲子”的塑像，将该戏台命名为“美人台”，来表达对“红莲子”的挽意。

事后，美人台的名声遐迩，一些很有名气的戏班子也不惜屈就到此地献艺，以表纪念，从此山前街更趋热闹。百戏横陈，弦管竞作，商店趁时机出售货物，小街摊贩遍布，远近戏迷们蜂拥而至。美人台让山前街名噪一时，繁华几度。

1928年，美人台因火烛而烧毁，其传说却一直在民间百姓中流传，你加油、我添醋，美人的故事在人们口头更趋完善美妙，“山前街”“美人台”这些地名也在美人故事的流传中沾光添彩。

解放后，旧戏台一带变成民房。1971年，此地沿山前河这一边的河埠头塌坏，一些居民就自发组织起来，利用这里尚有一小块空地，在美人台旧址建了一个老人亭，本来大家想取名为“美人台路亭”，经历过非常时期的百姓仍心有余悸，坊间一智叟建议：还是叫“爱晚亭”稳当，免得要遭受“恢复四旧”的嫌疑，说不定又要被“打光”“砸光”……从此美人台这里就有了一个“爱晚亭”。闲暇者、疲倦者、寂寥者都会来此相聚，说俚语，话轶事，人们虽然不能享受戏曲的声色之娱，却也能拥有散讲闲谈悠然之乐。

倒是做生意的阿旺胆子大，他看准美人台的好位置，用自家一间新屋换来在老人亭边一户陈姓人家的旧屋，加上自家在此地的屋基，建了二间三层楼，并大大方方地打出“美人台酒楼”的招牌。

酒楼生意平平，其招牌却富有人文意韵，隐藏在人们心间的文化积淀在这里得到张扬，得到绽放。酒酣耳热之际，那些醉汉们在朦朦胧胧中看到“美人台”三字，不知会幻化出怎样的心曲与情思，是“红莲子”？是“王昭君”？还是他们各自的心目中那位美人？

1998年，一些热心公益的里人又重修了老人亭，改建成三间楼房，理所当然地命名为“美人台老人活动室”。为了使内外一致，一个叫潘国珍的老人把家里珍藏的“昭君出塞”美人图，捐献给活动室，于是老人们用

镜框把画保护起来。十来年，这张昭君画像一直陈列在“美人台老人活动室”。想必在人们心目中，此“美人”与彼“美人”已融为同一个“美”的意念。

2004年9月，山前街开始拆迁，美人台没有被作为例外，老人亭、美人台酒楼都化为子虚乌有……

(三)

说起发生在山前街的辛酸事，人们不约而同地认为当数1979年发生的“氯爆”事件。

近日，笔者走访了“氯爆”事故的几位受害者。岳先生的母亲蒋大妈，第一句便是：现在还说那件伤心事干啥？说起来人心里就难过……

“那是1979年9月7日下午1点55分，我只15岁，正在阳台上玩耍，只听到一声震天的巨响，还不明白发生什么事，我就失去知觉……”岳先生回忆。

“那天家里没有大人，只有孩子一人在家，我与他父亲都上班了。我的单位是海洋渔业公司，在白楼下；他父亲的单位是温州自来水厂，在西山。当时我家住在山前街美人台的劳模宿舍第二幢4楼（岳先生的父亲岳阿明是当时市级劳模）。记得我本是上中班，吃了中饭我就从家里出来，先去外面办点事，再到飞霞桥站头坐厂车赶上中班。幸亏我儿命大，是对面4楼一个姓洪的邻居在阳台上看到我儿子受伤，鲜血顺阳台往下流，就冲到我们2楼救他。几个邻舍推不开门，大家七手八脚搬来竹梯，有人从隔壁人家阳台上爬过来。只见我的儿子倒地，周身一摊血，右边头上是白花花脑浆。众人慌了手脚，他们赶紧搬来一张竹躺椅，在邻居们相救下，把我儿子送到三医——这都是事后邻舍告诉我的。”蒋大妈说。

“我在飞霞桥头正想迈上车去厂里上班，有个工友急匆匆赶来告诉我出大事了，叫我快下车不要上班。后来，我与丈夫东找西跑，就是找不到

儿子的下落，心急如焚。几个亲戚还跑到殡仪馆对名字，找人。当知道儿子被送到三医抢救后，一家人跑到三医，医院里人山人海，有送伤员来抢救的，有来找自己受伤亲朋好友的，也有来看热闹的。门卫拦住外人，不给进医院病区。我什么也顾不上了，抓住铁门又叫又哭，门卫也有同情心，终于放我们进去……”

经抢救，15岁的少年终于脱离了危险，或许是因为年轻，他恢复得很快，只半年，就能拄着拐杖下地走路了……

在原山前街286号，另有一位姓周的60岁居民，正在家里拖地板，被一块横飞过来重72.5公斤的液氯钢瓶残片击中，当场身亡。

后来，岳先生被照顾安排进了电化厂当学徒工，厂里还让他去读书，因为伤残，照顾他在厂里干行政工作，在图书馆做管理。

温州电化厂厂址于山前街中段西侧。据当年在温州市消防队四中队服役的金衍楷回忆：“我们中队是接到电化厂一个职工的报警电话后出警的。在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因为液氯钢瓶爆炸厂房炸塌后飞出来砖石、受伤者的鲜血、晕倒在地的人，满地狼藉，惨不忍睹；远处，一些被炸者的残腿断手就血淋淋地挂在平台上，断垣边；厂部办公楼里一些被困在里面的人打不开防盗窗，在拼命扬手呼救……”

“我们的原则是先抢救人，我们一跳下车就先撬门砸窗，把被围困在里面的人先解救出来。那些躺在地下的，用手拭一拭他的鼻子，还有呼吸就先抢救。那时，我抱一个人，拽一个人拼命冲向救护车，那是实实在在的‘时间就是生命’呀！记得，到现场后，我们立马向中队汇报情况，请求增援。有六七辆消防车都赶过来。我们这辆消防车是先把伤员往医院送。因为厂区内，地上到处是躺着的人，他们生死不明，救护车忙不过来……”

金先生的描述，从另一个侧面让我们明白那场不该发生的惨祸的严重性。据事后的调查统计，这次“氯爆”遇难59人，氯气中毒的门诊病例1059例，住院抢救的有779例，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达245.35万元。



“氣爆”酿惨祸

(四)

山前街初建于明代，与南塘街、丽田街、梧田街连成一线，旧时是沿着温瑞塘河通向市中心区的一条古驿道。

河流、水巷、阁楼、凉亭、石桥、河埠头、酒肆，还有青山斜塔、灰墙黛瓦组合的江南水乡是他们的家园，世世代代在这里繁衍生息的山前街居民，怎能不钟情于这里的一山一水、一桥一井、一墙一门呢？

山前河是南塘河的支流，它从南向进小街，在北向出小街，终年与小街相依相偎，深情地润泽着沿岸土地和居民，“清水绕墙，人家枕河”是当年水乡真实写照。

沿河由南至北，依次有扈屿桥、汇车桥、洞桥，三座古桥横跨在山前河上，方便居民出行。其中扈屿桥基本保留建桥时的原貌，2004年被温州市人民政府列为市级文保单位。桥边，有温州市人民政府立的“扈屿桥说明”的石碑：该桥始建于宋朝，重建于清初。在桥南侧一条方型石柱上，还能

看到一排铭文，桥面上有5条并列石板，上刻防滑几何图案，两侧还设有栏杆……

温州城区内曾有九山，其中有两山均在山前街，一是山前街南端巽吉山；一是山前街北端的黄山。

黄山只20来米高，因为形似狮子，人们又称其为“狮子山”。黄山前又有一球形小土丘，富于想象者便把这自然的地理特色美化成“狮子捧球”。如今，小球无踪，黄山也只是一地黄土。

站在黄泥堆边沉思，一位大妈告诉笔者：前面有一口井，叫“八角井”，拆迁时，被推土机夷为平地，一个热心市民看到后向文物保护部门报警，直到几个相关部门一齐出来干涉，拆迁办才同意根据原样恢复这口古井。——居民是我们城市文化的创造者，传承者、保护者，他们对自己家园的一山一水一井一桥一往情深。

“山前街的住宅大多在解放初期改建过，但在该街的228号、146号和99号庭院，仍旧保留着一些清代的建筑标志，如“官帽门第”“人物花窗”“雕梁画栋”等，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在99号黄氏古宅中，还能看到花墩、哨盘、长条桌、石锁等古物。有一个雕有松鼠、花鸟的青石洗手盂十分精致，而且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在2003年12月15日《温州都市报》上，时任温州市文联副主席的金文平先生曾如是介绍他所见的山前街古民居。

热心的李老伯告诉笔者，过去从山前街北端至南向，按顺序有广济寺（现在中国农业银行位置）、将军殿、法严寺（在巽山小学位置）、三皇殿、湖心观、茶院寺，每逢初一、十五，这些寺院香客不断。

走进湖心观，读观门的那副对联，便了解湖心观地理位置的优越：高瞻吹台之大山云烟缭绕；远瞩温瑞的塘河银波荡漾。大榕树庇荫下的湖心观飞檐描金，脊墙绘彩，木鱼的敲击声中，朝拜者接踵上香合掌祈愿。

山前街消失了。在开发建设现代化城市时，以牺牲历史文化遗迹作为代价的，其实远不止这一例个案，算是缩影吧。

这些年，救救古街坊，救救古民居，救救遗存不多的城市历史文化遗迹的呼吁，不绝于耳！却似乎见效甚微。



扈屿古桥(黄瑞庚提供)

唯书寿永

——我的家乡与我用心创作的“三部曲”

诸向东

诸向东，山福镇人。早年移居杭州，退休后从事文学创作，著有小说三部曲《天弘》《地印》《人境》，构成“天·地·人”系列作品。此文为诸先生关于自身与家乡、三部曲及其文学创作之漫谈。

从小喜爱文学，年轻时也尝试过写小说，但终因自觉太过浅薄而放弃。

上世纪50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在青少年时期可供阅读的书太少了，有也是前苏联的文学作品，如《静静的顿河》《牛虻》《安娜·卡列尼娜》，国内的如《苦菜花》《红日》等。偶尔能读到欧美的文学作品，如《红与黑》《莎士比亚戏曲集》《茶花女》《飘》等，那是因文革抄家流落出来的。此外，基本上是逮住什么看什么。肖洛霍夫、莎士比亚、司汤达、玛格丽特·米切尔、鲁迅等等系列作品的内容，不时在我的脑海里浮现，这些作家对社会的深刻洞察，对人性的生动刻画，对丑陋现象的无情批判，都使我钦佩不已。

渴望着自己也能成为一名作家。

可是，生活的轨迹并不是按照每个人的意愿运行。高二年那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我和许多老三届一样，失去了继续读书深造的机会。走出校门，进部队当兵，复员转业，到外贸部门工作……虽然36岁

时考上大学，但读企业管理专业，毕业后在一企业的领导岗位尽心尽职，为家庭和稻粱谋，大部分时间都交给工作单位。曾经的作家梦，与我似乎遥不可及。

然而，骨子里那种渴望挑战敢于开拓的冲动，总是激励着我去做每一件值得做的事情，推动我实现人生的一个个愿望。从踏上工作岗位到退休前，虽然没有时间搞文学创作，但个人的经历和阅历上却丰富了许多。出发时的懵懂少年，归来时已是鼓鼓行囊，这使我对写小说充满信心。

有亲友劝我，“你的绘画、书法基础都已不错，何必另起炉灶去写小说呢？”这也是实话。那些年搞书画，一平尺卖个千儿几百的，轻轻松松就有可观收入。相比出版自己的文学作品，创作过程的辛苦不说，出书还要自掏腰包。但我不去算这种经济账，也不喜欢走四平八稳的路。

早在退休前，我已利用工作之余，开始积累创作素材，一边工作一边写作，把节假日和零碎的休息时间都利用起来。别人搓麻将、打扑克、玩游戏，我则在键盘上练打字。整整十年，终于完成了30余万字的自传体小说《人生之旅》。这算是为以后创作作了一次热身。

从1994年开始，我钻研易经。我觉得易经作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集中体现。要写书，当写出有深度、有内、有特色的东西来。而易理所阐发的思想，正是我所追求的。

信心更主要来自于生活实践。从我有记忆开始，就生活在温州乡下。老家那时称永嘉县藤桥区外垟乡后支付，三岁的我随父母从大上海来到这个僻静的小村庄。而15岁就独自去上海谋生的父亲，阔别故乡已整三十年了。其时正逢镇压反革命和合作化运动，农村别是一番景象。我养过羊，放过牛，也跟大人一起下田劳动，而大多时间还是贪玩。最吸引我的是瓯江边的河埠头，以及我家后院的屋基地了。

屋基地有一亩多，一年四季轮番种植各类蔬菜外，印象中也有甘蔗。屋基地个别角落，还能看到埋着的大石礅，露出锅盖大的台面，那是老屋留下的遗迹，足见先前梁柱之大和老屋的规模。偶尔听大人们说起，祖父

是清代举人，后经商立业，置起丰厚的家产。这一切，却被一场大水连人带房屋都冲掉了，留下六岁的孤儿和两位寡母，靠变卖家产艰辛度日。

小时候不懂事，从来不细问屋基地的来历，它原来什么模样，祖父生前是怎样一种状况……当然，处于当时的环境，即使问了，恐怕也不会有答案。直到1993年春，母亲去世，乡下来杭吊唁的亲友告诉我，诸姓的祖先来自于山东，担任过朝廷刺史之类的官职，随南宋皇帝一路南逃，先后辗转绍兴、宁波、福建等地躲避战乱，最后选择三面是山一面临江的外垵定居下来，亲戚还说有保存的家谱为证。

直到这时，我才知道家族的悠久历史，才知道一个家族跌宕起伏的历史，也是整个民族变迁的缩影。这更加坚定了我创作的决心。

选择何种体裁来表达是文学创作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如果仍以自传体为基础修改加工自然省时省力，但充其量只能写成一部普通的传记或家史，缺乏普适性，不具备广泛传阅的意义。只有小说才能发挥最大的想象空间和艺术表现的张力。接着考虑的是从何处入手，主题思想是什么。

斟酌再三，决定从祖父那辈到我们这一代的社会生活作为小说背景。这百余年来，正是我们国家翻天覆地的一个大变局。这样就把一个家庭的变迁放进整个国家、社会变化的大环境来考量，使家国情怀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小说就有了丰厚的意涵。每一篇又各自体现不同的中心思想：《天弘》写祖辈们如何寻找公平正义；《地印》，写父母一辈，尤其是母亲如何践行大爱、兼爱精神；《人境》写我们这一代，如何热爱和向往民主自由。从而构成了《天·地·人》三部曲，各自独立又相互关联的系列故事。

中国传统美学认为，审美活动就是要在物质世界之外建构一个意象世界，这个意象世界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广义的“美”。任何一个文学艺术作品，都是形象思维的结果，都需要通过具体的形象塑造和刻画来感染人，影响人。小说《天弘》以天上的清泉为比喻，弘扬公平正义即天道，像一泓清泉源远流长。任何一个社会，一旦失去了公平正义，社会的天平必然倾斜。腐败的清皇朝的倒台便是明证。《地印》，通过对主人公严如月这

样一个传统中国女性的塑造，高度赞扬了顾家也顾他人的兼爱精神。正如墨子所倡导“幼吾幼及人之幼，老吾老及人之老”，中国传统的“兼爱”精神，更符合中国人的习惯理念，因而更具有可实践性。《人境》主要是写对自由民主的渴望和追求。追求自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多少仁人志士为了争取民主、自由和解放，不惜牺牲自己的宝贵生命。今天我们更应高举起新时代民主自由的大旗。

为了力求达到小说的形式美，《三部曲》不仅在每一个章节前都写一段点睛文字，以适合现代快节奏生活的阅读习惯，而且还在每一个故事开头以江河为引子，引出一个个曲折离奇的故事。比如《天弘》开篇引子是瓯江，引出的故事主要发生在温州。《地印》以黄浦江为引子，写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的故事。《人境》从钱塘江写起，引出发生在杭州的故事。

自古以来，水是孕育生命的基础，而以繁华为具象特征的都市，更离不开水。“三部曲”正是从江河开始，展开了一个个波澜广阔的社会场景。

每部小说开篇第一节，又专门设计了一个典型场面。如《天弘》，开篇通过对家族祠堂里的祭祖活动的描写，显示那个时代传统大家族礼制的森严，对家规家教的敬畏。祠堂作为当时社会典型的缩影，烘托出故事的背景。《地印》的开头，选择了最能代表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拍卖场景，为全书描写半资本主义状态的上海滩埋下了伏笔。《人境》则以文革批斗会为首个场景，再现了群众运动所谓的自由，不过是一场严重的内乱，揭示了极“左”的危害，表达了人们对真正自由的渴望。这些看似不经意的描写，使读者犹如临其境。

《钱江晚报》推介我的小说“三部曲”。终于在2018年前按计划全部完稿，除《人境》尚未出版以外，其他两部均已与读者见面。

以下为读者诸君对小说的评价，限于篇幅不再枚举。小说能够赢得专家和读者的一致好评，无不得益于生活，得益于平时的观察和积累，得益

于故乡这块沃土。正是从小熟悉这里的人们和山山水水，才会有“三部曲”中多姿多彩的人物、生动的故事情节和充满乡土气息的语言。

我如释重负，总算可以以此来告慰先祖和父老乡亲们了。名和利都是空的，有价值的作品才可能永存。但愿我的“三部曲”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各方评价】

●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晟：

我本是讲授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的老师，看小说是家常便饭。自退休以后十多年来，专一于中国传统审美文化这一新课题的理论研究，便很少有时间看小说了。近因出版社老朋友之邀，初审了无忌的小说《天弘》，犹如饱食了一顿好酒菜，醇香不绝，美意盎然。

小说《天弘》选择晚清太平军革命失败为时代背景，以温州瓯江为地域范围，以葛家祖上代代相传的青龙剑为故事轴心，围绕授剑、失剑、寻剑的过程，开展了曲折复杂的故事情节，塑造了一个个亲切感人的人物形象……全书不论是官场、情场或商场，所有的情节都同一把代表着正义、公平的青龙宝剑紧紧联系在一起，贯穿始终，耐人寻味，发人深思。

●国家美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李修建：

该书的语言平实雅练，阅读起来令人轻松愉快。随手征引一处，如：“这天敬明叔一早来到逸彬家，逸彬泡好茶，让他坐在堂前那张八仙桌旁边来，他却不肯，顾自搬了个小竹椅，靠在门槛边坐下，说：‘我们是粗人，没那么多讲究，还是坐这门口有风吹到，凉快！’”（第159页）中国传统美学中有两种审美类型：一为“芙蓉出水”，一为“错彩镂金”。

钟嵘的《诗品》中论道，汤惠休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诗如错彩镂金。”颜终身病之。

从格调上讲，迹近自然者更合于中国人的审美理想，所以颜延之“终身病之”。所谓“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平实自然的文风，

实则需要苦心的锤炼。小说在塑造人物上同样是成功的。无论是主人公葛逸彬、金姑，还是陈扬斯、金百鸣、展忠、胡知府、曹通判，乃至下人成福、尼姑紫莹，一个个性格鲜明，跃然纸上。

●网友秋水，来自南粤某学校一名80后老师。从多个层面对《地印》做点评：

一、故事情节吸引人。《地印》开篇就抛出作为贯穿小说始终的线索——古玉佩。拍卖会那紧张的现场描写，一下子就抓住读者的心，埋下伏笔，设置悬念。围绕着玉佩展开故事，玉佩何去何从？情节曲折复杂，跌宕起伏，围绕玉佩隐现，一波三折，让人心系玉佩，关心着它的去处。以玉佩开篇，以玉佩终结全篇，脉络清晰，浑然一体，回味无穷。

二、人物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在故事的叙述中，各种人物性格刻画，入木三分。比如阿芳，自私贪婪世俗低贱；阿升，聪明机灵讲义气，艰难创业却命运多舛。最喜欢的是主人翁严如月这个人物形象，虽然身处旧时代，可她却是个很有独立人格的女性，嫉恶如仇，自强自力，不畏强暴，有博大的爱心，她的爱心很有感染人的艺术力量。

其三、内涵丰满，可读性强。一部小说，包含了很多知识，如旧上海的风土人情、经商管理、佛学、命理学等。阿升算命的情节，看起来神秘而生动，却丰富了小说的内涵。方言描写生动形象，重现了旧上海历史的一角，让人仿佛与主人公一起置身于旧时大上海。可看出作者渊博的知识和阅历……

●读者汪先生：

汪先生是一位老上海，看了《地印》对老上海亭子间、石库门、弹街路的描写后赞不绝口，说“老上海就是这般光景，写得活灵活现！”“怎么对旧上海了解得嘎清爽？”

●著名作家张抗抗：

诸向东现为浙江省作协会员。多年来坚持文学创作，近年出版长篇系

列小说《天弘》《地印》……刻画了一个古老家族几代人为寻找公平正义和大善大爱的传奇经历，折射出百年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其艺术特点是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布局严谨，内容引人入胜，人物个性鲜明，叙事语言稳健雅练，内容厚重……

资料来源“鹿城档案地方志网”

资料来源“鹿城档案地方志网”

封面题字：朱如明

封面摄影：陈立

封底篆刻：李从众

装帧设计：方立庭



资料来源“鹿城”地方志网